



亚 | 洲 | 道 | 路

上海论坛 2013 嘉宾采访录





电子邮箱：shanghaiforum@fudan.edu.cn

网址：www.shanghaiforum.org

复旦大学
韩国高等教育财团

「 在 上海论坛 2013 上，我们招募了 30 位左右优秀的复旦学生担任记者对论坛嘉宾进行采访。他们用专业、投入和自信记录下这些智慧之声。这本采访录，就是他们与嘉宾们交流观点、汇集智慧的结晶。」

上海论坛组织委员会诚挚地感谢每一位蒞会嘉宾和每一名学生记者。我们希望通过这本书，与更多关心亚洲发展的同仁们，共享思想与智慧的力量。」

2013 上海论坛学生记者名录

姓 名	专 业
Alice KEOPHONBOUATHEB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蔡志欣	经济学院
车 锐	新闻学院
陈 剑	社会科学基础部
陈 涛	经济学院
陈怡璇	新闻学院
程向心	新闻学院
高天齐	新闻学院
耿 璐	中国语言文学系
关赫楠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
韩沁珂	新闻学院
胡灵雨	中国语言文学系
黄欣怡	历史学系
Jeffrey Chen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Kevin Tham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Laurent Dispagne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李霁萱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李钰恒	新闻学院

2013 上海论坛学生记者名录

姓 名	专 业
梁妍洁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刘璐茜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丘美芳	新闻学院
Robert Orr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Silvan Griffith	经济学院
王 娴	新闻学院
王震宇	新闻学院
徐黎彤	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徐盛洁	新闻学院
须蕴烨	管理学院

目 录

智者对话

- 002 **Andreas Löschel**
— 吴力波 中国在全球污染问题上可能是领跑者
- 009 **Hélène Rey**
— 林 曙 世界金融体系正逐渐趋于多元化
- 015 **Michael Merson**
— 傅 华 防治慢性病，亚洲需吸取西方教训
- 019 **Robert A. Mundell**
— 张 军、傅 华 我们重新回到了缺少国际货币体系的年代
- 025 **Robert Zoellick**
— 吴心伯 洞察中美关系

高端访谈

- 032 **包碧德** 合作与共享是网络时代的愿景
- 037 **陈宏图** 培养提供个性化服务的护理技师
- 040 **陈学彬** 建立自平衡交互盯住的国际汇率体系
- 042 **段成荣** 我国在城镇化问题上需要补课
- 045 **费立鹏** 全球都面临着精神卫生挑战
- 049 **葛剑雄** 人类仍然是生态圈的中心，但是我们要担负起责任
- 054 **Kirill Barsky** 必须让六个友好关系国家团结起来
- 059 **孔灵芝** 慢性病防治是全社会的责任
- 063 **李泓冰** 用新媒体平台来传达正能量
- 066 **李善同** 好的城镇化要求公共服务提供到位
- 069 **马述忠** 中国本土种子企业必须依靠自主研发获得核心技术
- 072 **盛 斌** 全球化中亚洲人口红利的衰竭
- 076 **孙可娜** 金融市场不开放意味着更大的风险
- 080 **沈坤荣** 创新的深层次问题是制度创新
- 084 **宋恩荣** 中国需要加入像 TPP 那样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协议
- 087 **王 健** 仅仅依靠政府政策刺激经济并不可取
- 092 **吴缚龙** 政府在城市区域创新体系中并非主导作用
- 095 **肖顺贞、刘 宇** 养老机构更应重视精神关怀
- 098 **杨雪冬** 中国治理模式的反思与改革议程
- 102 **叶 江** 全球治理问题应借鉴中国儒家思想
- 106 **於兴中** 规范二元论：关于中国解决秩序与纠纷问题的初步想法
- 110 **张希良** 中国需建立“国际能源安全观”
- 114 **周瑞金** 党管新闻的方式亟需改进
- 118 **朱介鸣** 政府应对农村土地有效开发进行协调

中国在全球污染问题上可能是领跑者

编辑整理：Silvan Griffith



Andreas Löschel

德国能源转型监督专家委员会主席，欧洲经济研究中心（ZEW）环境与资源经济及环境管理所所长、教授，德国海德堡大学经济学教授



采访人：**吴力波**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我一直坚信这将是未来技术的方向，德国可能不会成为最先应用的国家，这也没有什么不好，因为鉴于目前污染的全球性质，我认为，最好是由中国成为领跑者。」

吴力波：请您能否简短介绍您作为德国政府能源转型监督协会专家委员会主席的职责？以及描述一下该委员会的功能？

Andreas Löschel：德国政府已经设置了长期目标，期望在 2050 年实现能源系统的彻底转型，这一目标以及整个转型都来源于 2007 年启动的一项能源计划。在这一能源计划中，德国政府不仅展望了新能源系统（预计在 21 世纪中叶建成）的前景，更表示这一转型将严格遵循监督流程——这种监控是有科学依据的，时刻关注德国是否在目标轨道上，一旦发生偏离还将指导政府及时调整以实现长期目标。监督主要包括两个职能，一个是让政府部门每年发布监测报告，公布约 50 个指标来综合衡量能源转型方面的完成情况，包括能源安全、企业和家庭能源成本等。

吴力波：在即将发布的报告中有什么新的发现吗？

Andreas Löschel：我们总是在尝试推进新的想法，我们仔细浏览每一个相关领域，从各个角度观察在能源转型领域已经取得的进展和仍存在的问题，例如能源使用效率提高等。我认为目前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我们着眼于可再生能源，沿着很好的轨道逐步实现既定目标；关注能源安全，发现德国正在面临装机容量问题；关心能源成本，虽然目前整体处于可接受的水平，但是我们也发现，调控已经造成部分成本增加。最后关于整个欧洲方面，如果我们仔细观察欧盟的排放交易系统，可以发现目前该体系对德国能源转型促进不大，因为交易价格过低，导致德国工业企业投资低碳科技的激励不足。

关于能源系统转型，我认为最关键的挑战之一是淘汰核能系统。这就是为什么最近可再生能源领域有了比之前若干年份更快的发展，而且化石燃料开始有了诸多的竞争对手。但这不是唯一的挑战，我们有更多事情需要实现，这与最终的转型是协调一致的。淘汰核能这一步虽然是能源转型中最重要也是最受关注的一部分，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我们有众多的其他目标，如改善能源效率、可再生能源等——这也使得淘汰核能逐步变得可能。我们希望在2050年在德国建立一个几乎无碳的建筑行业，这对建筑业将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吴力波：（无碳建筑）是否将采用太阳能支持？

Andreas Löschel：主要是在供暖方面采用可再生能源，用保温等措施来实现无碳建筑。但是如果我们想要实现这一目标，就意味着我们不光要注意目前新建的建筑，更需要长期涉及所有德国的建筑物。这是非常有野心的目标，也是提高能源效率的关键，对成功转型非常重要。如果你想问可再生能源地位如何，我会直接回答你，可再生能源确实能够促进对核能的替代，但是它们只在一定程度上有帮助（因为正如你所知道的，有中间可再生资源），目前我们仍然需要传统的能源。

吴力波：据我们所知，美国最近的页岩气实验非常成功，对新兴经济体实现能源独立是一个很好的经验，奥巴马总统也试图通过该计划来推行美国“再工业化”。你对于这样的能源独立战略怎么看？

Andreas Löschel：这是问题在德国也讨论激烈。正如你可以想象的那样，许多德国公司正面临着强有力的竞争。一方面，我认为需要考虑到目前竞争的劣势其实与能源转型联系并不紧密，而是由于其他原因造成，页岩气在美国和一些其他地方的繁荣确实使德国企业处于不利地位，但从根本上说其实并不是能源转型导致这一成本劣势。事实上，德国政府对

其能源密集型产业在国际竞争中的问题心知肚明，这是一个从发展中需要学到的经验教训，我们并不打算在德国来一次“页岩气革命”，德国对此比较谨慎，希望能再等待一段时间直到该技术进一步成熟，所以德国大规模使用页岩气将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德国政府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且试图帮助国内的工业企业避免落入这样一种不利的价格竞争情况，虽然并不能够完全补偿损失，但是政府已经采取一些可能的行动，例如电价补贴、调低电网费用等，这是一个积极应对。

吴力波：您刚才提到了电价补贴，在中国，太阳能和风能领域也有类似的补贴。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在考虑是否需要一个更加自由灵活的可再生能源交易系统。所以哪种政策对于刺激可再生能源发展更加有效？好处和坏处分别是什么？

Andreas Losechel：我认为，德国的可再生能源政策是非常有效的，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最近几年可再生能源的高速发展，例如去年可再生能源的比重已经达到 23%，而且以很快的趋势增长。在这方面，有效率是指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非常有吸引力，也就是给投资者足够的激励，这也是我们在风能反面取得很快发展的原因。一方面，这导致了过去几年中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成本降低，规模经济和科技发展使得光伏发电的成本从 40 美分下降到不足 20 美分，并且还在变得更便宜，这是这种政策带来的好处之一，德国事实上是在实践全球“学习曲线”。另一方面，这也变成了一个非常“昂贵”的政策，因为随着可再生能源发展政府补贴支出也迅速增加，在最近一年，我们花费了大概 200 亿欧元来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这部分资金事实上是从消费者、家庭和企业而来，其实是消费者自己支付了电费账单。在去年，该笔费用也增加了，从 3.5 美分每千瓦时涨至 2012 年的 5.3 美分每千瓦时。

事实上，这是欧洲第二高的电价，仅排在丹麦之后。所以改革是否必要正在激烈讨论，因为我们感受到固定了 20 年的上网电价补贴、新能源补贴使得可再生能源的投资者免除了一切投资风险，这急需改变。补贴政策对新能源产生到占领大约 20% 的市场阶段都是很好的政策，但是它却不是我们下一步——达到 80% 市场——时所理想的政策模板。关于这方面的讨论才刚刚开始，今天我们有大选，直到 9 月底新政府被选举后才会开始对可再生能源系统进行改革，我认为这将是一个深刻的改革，进一步整合可再生能源市场，并且在未来诞生一个市场导向的、更好的可再生能源技术支持体系。

吴力波：您刚才提到了选举，那么我想请问，您对这种长期的绿色政策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如何看待？

Andreas Losechel：政治上的不确定性当然存在，我相信，随着时间推移，我们将不

断调整前进道路。我们不知道最终该如何朝着目标前进，这意味着我们要灵活机动，随时关注政策在经济上是否可行，对能源安全是否有贡献等。政策上的不确定性的确实增加了这方面的困难，因为新政府对于如何平衡不同的目标有自己的看法。而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能源转型的总体思路在德国得到了两党共同的支持，所以尽管可能在关注重点和某些具体实施措施上会有争议，但是总体思路是得到各方肯定和支持的。所以，我不认为今年的选举会导致德国年底出台完全不同的能源政策，一些调整则是完全可能发生的。这也是为什么作为经济学家，我们希望确保这一能源转型是以一种经济上高效的方式完成，不会对家庭和工业造成太多的负担——不然这将对转型造成阻碍。并我们必须说明这项转型对德国人民有好处，并且将以一种有效的方式来进行，不会在实现长期目标的过程上浪费太多资源。

吴力波：为什么德国到目前为止还未能淘汰褐煤的使用？是因为德国自身是最大的生产者么？

Andreas Losechel：如果你去看德国的电力系统，你就会发现煤炭的地位很重要。在德国，大约有45%电能是由煤炭发电的，这一情况一直保持了很长时间，煤炭是过去乃至现在德国电力系统的基础。确实，它像你所说的，是一种的对环境有危害、会造成污染的发电方式，尤其是褐煤。但是在欧洲，我们有排放权交易制度，可以控制燃烧煤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并且之前我们也讨论过，目前该系统中排放许可的价格很低，仅仅是大约5欧元每吨二氧化碳，这使得将发电完全由褐煤转换到天然气方式目前是难以实现的，或者说不经济的。天然气的价格不断上涨，煤炭的价格在不断下跌，再加上二氧化碳的排放交易价格很低，三点共同造成了德国目前继续大量使用煤炭发电的局面。

我认为德国人并不十分担忧本地的空气污染，这个话题不是讨论的核心和重点，因为有很多环保法规来处理当地的空气污染。例如，我们在曼海姆（Mannheim）有一个很大的煤炭发电厂，当地人也并不抗拒新建一个这样的发电厂，因为他们相信空气污染问题已经被政府纳入考虑。但是我们仍然面临着全球污染问题，去年的数据也显示，煤炭的使用有所增加。正如我所说的，我们的主要“利器”是排放交易系统，已经有了非常具体的规则来应对空气污染，除此之外，我们并不打算采取任何（调控）措施来主动淘汰煤炭发电，而是让市场来处理剩下一切，而目前为止，我们的市场“工具”价格还不够高，不足以完成对煤炭的淘汰。我估计，当每吨二氧化碳的价格上涨到20欧元左右的时候，煤炭发电将会自然的被市场淘汰。德国拥有世界上第五大的褐煤储量，所以从目前看来褐煤资源非常有竞争力。尽管我们对于二氧化碳的目标很明确（并且朝着该目标奋斗），但是一旦碳排放交易系统无效或者关闭，人们会立刻重新大量使用煤炭。

吴力波: 也许在那个时候, 碳捕获和封存技术 (CCS) 的成本会更加降低?

Andreas Losechel: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我们已经讨论过了页岩气, 最近一些年来, 有相当一部分关注这方面技术的德国人对此持怀疑态度, 他们反对页岩气、碳捕获技术 (CCS)。所以我们停止了大多数在德国的示范工程, 对此我很遗憾, 正如你所说的, 这可能是未来的领先技术。我一直坚信这将是未来技术的前进方向, 可能德国不会成为首先应用的国家, 这也没有什么不好, 因为鉴于目前污染的全球性质 (和中国煤炭的使用情况), 我认为, 最好是由中国成为领跑者。很明显, 中国的煤炭使用有一些其他的问题, 比如低效率的煤炭发电厂产生的空气污染问题等。我认为, 德国的情况是不同的, 我是指德国的煤炭发电厂效率很高, 远远高于平均水平, 对于环境影响较小, 所以这个问题需要中国自己更加关注。在我们德国, 主要需要讨论的碳排放交易系统 (ETS) 的一些问题, 我们不会采用直接对煤电厂的干预的手段, 德国与中国的情况非常不同。

吴力波: 那接下来谈谈关于德国在非洲北部开展的能源战略, 德国已经开始了使用沙漠太阳能发电项目 (DESERTEC) 将电能从沙漠地区传递到欧洲? 您能介绍一下具体情况吗?

Andreas Losechel: 沙漠太阳能发电项目 (DESERTEC) 是一个很有远见的德国工业项目, 原本的想法是, 我们需要从那些比德国本土有更加丰富的太阳能和风能的地区获得一些能源供应, 比如非洲北部。正如你所说的, 这一项目在 2009 年启动, 目前项目的热度已经在衰退, 远远比不上几年前, 但是仍然在继续。在我看来, 沙漠太阳能发电项目应该改换角度继续发展, 关注点不再是向德国传送电能——传输本身很困难, 高压输电线需要穿过西班牙、法国才能到达德国——而是作为一个促进非洲北部可持续发展的方式: 不需要过多的向德国提供电力, 而是给发展中的非洲国家提供可再生能源。我认为, 这是改变的方向, 尽管许多公司已经开始退出这一项目, 我相信它不会完全停止, 而是转换重点来支持非洲国家的能源发展, 这是德国工业可以做出的一项贡献, 即为沙漠国家提供可以促进其可持续发展的技术。

吴力波: 我们都知道, 资源分布是很不均匀的, 那么这是否会导致对清洁能源形成类似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 未来清洁能源是否会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

Andreas Losechel: 目前在欧洲, 每一个成员国都有独立的支持系统。当然, 我们很清楚发电资源在欧洲是分布不均的, 例如欧洲南部的太阳能、北部的水能, 西北部的风能等都很突出。但是在目前, 我们还没充分利用这些发电资源。一个很好的提议是建一个全欧洲

的可再生能源支持系统，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好的利用这些资源，比如在西北发展更多的风电、在斯基的纳维亚国家发展更多的水电、在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腊开发更多的太阳能，这正是我们目前所缺乏的。比如德国，它并不是欧洲阳光最充足的国家，但是它是欧洲最大的光伏发电用户，这就是没有效率的体现。所以我们认为可以在欧洲开发一个更高效的系统，实现统一的欧洲能源和安全市场，在长期这不会导致能源安全问题，因为我们将会有有一个统一的电能市场并将大大改善不同成员国之间的电网分布，然后你就可以想象，这些在欧洲分布不均的可再生资源将会更好的被利用。但是目前我们还不会这样做，因为缺乏足够的基础设施来长距离传输可再生资源，这一点是非常必要的。类似的计划已经有了，因为德国内部同样存在资源分布不均的情况，大多数德国电力消费者在南部，而大部分风能集中在北部，所以如果我们希望提高或者增加北部的风电产能，正需要克服长距离传输问题，因此，我们开发了新的 HVTC 网络，这将有助于长距离而不会造成过多的能量损失，这种科技同样可以用于在欧洲内部来更好地利用各种资源。

吴力波： 这不是一种浪漫主义？

Andreas Losechel： 我不会把它称作浪漫主义，因为这是最终我们要面临的严峻的长期挑战，问题是我们如何解决这些长期挑战。正如你所知道的，为了实现长期的利益，需要面对短期的损失，所有国家的政府都需要选择是否愿意付出短期的代价来改善长期局面，我认为德国政府非常清楚它有责任解决这些长期问题，并且也在积极尝试。它不应该愚蠢的行事，我们非常明确一点，那就是需要确保我们的生活水平不会因为这些环境政策而受到过多的威胁，但是与此同时，德国作为主要工业化国家之一，需要担负起自己的责任。这并不是是一种浪漫主义，而是努力抓住机遇转化为长期优势。因为我们知道欧洲资源稀缺，气候问题在未来会更加恶化，这是长期且真实存在的挑战。我们试图在能源效率和资源效率方面成为领跑者，因为我们坚信长期会有更大的挑战，因为要确保走在前沿，不至于落后它国。但是，正如我所说，我们在朝着这个长远目标努力的过程中需要审慎查看，确保这些政策不给家庭和企业造成过大的短期困难，这是一直需要平衡的问题。

吴力波： 今年论坛的主题是在多元中寻求和谐发展，那么类似欧洲碳排放体系的交易系统是否正是这样一个和谐的利用市场参与者的多样性来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好方法？

Andreas Losechel： 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ETS）试图找到最便宜的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方式。但是你必须考虑到，一方面这是试图找到最有效的减小排放的方式，另一方面，该体系需要在不同的成员国之间分配负担，因此，这个系统是为了协调利益和成本而存在，

不同的成员国拥有不同的排放配额和比重。目前这个体系主要是用拍卖方式来配置排放配额，拍卖的收入将被分配到各个成员国，分配时会综合考虑各国负担情况、经济条件、政策环境等，所以我们期待通过这个系统来达成最低成本的解决方案，但是同时也会尽量平衡由于该方案造成的负担，即通过成员国全体同意的方式来重新分配拍卖收入。从碳排放交易系统成立至今，我们已经位于了第三阶段（从 2013 年开始），为此，我们制定了新的规则来分配利益，正如你所说的，这是一种不同成员国间共同承担负担的经济方式。

吴力波：但是您刚才提到，二氧化碳的排放价格目前还很低廉，因此难以推动从煤炭到天然气的改革？

Andreas Losechel：价格确实很低，但是我们需要考虑为什么它如此低，这其实反映了 2009 年经济危机对欧洲的巨大冲击，它使得企业对排放许可的需求大大降低，因此排放许可在市场上供给过量，这也是我们学习到的一点——排放交易体系需要更好的抵御经济危机造成的波动。另一个原因是企业通过灵活的机制来到了欧盟之外的廉价许可，所以我们必须非常谨慎的决定 ETS 系统中到底需要多少排放许可。第三个原因是，许多行业得到了免费的许可。基于当前不景气的经济情况，我们给出了很多免费配额，有些企业得到了比他们实际需要的更多的排放配额，所以甚至可以通过出售配额来牟利。我们现在讨论的 2030 年的目标（包括二氧化碳排放、可再生能源、能源效率等方面）中的一个问题就是是否还需要给出免费的目标以及该如何严格的制定。我认为，我们应当综合考虑所有情况（尤 2020 年至 2030 年间），制定远大的目标，向投资者展示，尽管目前的价格低廉，但长期目标终将实现，所以在今天投资碳排放技术将会带来美好的回报。必须注意到，这都是长期投资，需要 20 年以上的时间来成熟，因此吸引投资者必须使他们清晰的看到接下来几年的发展方向，我们可以通过定好目标规划来吸引更多的投资。所以我认为，我们需要迅速在这方面展开行动，及早订立有野心的目标，并认真思索和解决碳排放系统目前面临的一些问题。

世界金融体系正逐渐趋于多元化

编辑整理：Silvan Griffith



H el ene Rey

伦敦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英国社会科学学院院士。2012年她获得了由欧洲经济学会颁发的首个Birgit Grodal奖，该奖项旨在表彰为经济学作出突出贡献的欧洲女性经济学家。2013年，她与Thomas Piketty一起获得了Yrj oJahnsson奖。



采访人：**林曙**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如果要建立一个货币联盟的话，必须至少同时建立一个全面的银行联盟」

林曙：您做了很多关于国际货币体系的研究，那么在您看来，现行体系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H el ene Rey：在我看来，现行体制导致了储备的过度积累。你可以从利率角度来看储备（过度）积累的影响。众所周知，利率在逐渐下行，我们或许可以将其归咎于金融危机的影响。从金融机构的角度来看，因为利率非常低，你就可以承担更多的风险。对一个国家来讲，解决这个问题一个可行的方法是用预防性储蓄来代替储备。如果不能通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来建立预防性储蓄，那同中国类似，你的防守线就是积累外国资产。但是，如果你有一个运作良好的最后贷款人，一个更好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那就不需要积攒很多的预防性储蓄。相反，你可以增加信用额度。在我与Emmanuel Farhi和Pierre-Olivier Gourinchas共同完成一篇报告中，我们提出要增加可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使用的资源数量，以允许其直接

在市场上借入资金。因此，在发生危机时，个人可以从 IMF 借款，国家可以从 IMF 借款，从而以更正式的方式建立起货币互换协议体系。货币互换协议体系是在 2008 年金融危机高峰期以非常特别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它在解决美元短缺问题时起了很大作用。但它确实是一种非常特别的做事方式，为建立起更有效的防御屏障，我们建议将其规范化一点。

林曙：我注意到您提出来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叫做新特里芬难题。由于您认为这是引发国际货币体系问题的原因之一，能不能请您再详细阐述一下？

Hélène Rey：我不确定它是否是引发问题的原因之一，但我肯定会详细地讲述一下我们所谓的新特里芬难题。转化成黄金，也就是说你可以把美元转换成一定量的黄金。但后来，外界对美元的需求非常大，在美国之外美元的流动性非常高，因此在 20 世纪 60 年代，人们开始怀疑是否所有外部的美元都能以固定汇率有效地转化成黄金，而这仅仅是因为黄金储备的增长并没有外界对美元需求的增长那么迅速。所以在某一时刻你必然会问这样一个问题：人们是否能把他们拥有的美元都转化成黄金。如果你认为这是不可行的话，就可能会出现某种挤兑，对美元的挤兑。如果我现在有美元，我就希望把它转化成黄金，因为如果一直等下去，我就可能拿不到黄金了，对吧？这是就特里芬难题背后的思想。

我们从中学到的一点是，类似的问题在当今也会出现，它现在就出现了。但显然地，问题并不在于美元不再由黄金支撑了，而是是什么决定了美元和美国政府债券的价值，所以它与之前的情况并不完全相同。美国国债的价值是由美国的财政能力决定的，也就是美国财政部兑现美国国债的能力。目前，大部分美国国债由外国投资者持有。如果你认为，由于美国之外的国家有时会比美国增长地更快，因此对美国流动性、对美国国债需求的增长也非常迅速的话，那么总有一天美国会积累大量的外部负债——我们并不是指净值，而是总值——大批的外部债务、外部政府债券都是以美国的财政能力作为有效支持的。但同时，相对于整个世界而言，美国（经济）的规模，美国的财政能力，大概都是在下降的，因此，总有一天人们会再次提出这个合理的问题：美国的财政实力是否足以支持所有的外国流动性。那时，各国都会想在美元流动性之外增加一点多元性，寻求不同种类的货币作为流动资产。看得再远一点，我们会好奇哪个国家能真正地发行国际货币。如果我们抛弃美元，谁将会取代它？这是一个显然充满了不确定性的问题，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回顾历史，总是世界大国、大经济体或者大贸易国能够成为国际货币。当英国是世界经济领导者和国际贸易强国时，英镑是国际货币；而当美国逐渐强大起来，并且实际上比英国更加强大时，就交易量来讲，当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国时，我们便转向了美元。所以展望未来，就经济总量而言，一方面我们有欧盟，但它存在治理问题需要克服，另一方面，还有中国。然而，为了发行国际货币，你必须有一个发达的金融市场，开放的资本账户和一些类似的条件。

林曙：您提到经济规模非常重要，但我知道您有一篇论文是关于贸易作用的。在那篇文章中，您指出就国际货币的角度而言，贸易金融中心比经济规模更重要。

Hélène Rey：对的。但通常来讲，重要的是贸易流的规模，而且一般来说，你必须是一个大的经济体才能有大的贸易流。所以它们之间并不是一对一的关系。但如果我们再次回顾英国的历史，它是第一个开展工业革命的国家，它曾是最发达的经济体，它也曾是英联邦国家最大的贸易国，所以进进出出英国的贸易流非常大；之后美国成为了最大的经济体，同时也在国际商品服务市场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所以从这方面来讲，尽管在加入欧元区之前卢森堡的货币非常稳定，但我们仍然不能想像卢森堡这样大小的国家能发行国际货币。

林曙：您是否认为世界金融体系正逐渐走向多极化或者全世界将会使用统一的货币呢？您认为哪种情形更为现实？

Hélène Rey：我确实认为存在向多极化发展的趋势，而这无非是因为相对经济规模在发生变化。无论是从GDP、贸易还是仅从人口的角度来看，亚洲的比例都在逐渐增加。如果历史可以提供任何借鉴的话，正如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经济变量正在从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地区转移。当英国经济体相对于美国经济体逐渐缩小时，在一段时间内，英镑仍保持了其主要国际货币的地位，同时特别是，即使英国经济体与美国经济体规模相比相对较小的情况下，伦敦在一段时间内依然是重要的金融中心。所以存在惯性。当你成为一个重要货币时，很多人都在使用，极少有动机来偏离这一均衡。如果你是唯一一个决定明天用人民币来交易的人的话，这对你来说将并不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式，因为你必须找到一个交易对象。然而，其他人都在使用美元，所以找一个用美元交易的人会容易很多，那么你就有动力作出改变。在不同的体系间存在很多惯性，因此实际经济规模、GDP、人口数量、贸易流等的变动与转向另一货币的金融变革间会存在时间差。我们从英镑向美元的转变过程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而目前我们观察到的是GDP、贸易流确实在向亚洲转移，但资金流还没有转向。如果历史可以提供任何借鉴的话，这一过程将花费一定时间。尤其是在像中国这样，资本市场发展欠火候的国家。我们在谈论的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但我认为趋势确实是趋于多极化的。

林曙：我们对人民币如何成为国际货币这一问题非常感兴趣，而且我也知道上海希望有一天能够成为金融中心，不仅仅是地区性的金融中心，而是像纽约、伦敦一样，成为世界级的金融中心。那什么是成为世界级金融中心的主要决定因素？或者说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应该做点什么呢？

Hélène Rey: 首先, 为了让你的货币能更广泛地被大家使用, 你必须取消对货币兑换的很多限制。在我看来, 尤其是对投资组合 / 投资的资金流仍有很多限制。所以首要的事情之一是增加货币的自由交易。当然这一过程一定要小心, 因为你不希望出现大规模投资组合的资金流动以及在无对冲的情况下, 出现剧烈波动。所以要对各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做仔细研究, 当然, 同时监管环境也要进一步完善, 以确保安全性。这对一个国家来说是重要的进步。(在这个过程中,) 知识逐渐累积起来, 同时你需要积累大量的人力资源, 会有很多的聚集效应。为了建立金融中心, 你需要积累很多诀窍。

林曙: 关于资本账户开放这个问题, 对于很多新兴市场国家来讲, 他们了解到了资本自由流动的好处, 因此他们想开放自己的资本账户, 但同时他们也担心如何保护本国货币不受资本流动的冲击。为保证既能享受资本账户开放的好处, 又避免危机的产生, 新兴市场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应该做些什么呢?

Hélène Rey: 这显然是一个长久以来的问题, 也是国际经济中的一个大问题。看起来很多新兴市场国家确实已经失去了活力, 而且不仅是新兴市场国家, 一些欧元区国家也存在这样的问题。譬如西班牙、爱尔兰的资本流入, 它们的周期性非常强, 而且极不稳定。如果不对某个特定的信贷资金流动或者热钱流动或者短期资金流动进行核查的话, 资本的自由流动很可能会带来一个资本流动热潮。资金会从金融体系中溢出, 并最终可能导致资产价格泡沫的产生。如果产生了房地产价格泡沫, 事情就非常严重了, 你会遭遇极具破坏性的危机, 它可能会毁了整个金融系统。所以这些情况是非常危险的。在很多危机中, 我们都经历了这种资金流的强周期性波动, 我想最近的一次就是欧元区危机了吧。

那我们能做些什么呢? 首先, 我们应该意识到资本自由流动可能并不是最佳选择, 尤其是针对有时比 FDI 资本流周期性更强的信贷资金而言。那我们采取什么行动呢? 我们应该集中一系列政策工具, 并根据它们的目标或者作用, 将其划分为宏观审慎监管政策和资本控制政策。你可以在考虑一国市场特征的前提下, 用这些政策来削弱资本流动的周期性。尤其在房地产市场要非常小心。通常在国内市场中存在资本流动扭曲, 例如房地产企业的子公司。在很多国家, 房地产投资企业都建立了自己的子公司。当有大量资金从国外涌入时, 这些子公司会通过新增贷款的方式制造出资产泡沫。因此, 如果有必要的话, 我们一定要解散这些子公司, 并作出一些会计调整, 调整贷款价值比 (LTV), 调整债务收入比, 注意贷款标准。在微观层面要密切关注银行监管问题, 在宏观层面关注财政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为确保周期性并不那么强, 在宏观层面, 我们可能希望有额外的资本可以用来缓冲、增加资本金要求。世界各地有很多人都在尝试这些政策工具, 我想关于如何使用这些工具, 我们可以多了解一点。

林曙: 看上去, 仔细监控和建立某种审慎机制, 对于新兴市场国家资本账户的发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您之前提到全球 GDP 在发展转移, 其中心在逐渐从西方国家向亚洲国家转移。众所周知, 欧洲国家的经济融合度非常高, 但亚洲国家的融合度相对较低。您认为亚洲国家是够应该追随欧洲的步伐, 模仿它们几十年前的措施呢?

Hélène Rey: 经济融合的过程是这样的: 最开始的时候, 欧洲国家试着建立一个商品服务共同市场, 这是非常积极的一步。随之产生的是监管问题, 这在欧洲确实非常有挑战性, 在亚洲可能也一样。但在考虑建立货币联盟之前, 迈出第一步是非常重要的。当然, 如果你已经迈出了那一步——设法建立一体化市场, 如果你已经实现了这一目标, 那么创立共同货币是完成地区一体化可行的方法, 同时从欧洲一体化的经验来看, 这可能也是一个理想的情形。我认为欧洲一体化经验教给我们重要一课: 如果要建立一个货币联盟的话, 必须至少同时建立一个全面的银行联盟。因为至少对欧洲金融体系来讲银行是非常重要的。如果银行市值是一国 GDP 数倍的话, 在银行业风险和主权风险间将会存在一种关系, 在危机中, 这一关系被证明是致命的。打破这种关系的唯一途径就是建立一个全面的银行联盟, 最终使得银行的规模, 与整个地区的经济总量相比相对较小, 而不是像爱尔兰银行一样, 是爱尔兰 GDP 的数倍。事实上, 当爱尔兰银行破产时, 整个爱尔兰也随之破产了, 银行与国家同时破产。冰岛的情况也是这样的。本质上讲, 西班牙也是。所以这是重要的一课, 应该在亚洲金融体系中有所应用。这是欧洲人学到的东西。

林曙: 这个观点非常有趣。我听说很多人都认为财政联盟很重要, 您认为有必要(建立财政联盟)吗?

Hélène Rey: 无论我觉得财政联盟本身是否可取, 我确实认为它对一个有活力的货币联盟而言, 是必需的, 而我恰巧认为财政联盟本身也是可取的。但我认为银行联盟对货币联盟来说也是必需的。如果没有银行联盟, 货币联盟最终会变得不稳定。然而请注意, 在银行联盟中, 你确实要共享一些信息, 从这个意义上讲, 你至少需要有一定量可供使用的、由共同资金组成的共同重组基金。如果大型银行破产的话, 你要有能力对这些银行进行重组, 在出现问题时, 要能获得财政支持, 所以你至少要有一定程度的资源共享, 但你并不需要一个完全成熟的财政联盟。我认为这使得整个过程在政治上更加可行。财政联盟要求所有成员国都有政治意愿放弃很多主权, 我认为我们还没准备好。虽然它很理想, 但目前看还确实不可行, 银行联盟则可能是可行的。

林曙: 欧元区现在的情况是怎样的? 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Hélène Rey: 这完全取决于他们将会采取的政治措施。目前情况已经得到了稳定，接下来就看欧元区国家怎么为他们的经济增添活力了。他们可以实施更多的改革，采用更为协调的财政政策，放宽财政紧缩，增加总需求，如果可能的话，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更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在欧盟层面，还可以增加欧洲预算。所以确实还是有事情可以做的。每个国家都可以根据他们的具体情况采取一些措施。

林曙: 您能再详细阐述一下货币政策吗？

Hélène Rey: 我们经历了一个从推迟到悬而不决，再到维持的过程，欧洲中央银行采取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措施。其中之一是长期再融资操作（LTRO），这对银行系统有利。第二个重要的措施是欧洲央行宣布启动直接货币交易（OMP），它有效地稳定了一些外围债券市场中的利率。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措施，尤其是 OMT，它为货币政策提供了更好的传导机制，但目前就扩张性货币政策而言，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这些都是真正具有局定性的措施。

关于货币政策，我注意到，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货币政策以及货币增长与通胀间的关系发生了非常有趣的变化。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前，在各主要的经济体中，货币增长和通货膨胀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但从 90 年代中期以后，这种联系似乎消失了。

我自己并没有做过这方面的研究。但我想指出的是，货币周转率的下降、货币增长与通胀之间关系的破裂都是我们在大萧条时期曾观察到的。1933 年，《计量经济学》杂志发表了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描述了大萧条的所有特征，他提供了精确的图表，并指出货币增长与通胀间的关系已经完全破裂了。这是因为人们大多以现金和预防性储蓄的形式持有货币。货币出现在了商业银行或者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但却完全没有注入实体经济。

所以没有信贷增长，你可以说存在信贷紧缩。这就是大萧条，在目前的情景中，我们也可以观察到类似的状况。这已经被保罗·克鲁格曼等学者阐述地非常清楚了，在谈论日本问题时也提及过。这就是流动性陷阱，人们大量持有现金。这就是目前的情况，创造了大量的流动性，但它们却没有进入实体经济，没有通货膨胀，事实上，存在温和的通货紧缩。

防治慢性病，亚洲需吸取西方教训

编辑整理：黄欣怡



Michael Merson

杜克大学副校长、全球战略和项目副教务长



采访人：**傅华**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院长，教授

「中国是个伟大的国家，你们应该吸取西方的教训，让你们的民众远离慢性疾病的威胁。」

傅华：当我们提及防治NCD（慢性非传染病）时，吸烟导致的高患病率是我们要优先讨论的。中国吸烟患病率很高，您认为对此我们该怎么做？

Michael Merson：我同意你的观点。防治NCD如今非常重要。现在的媒体非常关注禽流感、肺结核之类的病毒性疾病。这些确实是问题，值得我们关注，但迄今为止数十亿亚洲人口的最大威胁是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如中风、糖尿病、癌症，以及精神健康问题。这是很大的挑战。

西方的一些国家在上个世纪已经遇到过并学会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可惜的是，他们的经验和教训并没有在亚洲或中国得以应用，这点令我非常失望。看起来亚洲将经历同样的悲伤：很多人过早得病，过早死亡，无法享受长寿而快乐的人生。

导致慢性非传染病主要的两个危险因素是吸烟和饮食。关于饮食，当然是因为人们摄取脂肪太多，而摄取谷物和水果不足，以及摄取了过量的盐。摄取过量的盐分会导致严重的高血压和中风，这在中国是个大问题。

关于烟草，我认为全球健康最大的威胁毫无疑问是烟草。有时候人们问我世界上最流行的是什么？他们认为是艾滋病，但我认为是烟草的使用。2030 年，将有近 1 亿 8 千万人死于烟草，其中大部分人来自中等收入国家。烟草是导致心脏病的重要危险因素，当然也会导致呼吸道疾病和肺癌。而肺癌是中国人得的最多的癌症。

那该怎么做？新加坡和美国在这方面的经验是非常多的。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作出一些政策上的改变。世卫组织的“烟草控制公约”就是一个这方面的全球性框架。但是，签署一份文件很容易，要履行它就是另一回事了。在美国最有效的方法可能是交税。高昂的税费抬高了烟草的价格。香烟价格提高，购买的人就会减少。而且我们更应该关注年轻人，因为烟草很容易上瘾，一旦上瘾，就很难戒除。所以我们必须保持香烟的高价，并对从 5 岁一直到十几岁的年轻人，特别是中国的年轻人，就香烟的危害性进行教育。我知道人们吸烟还出于别的原因：有的人有太多的压力需要释放，女性借由抽烟来减肥等。但吸烟对他们今后生活产生的后果却非常严重，所以我们需要使人们意识到除了吸烟外还有其他方式可以实现他们的需求。例如，人们可以通过运动和休假来减压，女性如果担心自己体重的话可以通过调整饮食来减肥。

但是要实现这一点，政府多方面支持比单一的卫生系统更重要。我们需要教育系统、财政部门、贸易行业，包括中央和省市在内的各级各部门的积极响应和通力合作。因为各级各部门的决策都对吸烟有着重要影响，这不仅在中国，在世界各地都一样。

当然，我们还要激励种植烟草的农民改种其他作物。这样的政策应该由省市级政府发布，来鼓励农民种植其他能够有同样多收益的作物。每个人都希望过上好日子，因此你不能只是让农民停止种植烟草，而要为他们提供其他的激励。

傅华：你提到烟草和饮食是两个影响健康的重要危险因素，此外还有一个影响健康的因素是缺乏锻炼。对于烟草问题，你认为需要政策和多部门合作来解决。那么对于饮食问题和缺乏锻炼的问题，你认为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Michael Merson：同样我们还是需要制定合适的政策。在饮食方面，我们要使人们，特别是年轻人，意识到通过健康饮食获得长寿而美好的人生重要性。也许我们可以请大众名人来推广健康饮食的理念。我们也需要将政策落实到位，以帮助人民实现健康饮食。例如，学校应该（给学生）提供怎样的食物？学校应该只提供健康的食物，而不是汽水之类的。因为孩子们会从碳酸饮料和糖水饮料中摄取过多的卡路里。我们还可以和食品企业商谈，请速食企业使用健康的油（来加工），以减少食物尤其是提供给孩子们的食物中的卡路里。如果这些企业主动这么做当然很好，否则我们也许不得不依靠相关的政策来推动他们这么做。

至于盐，我们要考虑如何让人们减少摄入量。我们可以让家庭使用量勺，或者用可以

替代的更健康的成分。我知道这味道并不太一样，但如果人们从小就开始尝试的话，他们会渐渐习惯的。

所以，实现健康饮食需要采取多部门结合的方法。我们既要教育大众，也需要制定强有力的政策，甚至还需要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例如在纽约市，所有餐馆的菜单上都要写明你所点的菜肴的卡路里。这是个非常好的宣传，有利于人们更好地意识到饮食问题。

关于体育锻炼，35年前我第一次来到中国的时候，大街上看不到汽车，每个人都骑自行车，人人都在打太极，早晨的大街上到处都是打太极的人。但现在我走在大街上，看到的是宝马、丰田、起亚，而不太看得到自行车，也不太看得到打太极的人了。在街头我也找不到体育锻炼设施，而在美国，健身设施随处可见，即使是在工作场所也有着健身设施。所有的工厂、公司和学校都应该备有足够的健身设施供人们锻炼、休息和运动之后进行淋浴。学校也需要设置体育锻炼项目，这应该成为义务教育的一部分，这样所有的年轻人就都能得以锻炼了。每个成年人每天至少应该运动30分钟，每天行走八千步。这是个很好的目标，是可行的。我们应该让公众自发要求这样的改变，这样政策制定者就会更认真地对待他们的请求。

同样，我们应该获得私营企业的合作，而非反对。因为他们有更多的钱，可以做更多的推广，所以我们需要他们成为我们的合作伙伴，并让他们知道，使公众变得健康并不会损害他们的利益。

傅华：卫生系统在慢性非传染病的预防和控制方面能做些什么？

Michael Merson：不幸的是，大多数情况下目前的卫生系统只有在人们得了非传染性疾病后才会发生作用，可是我认为卫生系统也可以在预防方面发挥作用。例如，当年轻人接种疫苗的时候，或者当一个准妈妈来做产检时，就可以借机向他们灌输不要吸烟、要健康饮食、健康生活等理念。当然预防上也存在困难，大多数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都有很长的潜伏期，人们无法很快看到预防的好处和疗效。但我们要让人们信任医疗保健工作者，同时，医疗保健工作者也必须把教育民众作为他们的日常职责。

在中国，很多人都有高血压，但他们自己并不知道。如果他们知道，他们就会采取减少摄取的盐分、利尿或其他更强的措施来降压，所以卫生部门可以在这方面帮助人们对此进行预防。例如阿司匹林能有效防止高风险疾病者的心脏病发作。如果你是一个中年人，家族有心脏病史，并且属于患病的高危人群，你可以每天服用一片阿司匹林来降低风险。所以我认为预防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不仅仅是医生的责任，卫生部门也应该对此有更多的考虑。如果人们患病了，比如高血压、中风、心脏病发作、心绞痛或癌症，我们应该确保为他们提供最好的看护，并帮助他们管理自己的病情。如何活得更加健康，如何防止他们的慢性病进一步恶化，人们需要这方面的教育。

傅华: 我们的论坛着眼亚洲，因为亚洲是全球经济最热的地区。心理健康问题已经开始成为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的主要威胁，这也是世界卫生组织关注的重点之一。你怎么看待心理健康和慢性非传染病的预防问题？

Michael Merson: 你说得很对。亚洲经济发展非常迅速，中国正在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也许很快成为第一大经济体了。我想也许这一切发生得太迅速以至于人们忽略了社会层面的其他问题，人们觉得经济是无敌的，任何事情都可以用强大的经济来改变。

中国和亚洲经济的快速变化所付出的代价之一就是社会的急剧变化，更多的城镇化、工业化、全球化和人口老龄化，所有这些都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这些变化发生得太快以至于政策制定者们无法迅速地对这些变化产生的后果进行应对。但这不能拖延，拖延得越久，后果就会越严重。

现在饮酒（过量）也是一种危害。少量饮酒有利于预防心脏病，但我们不应夸大这方面的效果。适量饮酒是可以接受的，但过量就会有害健康。饮酒过量的人容易患上肝脏疾病，特别是脂肪肝。所以我们也要把这样的知识普及给市民，并制定相关的严格的规定。例如，我知道在中国对酒驾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这很好，而且必须要强制执行。最近几次访问中国的时候，我注意到晚餐里的茅台酒变少了，饮酒也没有那么疯狂了，我想这是很健康的，政府在控制适量饮酒方面做得很正确。

饮酒过量反应了现代人所承受的压力。那么有没有其他途径来释放压力呢？我认为我们应该要求用人单位制定一些政策，例如人们在工作的时候要有休息时间，要让员工做更多的运动，并且他们的休假要得到保证。如果我们能建立起这样的机制，即人们随时可以纾解压力，人们就会感到更加的舒适。

中国有一种竞争文化。我认识一些来到美国读书的学生，他们在每场考试中都努力竞争，而这种竞争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我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开始思考这个问题：除了考试以外，有没有其他途径让年轻人展示他们的优秀？有没有其他方法让他们在没有那么压力的情况下实现他们的目标？因为我认为青春期早期的压力不会消退，它会一直延伸到成人阶段，并影响他们的幸福感。

傅华: 我认为您的观点和评价很有帮助，非常感谢！

Michael Merson: 谢谢。中国是个伟大的国家，你们应该吸取西方的教训，让你们的民众远离慢性疾病的威胁。

我们重新回到了缺少国际货币体系的时代

编辑整理：Robert Orr、车锐



Robert A. Mundell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199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他曾担任包括多个国家政府、联合国、IMF、世界银行、欧盟、联邦储备金监察小组、美国财政部、泛美开发银行以及全世界多家公司和研究所的顾问。



采访人：**张军**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采访人：**林喆**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欧元区的诞生产生了一个可以同美元相抗衡的货币区。而中国的发展也预示着它有获得与美元区和欧元区同等地位货币区域的潜力。那么接下来，我们必须坐下来好好思考一下，对于这样一个即将成型的新兴的，并包容了不同结构和政治力量的体系，什么样的货币体系是最优的。我们正面临一个抛弃当前的旧货币体系，建立一个全新的更好的货币体系的机遇」

张军、林喆：您对现今的货币体系怎么看？您对未来国际货币构架的看法又是什么呢？

Robert A. Mundell：2014年距1944年7月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整整70周年，当时经济学家汇聚一堂，共同讨论设计战后的货币体系，那我就以这个事件开始说起。由于20世纪30年代的重创以及金本位制的第二次崩溃，人们需要为将来打算。尽管仍然处于第二

次世界大战的时期，经济学家们仍然成功地建立起了一个战后的货币体系，该体系固定了美元兑换黄金的比率，并将其他货币同美元挂钩。这个体系在一段时间内运作地非常顺利，当然中间也有一些小问题，但是最终却被另一个新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所替代。

后来，我们重新回到了美元国际货币体系的时代。1971年，伴随着尼克松总统取消美元同黄金的自由可兑换，布雷顿森林体系土崩瓦解。其他国家也将自己的货币同黄金脱钩。那之后不久，这些国家在华盛顿加入了史密森学会，又重新回到了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时代。但这也维持不了多久。纯粹的美元本位制是一个单纯的汇率，但是对于如何确定、谁来确定通货膨胀率却没有一个共识。之前，黄金的总量可以决定这一切，现在由美国的货币政策来决定。但是由于欧洲国家认为美国的货币政策对欧洲来说过于宽松，不愿意使自己的货币升值，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仍然缺乏共识。

因此，在1973年6月，各国决定废弃当时的国际货币体系，允许完全的浮动汇率制度出现。这个问题并没有任何协议。欧洲各国希望重回固定汇率体系，其他的一些小国家也希望如此。最终，国际货币基金会的协定条款获得了修订，之后我们就有了现在的管理浮动汇率制度。

欧元区的诞生产生了一个可以同美元相抗衡的货币区。而中国的发展也预示着它有获得与美元区和欧元区同等地位货币区域的潜力。那么接下来，我们必须坐下来好好思考一下，对于这样一个即将成型的新兴的，并包容了不同结构和政治力量的体系，什么样的货币体系是最优的。我们正面临一个抛弃当前的旧货币体系，建立一个全新的更好的货币体系的机遇。

张军、林曙：到现在20世纪70年代的货币体系似乎还运转良好。当前的问题似乎同传统的困境联系不大，但却同现在的金融危机有更深的联系，这一点看起来非常特别。对这一点您怎么看？

Robert A. Mundell：从数学的角度看，认为所有IMF中的国家可以毫无影响地使用灵活和有管理的汇率的制度、施行货币政策、实现各自的通货膨胀率的想法是极其可笑的。IMF中有188个成员国，欧盟区的17个国家共有一种货币，而这就意味着世界上大概171个国家各自都有各自的浮动汇率制度以及独立的价格体系。几乎没有可能找到一个共同的价格，也不太可能发现一个最经济廉价的市场。从某些方面看，这是相当成功的，因为美元充当了一个世界性的货币单位。

除此之外，仍然存在一系列的的系统性风险，这些风险数年来持续地损坏着国际货币体系。例如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以及80年代的国际债务危机（该危机时由于墨西哥和其他拉美国家违约造成）等。同样也有储蓄贷款危机，例如90年代的亚洲经济危机以及前不久发生的国际金融危机。所有的这些都起源于汇率的大幅波动。80年代的危机就是由于美

元走弱，欧元大幅升值引起的。发展中国家在美元弱势的时候借入大量债务，但是接下来他们却不得不以越来越高的价格偿还这些债务。这导致了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大面积破产，从而引发危机。

亚洲经济危机最初的导火索是1994年人民币的低估，但是1995年到1998年日元的贬值有着更加严重的影响。美元兑日元的比率从1美元80日元下跌至1美元兑148日元。这就造成了美元的强势，接着波及到所有其他最终深陷亚洲危机的国家。而伴随着2008年次贷危机以及2007年8月美联储大范围救助而来的金融危机，也同样是因为美元的升值。正是由于美元作为一个安全资产的想法使得弱势货币变得更加弱势，从而导致了汇率体系的巨大波动。

紧接着，2011年，轮值G20主席的法国总统萨科齐，对国际货币体系做出了3点批评。他首先指出了原材料价格的过度波动，其次，他批判了国际汇率的不稳定，最后，他提出，由于像IMF这样的组织权力较小，国际货币体系缺乏监管。当然，还远远没有到引起灾难性后果的地步，但是考虑一下这些无效率的问题，并且找到一些方式来改善国际货币体系，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我个人认为，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国际汇率的不稳定。如果我们无法稳定美元兑欧元的汇率，那么全球货币体系也将不复存在。汇率的完全波动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货币体系。

张军、林曙：控制过度的波动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呢？一些学者提出采用一种全球货币，另一些学者认为采用其他的储备货币。那么您对这些建议是如何看的呢？

Robert A. Mundell: 如果有不止一种货币的话，那么建立一个全球的货币体系是非常理想的。这就好比在每个人自身母语的基础上又多了一种共同的语言，从而各国的人们可以互相交流。

这种每一种货币都可以与之兑换的货币的职能，就像过去的黄金一样。在金本位制下，不存在固定的汇率制度。所有的货币都直接同黄金挂钩，黄金通过自由市场决定了汇率，这就使得国际的汇率在一个较窄的范围内是固定的。

困难就在于如何能够找到一个黄金的替代品。黄金无法制造出来，它们只能从地下开采出来。因此它就有独立于货币之外的很大的内在价值。在缺乏一个世界政府的前提下，各国不愿意牺牲自己的国家主权来建立一个有效的国际货币体系。那么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没有纸币、使用金本位的货币体系吗？我完全支持这种想法，但是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中却没有这种设想。他们确实有一些计划，但是却从未真正实现，因为各国在政治上没有对这些计划达成一致，并且当时的美国对于如何运行这种计划也没有一个明确的解释。

我想要强调的是，当今的货币体系也不是一个彻底的失败，当然也不需要一个彻头彻

尾的修正。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它是非常有效的。在这期间，中国积累了 4 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在金本位制下，这会导致其他国家储备货币的流出，从而引发危机。美联储持续印发货币的能力使其具有类似于央行的职能，支持了如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 (FDI)。对于中国来说，这创造了奇迹，使其能够运用外国投资建立起自己经济发展的基础。

我们并不想毁了现在的国际货币体系，它有些方面还是不错的。也许是存在的时间太久了，但是对于未来的货币体系，我们仍然希望能够保留现有货币体系的一些机制。新的货币体系应该是非常灵活自由的。尽管对于建立一个灵活的货币体系有一些批判，认为可能会造成通货膨胀，但是目前的货币体系却没有造成通货膨胀。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没有出现通货膨胀。我们必须考虑三个主要方面：我们必须建立起一个国际货币体系。我们不能放弃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但是我们可以做出改进。最大的改进就是要稳定美元兑欧元的汇率。中国的汇率是盯住美元的，因此当美元兑欧元的汇率变动时，人民币兑欧元的汇率也会出现波动，这就会带来问题。现在的市场是非常巨大的，我们也必须考虑这一点。但是，在缺乏是一个世界政府的情况下，我们能有一个世界性的货币吗？

张军、林曙：您认为特别提款权 (Special Drawing Rights, SDR) 有可能成为全球货币吗？

Robert A. Mundell: 我个人认为，特别提款权不会成为全球货币，因为一篮子货币无法成为货币。这就像将美元、日元、欧元，将来还会有人民币混在一起，你就得到了由这些货币组成的一篮子货币。只要汇率是波动的，那么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用这种货币来进行债券定价。如果它们之间汇率是固定的还好，但是问题在于，它们的汇率不是固定的。当特别提款权诞生的时候，它没有以一篮子货币的形式被进行过估价。它被定价为一盎司黄金的三十五分之一。在 1968 年，一特别提款权的价值被定为等同于一黄金美元的价值。接着，在 1974 年，当一篮子货币体系被设计出来，黄金定价基准的机制就被冲破了。这样的一篮子货币机制有很多好处，但它却不是货币，也不是一个实物的计价单位。在这个特性上它们就逊色很多。现在它是一个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持的良好工具，同时也成为了提供对外援助的工具。发展中国家积极倡议特别提款权成为援助手段。在这个领域里，特别提款权有着非常大的好处，但是这和国际货币体系却没有有什么关系。让我们继续保留着特别提款权，同时也承认它不能成为货币吧。它是 5 种货币的加权平均，是一种提供外援的良好手段。

张军、林曙：那么您认为欧元区是一个理想的货币区吗？一些人认为，对于欧元区来说，有效的流动性水平太低，特别是劳动力的流动性。

Robert A. Mundell: 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公正的评价。人们只是看到国家内部没有大规

模的移民。人们没有看到德国人离开德国，没有看到在较为落后的地区，如波罗的海区域的国家的人口外流。人们只是没看到人口的大量流动。欧洲的人们大都很喜欢呆着他们自己的地方。但是流动性却并不缺乏。德国的劳动力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现在有大量的土耳其劳动力已经进入德国。现在需要的劳动力移民的种类和那些填补这些空缺的劳动力种类直接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别，而问题的根源却并不是劳动力缺乏流动性，而在于，如果存在劳动力过剩的话，在西班牙和希腊这样的地方的失业者的种类并不是德国这样的国家所需要的。

甚至在美国也存在这样的情况。现在的失业率为 7.5%，大约 200 万人口。随着劳动力数量的增长，不断有未受过教育的劳动者面临失业。他们无法获得现有的职位空缺。在法国，我听说了个有趣的数字：那儿有 300 万的失业者和 300 万的职位空缺。他们没有将这两个数字混合起来，是因为劳动力技能不匹配。这是结构性失业的一种。欧洲的问题同欧元引进之前的问题是一样的。在 70 年代，这种低教育水平的失业者在整个欧洲是非常多的。60 年代，欧洲政府支出大幅上升。我曾经做过一次这方面的研究，政府的支出在 70、80、90 年代平均占到了 GDP 的 25%。这个比重一直上升到了 50%，但是投向却不是基础设施，而是社会保障养老保险以及医疗计划。人们希望这样，政府在启动这些改革的时候也很不负责任地在迎合着人们。

但是政府却没办法筹集到足够的资金来为这些支出埋单，这造成了政府财政赤字的高企。意大利在进入欧元区时，财政赤字达到了 GDP 的 120%，希腊达到了 GDP 的 110%，比利时达到了 GDP 的 130%。即便是这样，仍然低估了问题的严重性，因为那些无准备金的负债也必须加以考虑。当你纵观数十年来的经济重创，你会发现政府都在无准备地利用财政预算来弥补支出。真实的债务规模要远远大于表面的。这些个别国家面临的负债或者说超支问题就像潮流一样在欧洲区内蔓延。

像希腊这样的国家在福利上的支出同德国的水平相近，但是它的人均收入却比德国低得多（德国人均收入是希腊的 2.5 倍）。因此，希腊陷入破产，必须得到援救。现在希腊不得不节俭开支，但是希腊人却将失业问题抛给政府解决，并进一步加深了财政赤字。无论怎样，希腊已经做出了一些重大改变。原来希腊的 1000 万人口中的 90 万是政府公职人员，这个数字近似于总人口的 10%，现在这个数量已经降到了大约 70 万。但是这仍然是不够的。不论怎么样，这都是一个重大的改变，强调人们必须做出一些计划以防止遭受损失。有些情况下，你必须制定一些税收政策，但是过高的税率又会导致一个无效率的经济运行。

解决这种困境的一个方法是采用更加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许多人都考虑到了这一点，这其中包括欧洲央行高层 Mario Draghi 先生。无论是什么样的指令，欧洲央行都表示绝不会采取任何会造成通货膨胀的措施。没有人想要这样的措施。但是也有另外一个指令，那就是为了拯救欧元，Draghi 将会采取一切措施。其中一种解决方式就是使得欧元的汇率走高。去年这就发生了，这是银行的失误。

要么各国都采取更负责任的态度，要么就必须有一个能够管制各国的更强的财政中央集权。如果想走出目前的困境，各国都需要稳定自己的支出。德国相比其他国家更加愿意借出更多的资金以帮助恢复其他国家的稳定。但是建立一个像欧盟区一样的货币联盟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主张。9个国家已经面临破产，其原因并不是缺乏财政联盟，而在于国家的支出。国家财政长官可以稳定支出的增加，也可以消减支出，但是这需要一个大面积的权力转移。

张军、林曙：中国采取了切实的步骤来稳定金融系统。最初，中国使用了一个固定的汇率体系来控制通胀，但现在，中国的经常账户出现了大量盈余。您如何看待人民币的重新估值？

Robert A. Mundell：许多人建议调低美元价格。在1997-2005年间，当人民币以8.28的汇率盯住美元时，美国人坚持称，应当将汇率降到4或者3人民币一美元。这会导致更大的失业率，同时摧毁中国的经济。在2008年，中国深受欧元区经济危机重创，因为随着美元兑欧元的升值，人民币也在兑美元升值。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将自己的汇率定在1美元兑6.8人民币的水平，并仅允许缓慢升值的原因。这种策略效果非常好。只有当维持固定汇率会造成过度通胀的情况下，中国才会考虑货币升值。

张军、林曙：中国在金融市场上对资本实施较强的管制。您认为中国应该放松资本管制吗？最后一个问题，您认为中国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天成为世界性的金融中心吗？

Robert A. Mundell：当着对中国自身有利的时候，中国就应当放松资本管制。我认为这么做的好处就是会使人民币可兑换。人民币也会立刻成为特别提款权的一篮子货币之一。放开汇率的管制会统一股票市场。上海在成为全球资本市场上会有很快的进展，这也会催生出更多的改革。信用评级机构也必须更加开放，才能够进入中国，帮助评级体系的建设。中国拥有成为世界性金融中心的潜质。

洞察中美关系

编辑整理：陈杰



Robert Zoellick

第十一任世界银行集团总裁、哈佛大学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采访人：**吴心伯**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复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网络安全”问题能够对中美关系产生全方面危害，因为两国在该问题领域缺乏一项明智的政策框架。」

吴心伯：您第一次到访中国是什么时候？一定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吧？

Robert Zoellick：1980年，我在香港担任研究员。我携夫人一起取道澳门到广东省旅行。彼时的香港与现在非常不同，我有机会亲眼目睹正在中国土地上发生的巨变。1989年，我随老布什总统访问中国。自那以后我又多次故地重游。最令我着迷的一件事情是去观察中国的其他（之前没有到访过的）省市。许多外国人关于中国的印象仅仅来源于游历京沪两地。而我在长期走访中国其他地方的过程中学到了很多。

吴心伯：在官方职责之外，您个人一直对观察中国发生的变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在您与中国打交道的过程中，什么事情是您感到最为有趣的、最吸引人的，或者最难理解的？

Robert Zoellick：在大学里我主修历史与经济——历史是我一生的兴趣所在，它令人

拥有独到的视角，以解读当前时事，纵观历史变迁。我通过历史环境来思考中国，这对于试图理解 80 年代以来中国发生的难以置信的转变显得尤为重要。我最近有读到一些以重新解读历史为基础的中国研究书籍，这些研究非常引人入胜，因为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叙事”——在中国话语中占据主导的一项叙事是“百年屈辱”，即清末中国积贫积弱，被迫与列强签订诸多不平等条约等；当下中国的大多叙事都与超越这段屈辱历史相关。这些历史非常耐人寻味，因为它表明，在过去 200 年间，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远比单一叙事要复杂：时而和睦友好，时而紧张恶劣，更有些时候仅仅是互动的问题。

中国和亚洲即将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理解中国的现代史以及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互动。邻国之间相互交流观点、探讨历史，对于理解历史和展望未来都非常重要。在应对安全议题，尤其是北朝鲜、钓鱼岛和南中国海争端等主权问题之时，做足历史功课十分必要。

吴心伯：除了对历史的研究，您在同中国政府打交道、同中国人相处的过程中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能否和我们分享一下个人互动方面的经历？

Robert Zoellick：第一点，与我同一代的中国官员都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当前这一代领导人而言，权力的危险性，动荡的危险性，以及在法治与社会碎片化之间维持平衡的必要性，都至关重要，并且有深刻的历史根源。

第二是在地方官员进入北京的政治环境之前去了解他们的观点。相比于在北京的交往，与各位党委书记在他们本省会面显然是非常不同的。

第三，西方人对（中国）政治制定过程并不具备非常良好的认知。这也与中国政治体制的相对不透明有关。

第四，在美国进行的有关中国对待国际关系的“理论”的辩论，一直受到个人互动中安全和经济议题领域的不同观点的影响。打个比方说，一些在安全议题领域和中国打交道的人，比如亨利·基辛格，可能会认为中国关于自身国际角色的观点是建立在中央帝国和朝贡关系等概念之上的。因此，中国对国家间体系的规范和规则的接受程度在可预见的将来难以提升。而另一方面，同邓小平和朱镕基两位领导人打交道的美国官员则对中国问题持有不同的认知，邓实施了经济改革，朱则带领中国加入了 WTO、接受了其制度与规则并推动经济体系转型。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面对着一个无可避免的问题：这个理念背后的意涵是什么？无独有偶，我发表的关于中国转变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演讲也引发了辩论，众人对这一概念的内在逻辑存疑。在西方，这一辩论的内容是：假设中国不愿接受当前的国际体系，那么究竟哪些（体系规则）是其意图改变的？

在解读领导人时，理解中国正面临的系统性挑战是非常重要的。中国人在过去 30 年内展现出了聪明才智、勤恳工作、奉献精神 and 充足的能量，所以，前面所提到的问题（中国对当前国际体系的态度）不仅涉及中国领导人的认知，同时还与为中国人民创造一个能有效发挥自身能力的国际环境息息相关。

吴心伯：经济议题和安全议题之间的张力在中国的政策以及美国的对华政策中都有所体现。中美两国在经济上是相互依存的，但在安全领域却存在着战略互疑。布什在任时推行强硬的对华政策，但与此同时，中国加入了WTO，而您当时正担任美国贸易代表一职。安全政策和经济政策之间是否存在着明确的界限？

Robert Zoellick：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历史问题，也能为我们洞察政策制定过程提供帮助。我在2001年初开始担任美国贸易代表一职，正值中国入世谈判期间，朱镕基前总理在中美双边协议问题上做了极大的努力。当时双边协议业已签订，国会也批准通过了中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但是多边规则的谈判进程尚在进程中。2001年，中国在上海主持召开APEC会议，我与国务委员杨洁篪（时任中国驻美大使）也在会议期间进行了谈判。当时正值中美撞机事件发生不久，两国之间紧张骤增，但这并没有影响到我就达成贸易协定所做的努力。小布什前总统坚信撞机事件不应妨碍中国入世进程，这反映了他力图将中国拉入国际体系的“融合”概念。下一个阶段则是“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即：秉持国际体系的系统性视角，帮助中国推进市场改革，进一步融入国际体系，并将对体系理念拓展到中美关系的其他方面。

吴心伯：就我的理解，2005、2006年同戴秉国进行战略对话的设想是在小布什总统第二任期内由美方提出的。当时发起战略对话的意图是什么？您如何看待中国的对美政策和中美关系发生的演化？

Robert Zoellick：我并不知道举行战略对话的设想最初来源于哪一方。在2005年进入国务院任职时，我承继了在副部长级别举行高级对话或战略对话的理念。这一理念与我力图完成的工作非常契合，因为在入世谈判圆满结束之后，美国的对外政策缺乏必要的战略焦点。中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外交部和国家发改委从未有过相互协作。戴秉国部长（2005-2007年任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央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外交部党委书记、副部长）的个性与职位，使得我们能够在双边对话中就广泛的议题进行交换意见。这反映出在中美领导人之间举行冷静的、相互的战略对话的必要性，正如六月份举行的习奥峰会那样。回顾中美关系的历史，战略对话在两国的同级官员都愿意以密切的方式参与到战略层次的时候往往能够取得最佳的效果：例如基辛格和周恩来、布热津斯基和邓小平等组合。对于超越对话层面、为双边关系的未来塑造框架而言，人的因素往往会发挥非常重要的影响。

吴心伯：您提及习奥峰会。作为共和党一员，您会如何评价奥巴马第一任期内的对华政策？

Robert Zoellick：政党分立是美国政治中非常重要的现象，但理解美国两党的内在连通性同样关键。奥巴马总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官员杰夫·拜德曾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我共同处理中国入世谈判事务；前驻华大使洪博培同样曾在当时和我共事；汤姆·多尼隆同我保持着良好的朋友关系。一些在奥巴马政府中地位关键的对华政策顾问同曾在小布什政

府中任职的人员关系密切。奥巴马总统在第一任期时，就试图（在处理中美关系时）留意面子和尊重问题，但他的这种努力并未如愿被中国领导人感受到，相反中国领导人认为他们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合作与尊重，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发生的误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再比如两国在人民币汇率问题和双边贸易关系上发生的摩擦等。结果，奥巴马被视为在对华政策上表现“强硬”。

“网络安全”问题能够对中美关系产生全方面危害，因为两国在该问题领域缺乏一项明智的政策框架。我们需要学者们的帮助，因为这一议题跨越了许多领域。军事间谍活动贯穿始终；商业间谍活动则是一个截然不同的过程，并有可能转变为破坏活动和战争能力。一些政策制定者和军事将领想要介入有关传统观念是否能够应用于网络领域的讨论，比如间接损害、热力追踪等。直到最近，中国政府依然不愿意同美方就此问题进行讨论。

在网络安全领域，中美关系的政治面临着一个危险因素，即：当对某一事物产生恐惧时，人们往往不知道如何进行妥善应对，最糟糕的惧怕情绪主导着他们混乱的思维。在一轮战略对话中，一方面我们需要协调长期发展；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对当前最紧迫的问题善加处理。我认为中美两国当下面临的最紧迫问题即网络安全和朝鲜问题。

吴心伯：您在2005年的一次演讲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利益攸关方”一词。时至今日，随着国际影响增强和国家利益扩展，中国对其应该承担的地区和全球责任有了越发清醒的认知。而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也要求中国分担更多的责任。那么，这些国家又准备在多大程度上和中国分享权力和声望呢？纵观2005年至今的美国对华政策思维，您认为这其中有什么演变吗？

Robert Zoellick：在安全领域，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两国拥有一系列共同的全球利益：能源安全、海上航道、全球反恐以及其他众多安全利益。中美关系的紧张更多是表现为地区性的。两国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是防止地区紧张压倒全球合作，在全球问题上增进合作反过来又有助于引导对地区性问题进行调解。

在许多议题领域，（美国国内）都有与中国深化合作的相关讨论。如果中美两国同心协力，他们将能够产生巨大的影响。如若不然，我们将在环境和气候变化、经济复苏、再平衡以及贸易体系等全球议题上举步维艰。我向世界银行引荐了林毅夫作为第一位来自中国的首席经济学家；国际金融公司的总裁和CFO都是中国人；朱民正在担任IMF的副总裁；我们都在鼓励美国与中国一道携手合作。

关于分享权力的要求，这又提出了一个问题：主权国家如何透过国际体系视角看待他们的国家利益？现存的国际体系对中国是有利的。经济领域存在着许多合作性的权力共享和共同利益的例子。而在安全领域，我相信领海安全和通航自由是各国的共同利益，空间和资源开发也同样如此。（美国同中国）分享权力的意愿是切实存在的。但是，美国的主流观点也认为，中国在共同承担责任方面表现得不情不愿、犹豫不决。

从国家利益的视角出发，对威胁的“认知”是共享性的或是互异性的，其间差别意义重大。

比如，朝鲜的核武器及其挑衅行为是真实存在的威胁，但中国的战略考量认为（区域）不稳定的威胁来得更大。尽管如此，利益上的共通之处仍然是存在的，因为如果朝鲜动用核武器，韩国、日本和美国将会以有损中国利益的方式做出回应。

中国和美国在经济议题上都表现得比较负责任。总的来讲，中美业已在经济领域建立了广泛的联系网络。尽管经贸摩擦和冲突时有发生，两国也应该确保对这些问题进行更为妥善的管理。相比之下，安全领域则缺乏这种广泛的联系网络，而这种情势是很危险的。

吴心伯：在2010年，IMF通过了一项改革议程，提升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经济体投票权的份额。截至目前美国国会依然没有批准同意。您认为此事在未来几年将会取得何种进展？

Robert Zoellick：（首先必须说明，）国会在这项议程的拖延并不是出于中国的原因。实际上，国会议员们对IMF和其他国际制度兴趣索然。尤其当他们试图控制预算的时候，更会对为什么应该付给IMF更多钱之类的问题刨根问底。他们更多时候在质疑美国对国际制度的过度参与，而不是试图控制这些制度。

早些时候我与共和党人在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和银行委员会会会面讨论IMF的份额问题。有趣的是，其中一位议员问我，如果美国不缴纳更多的会费以增加其份额，其他国家则将获得更多的权力，他们是否会因此感到高兴？美国的淡出会令中国拥有更大的权力和影响力，中国是否会对此喜闻乐见？我回答道，不排除个别中国人确实会乐见这种情况，但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都希望美国在这一机制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还有一点。尽管美国的人均收入高于中国，但以下情况同样非常重要，不容忽视：美国有很多人都在艰难地维持工作，支付账单，确保孩子们继续学业。他们都是普通大众，并没有支配世界的野心，而更喜欢待在国内安心生活。中国学者们在研究美国时，除了要同受过良好教育的学者和决策者们沟通，还应该尝试更广泛地关注美国的普通公民，如此才能切实感受到民主国家的领导人不得不应对的问题。

这个观念与我走访中国乡村城镇的个人经历有很强的关联性。有些美国人以为中国意图统治全世界；而事实上，（我看到的）大部分中国人仅仅希望过上更好的生活。他们见证了取得的巨大发展，在其中看到了个人发展的难得机遇，但也意识到了前方潜在的危险。他们并无统治世界的野心。

吴心伯：在您看来，“利益攸关方”和“新型大国关系”这两个概念有何异同？

Robert Zoellick：“新型大国关系”概念是中国领导层在研究国际关系史的基础上提出的。在西方的观念里，国际关系史可以回溯到公元前5世纪修昔底德记述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这场大战的起源是“雅典实力的增强及其所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即对崛起大国的恐惧。我想中国领导人希望借此说明，大国实力的崛起并不必然导致冲突，因此可以形成

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这一个非常有趣的理念。

至于这个概念与“利益攸关方”有何联系呢？这取决于领导人。我的看法是，建立系统性整合基础上的大国关系是可能的，但制定诸多细节将会非常困难。举个例子，中国计划推动经济结构转型、推进服务业增长，以便拓展商业机会、拉动内需消费，一种可行的途径是引进外资企业，帮助中国塑造在物流、电讯、财务等领域都具备更强竞争力、更高生产力的服务业。这一举措将在促进服务业增长的同时，为两国创造共同经济机遇，消除部分经济摩擦。除了进行双边合作之外，中美双方还可以在 WTO 推动全球服务业的自由化进程，这必将产生系统效应。国家议题或双边议题可以被纳入到有利于国际体系的框架内予以应对。

吴心伯： 布什家族和中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您认为政治领导人之间的个人关系对中美关系和全球事务有何重要意义？

Robert Zoellick： 私人关系有助于两国关系。他们不一定能够克服原则性分歧；但即便私人关系糟糕时，他们也并不必然会阻碍共同利益。在最低限度上，政治领导人之间的私人关系有助于帮助人们了解对方的政治困难，可能还会为解决问题、管理风险创造一个更有利的环境。

在内阁部长级别，领导人的个人态度会影响事态发展。有时候人们感觉贸易谈判是零和的逻辑。事实正相反，贸易谈判是一系列相互联系的解决问题的实践。理解对方的政治压力有助于谈判过程的推进。向对方表现出履行承诺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不仅仅是提出解决方案，更要令这些方案在自身所处的政治体制中切实生效。大国与小国相交之时，后者常感无助。而如果大国尝试着积极帮助小国解决问题，他们会心存感激。在任何官僚体制中，试图达成一件事都并不容易。重要的是，要进行战略性的思考，同时兼顾可操作性和细节问题。

吴心伯： 从比较的视角出发，您如何看待东亚地区一体化的潜力，尤其是相较于欧洲历史带来的积极的先例？

Robert Zoellick： “一体化”是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数十年来，经济学和政治科学两大学科围绕着区域体系和全球体系进行着经久不息的辩论。来自贸易领域的一个担忧是，区域集团的存在会妨害全球贸易体系。我一直认为上述危险是可能出现的，但是，这种担忧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区域一体化进程必然是在全球体系中发展的。每个国家都面临着挑战之一是：如何在同整个全球体系保持联系的同时，从对区域性的、跨国界的议题的参与中获益。这是欧盟成功度过的历史，也是北美一定程度上正在亲历的难题。随着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发展，这一挑战在整个东亚地区逐渐加深。从消除各种经贸障碍、降低关税、贸易互惠等举措中，我们都能看到巨大的收益。与此同时，保持全球视角至关重要。我一直在严肃提醒美国政府，当他们推动 TPP 或跨大西洋伙伴关系时，应该同时注重与全球体系保持联系，而不能试图以区域性框架取代全球体系。

一体化的另一个方面体现为安全领域，（东亚国家间的）原则性分歧依然长期存在。东亚地区对“一体化”概念的解读与欧洲后现代的、国际化的理解差异显著。在本地区，19世纪的（主权国家）模式相比21世纪的（一体化）模式具有更强的生命力。组织青年学生交流互动是处理历史问题的方式之一。德国对待二战历史的方式与日本明显不同，虽然我支持日本施行的民主体制，但日本政府处理历史问题不当的言行令人感到紧张。危险在于，甚至一部分受过良好教育的日本人，都认为他们已经为战争历史罪责付出了代价，根本意识不到他们对历史问题的认知与亚洲其他国家人民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分歧。

作为一个崛起的、地区影响力蒸蒸日上的大国，中国必须谨言慎行。强国角色日益深入人心，令周边邻国紧张不安，中国极有可能将要面对19世纪主权国家的均势制衡反应。在我看来，东亚地区的紧张通常与历史记忆和敏感问题（如领土、领海争端）有关，仅为争夺自然资源而造成局势紧张，不是什么明智之举。

东亚地区一体化的最后一个维度是美国的角色。美国在安全领域塑造了稳定的体系。尽管美国的政策并不完善，但中国必须承认，在东亚地区有许多国家都非常重视美国主导的安全稳定。如果中国被视为这种稳定局势的威胁，对任何国家而言都不是好消息。很多事情都可以有效地帮助美国及其他国家来接受中国的新角色。美国在东亚地区确立的安全框架，部分源自二战之后的历史遗产，部分源于精心制定的地区政策。每个国家都必须格外小心这一框架遭受冲击，因为东亚地区明显不同于21世纪的欧洲，在该地区内，敏感和敌对的特征都更加显著。

每次来到中国，我都能感受到智慧的冲击，不仅仅在经济议题上，也包括在其他众多议题领域。自1980年代以来这个国家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这一进程能否继续推进，取决于您这一代人是否将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妥善处理敏感点和相应议题。关键之处在于，尽管挑战接踵而至，中国仍将在国际体系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对于中国人而言，你们需要意识到这种角色必然造成其他国家的紧张。中国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将是意义重大的。德国人身处的一大困境是，自二战之后，德国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以便不被其他国家视为企图称霸欧洲。然而事实却是，德国在金融危机爆发后实际上主导着欧洲。所以对于德国而言，如何实施事实上的主导，却又不以统治者形象示人，是个非常重大的难题。令德国的朋友们感到沮丧的是，他们一边在财政上资助其他国家，还一边在遭受来自这些国家的批评。（我想对中国说的是，）欢迎来承担起大国的角色。在一定时期之内，这将会是美国和中国承担的角色。但是对于中国而言，大国角色具有不同的意义。中华民族将帮助世界为未来奠定方向，这个大方向对中美两国、以致全球体系都至关重要。想象一下我们生长的历史时期、所处的广阔空间，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时代机遇。

合作与共享是网络时代的愿景

记者：王娴



包弼德

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教授，哈佛大学地理分析中心主任。他从国家和地方两个层面研究 7 到 17 世纪间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史。他也是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与中国传记人物资料库的项目主任。

「如果不共享信息，科学家无法制定出最好的政策，人们也不会团结起来支持关乎他们生活质量的政策。所以就保护环境而言，共享信息是最简单、重要的起点。」

记者：能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地理信息系统（GIS）和您的服务中心吗？

包弼德：我对历史和地理的结合很感兴趣。历史分析总是和一段时间内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空间分析总是和一片空间内的变化联系在一起。作为一项技术和一种分析模式，地理空间分析可以在众多领域发挥作用。我们可以将它广泛应用于研究地域、历史、气候、军事、季节、全球石油分布等等。极佳的可视化是它强有力的优势之一。一幅图像可以胜过千言万语。

你可以这样理解我们中心，我们中心自己并不做研究，但是我们帮助别人将空间分析应用到他们的研究上。这是一个重要区别。你可以在我们中心看到做研究的访问学者、研究人员、学生和教员，你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全职专业 GIS 分析师。他们拥有良好的技术，可以指导许多不同的项目。我也坚信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性，比如我们和复旦合作创建了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

记者：您用 GIS 做了不少关于中国历史的研究，您得出了哪些结论？

包弼德：说到我自己对中国的研究，我对中国的行政系统随历史变迁很感兴趣：哪些地区发生了变化？哪些地区没有发生变化？我们看岭南地区，也就是两广地带。那里的行政中心在唐代比在宋代要发达许多。也就是说从行政的角度来看，岭南地区从唐代到宋代是后退的。其实一直到明代，那里才开始复兴，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行政中心。

我对政治精英是如何被组织的也很感兴趣，我主要从家族和空间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这些人哪里通过科举考试？他们住在哪里？在宋代，他们住在三四个不同的地区周边，这些地区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些知识分子精英团体带有明显的地域特征，并且与当地人口无关。一个地区在政治系统中的再现与精英特质相关，与人口数量无关。所以一些人口密集的地区在科举系统中并没有取得好成绩，另一些人口稀少的地区却人才辈出，在政府中占据要位。这意味着相比于来自其他地区的人，来自中国某些地区的人更具政治影响力。这可能是大家已经知道的事实，但我们可以把这些与其他信息相关联。我们考察哪些地方征收商业税，还有道学或者宋明理学的传播（发生于12、13世纪的新知识分子社会运动），看它们怎样与精英的分布以及考试系统相关联。北宋（1077）数据库显示了一些有趣的现象：道学的传播在贸易最发达的地区并不成功，但在集中了大量受教育知识分子的地方尤其成功。

就网络分析而言，如果我们看人口的分布，可以看到聚居地网络如何跨越行政边界，可以做空间分析。网络分析是很有趣的路径，我认为它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

几乎上述所有的研究都涉及到数据库，因为都涉及了大量人物。针对空间分析和网络分析，我们使用软件。

记者：作为历史学教授和地理分析中心的主任，您怎样看待学科的境界？

包弼德：事实上，网络分析源于社会学和数学。我当然是研究历史的，但是对我而言，如果我们在研究历史时提出了有趣的问题，那我们要尝试找到最好的办法来解答这些问题。当然，书本是研究历史的资料来源。在2000年以前，我只用读书的办法来研究历史，但这无法让我完全理解其他要素，比如作为事件语境之一的社会图景。假如我们从书本中提取数据，就可以知道社会图景中人们都住在哪里，社会图景中政府行政是如何被组织的，于是我们就可以建构出许多不一样的语境来理解人类活动。计算让我们得以在短时间内处理大量数据，这也许是传统历史学家望尘莫及的。

举个例子，假设我给你某种现象的1000个例子，你发现其中有30个是错的。这很重要吗？我认为在可以接受的误差范围内这没问题。但对人物传略类词典和单词类词典，我们要求它们的每一项事实与每一个单词都是正确的。这是数据库路径和词典路径的显著差别，但人们常常将两者混淆。在我的研究中，我有时使用大量数据资料，像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为了创建这个资料库，我们用计算的方法阅读书籍，记录下地名、人名、日期和官职

等资料。现在我们还要依靠人力来检查电脑的工作。我不认为那些想要拥有一本词典的人能就此得到满足。相反，我们提供的方法是更基于计算的。现在它还不够成熟完善，但这可能成为未来的一个选择。未来是多种多样的。即使出现了许多新的机遇，旧的方式也必将延续。

记者：您的团队怎样想到创建“世界地图”？这个项目有哪些新的开发？有没有与中国展开合作？

包弼德：“世界地图”依赖于所有开源代码 GIS 参与者所做的贡献。我们的机构有全职工作人员，我们也受惠于众多不在哈佛的人。这是合作互惠的。“世界地图”在 2012 年上线。一年内我们已经吸引了大约 8000 名用户，他们创建了超过 2000 张地图，来自超过 200 个国家的访问量更是达到了 35 万。我们的目标是创建一个世界地图平台。

“世界地图”真正的用意是实现网络时代的愿景，也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分享资料、合作互惠中受益。如果你分享你的资料，我分享我的资料，其他人看到了，把资料整合在一起，可能就会有新的发现。我做研究，等我做完了我就可以把研究成果与别人分享。这就是世界地图背后的理念，显然这是一个很好的理念，因为许多人正在践行这个理念。

我们想要和复旦彭希哲教授的团队合作，也就是社会数据研究中心，在线上实现空间数据可视化。我们的基本出发点是看到适合中国人使用的中国版“世界地图”。我们也在不断开发新的功能与应用，比如时间序列（可以随时间推移演绎变化），比如在“世界地图”上直接上传电子表格（众所周知的是微软的 Excel）。这是两项重要的开发。我们还将增加对上传的地图进行点评和排名的功能。当然我们也亲自制作教学地图。

“世界地图”的理念就是合作，分享，便于操作。大多数人或许并不擅长 GIS 和电脑技术，但“世界地图”操作简便。

记者：“世界地图”和 GIS 如何致力于改善环境和气候问题？

包弼德：如果我们想要帮助人们思考环境问题，最有效的办法是为他们展示正在发生的事，也就是说，给他们看地图。如果你想研究食品安全问题，碳氧化物排放问题，或者溪流污染问题，将数据可视化，以地图方式呈现。

比如在呈现空气污染时，我们把国家分割成县，每个县安装一到两个传感器，用以测量空气质量，提供不同的读数。有两种方式可以用来标记数据，一种是在地图上画点，用颜色表明污染的程度，也就是基于点的标记。另外一种是将相近区域的读数取平均值，然后用不同的颜色覆盖整片区域，也就是基于多边形的标记。基于点的标记更为准确，因为它意味着这个地方有一个传感器读出了这个读数。基于多边形的标记则将传感器的读数推广到整个

区域，得出的分布图看起来具有连续性，虽然有可能是错的。这造就了具有良好可视性的范围值分区地图。这样，你就可以用标记读数的办法描绘北京的天空。

环境问题就是信息问题。更好的环保政策能在美国推行是因为人们拥有信息，他们可以谈论这些数据可能带来的后果。通常大公司并不情愿减排，因为这要花钱，这意味着成本的上涨。有时候地方政府或者中央政府不够透明。如果不共享信息，科学家无法制定出最好的政策，人们也不会团结起来支持关乎他们生活质量的政策。所以就保护环境而言，共享信息是最简单、重要的起点。

记者：在控制环境污染方面，中国能向美国学习什么？人类应该怎样开展全球合作，共同应对环境与气候的变化？

包弼德：中国和美国的月亮一样圆，两个国家都有科学家在钻研环境问题。这取决于你怎样行动，怎样回应知识。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你每天努力学习，你可以获得成功，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就会每天努力学习。所以我要再一次强调信息透明的重要性。很少有人意识到他们的生活正被环境所影响。

如果我们回溯历史，20世纪是令人沮丧的，不是吗？因为无论我们找到了多少理由，掌握了多少知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是开战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拥有怎样的领导。如果他们足够机智，他们将引领我们走向合作。作为学者，我们的任务是尽自己所能，以保证我们的领导拥有完整的信息，能够机智从容地应对，所执行的政策将有利于我们自己的公民和全世界。这一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不存在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我们还能做什么呢？我们只能尽自己的努力。

记者：我们可以从历史那里得到哪些启示？

包弼德：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上周我和一群来自复旦和华师大的学生访谈，他们各自研究不同时期的中国历史。我们假设你正在和一位领导谈话，根据你对中国历史的了解，你告诉那位领导他应该关心哪些问题。我们发现历史并不明确告诉我们要怎样解决当下的问题，但是它帮助我们看清这些问题。人们过去的行为，并不表明好与坏，只意味着事实如此，他们就是这样做的，并不意味着我们也要这样做。蒙古人横扫中国、中亚和东欧大陆，所到之处杀戮无数，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也要这样做。历史无法诉说怎样算是正确的方式，但它告诉你哪些是你担忧的。我相信中国的历史研究者更有资格谈论中国需要担忧的问题。

记者：科技总是被认为是一把双刃剑，比如它在GIS那里发挥了作用，但有时候也会

奴役、破坏生活，您怎样评价科技？

包弼德：我认为科技是工具，你要明确自己的目的。我想这个想法可能源于庄子，“役物，不役于物。”这应该是在科技发展以前。他说的是人的占有欲，这也会奴役人。有些东西并没有多大的价值，但是你非常喜欢，你拼死都要争取它。这看起来很愚蠢，但人经常这样做，不是吗？我不认为被外物奴役是一个新问题，这是个老问题。我们应对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在应用科技时保持警惕。我不觉得科技是环境污染的重要因素。如果你说的是广义的科技，工业化应当被责难。环境污染最大的威胁是全球变暖，这与工业化相关，像碳化物的排放，汽车，发电等等。

培养提供个性化服务的护理技师

记者：李钰恒



陈宏图

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高级研究员，多次担任美国国立卫生部门的研究项目总监。现任美国《国际老人杂志》主编、哈佛大学亚洲中心老年研究项目部主任。

「建国以来我们国家培养了大量护士，因此在护理技师的基本生活护理培养方面我们拥有大量培训资源。但是很少有人能够教授对特殊老年病人如痴呆病人和艾滋病人的专门护理技术，这是将来需要发展的一个缺口。」

记者：您在演讲中提到了护理技师，您认为现在中国对护理技师的市场需求度如何？

陈宏图：目前上海市和其它城市正在为所有的空巢老人配备家庭保姆，即护工。护工能够为老人扫地做饭，但一般不会帮老人作进一步的理发、打扮或者配药工作。特殊群体，特别是生病的人，很需要这些护理技师，但现在往往没有成形的训练资源（即培训者）。

记者：目前中国一般的家庭能否承担得起护理技师的费用？

陈宏图：国家正在考虑这个问题，我看到上海市内某些街区在做有关的工作：计算你和你子女的收入，从而决定你是否可以得到一个免费的护工。

记者：这个护工是阿姨层面还是更为专业的护理技师？

陈宏图：阿姨层次，即使是阿姨层次也不能满足（有需要的家庭）。这些免费的护工同时帮助几个家庭，但有的护工给受助家庭“耍滑头”：“老伯伯啊你的衣服不用洗啦，这个衣服还是很干净的；昨天饭没有吃完今天不做了，省一点。”

记者：遇到上述情况我们应当如何监管？

陈宏图：监管是目前的重要问题。受助家庭可以跟居委会反馈，但目前缺乏实时反馈机制，家庭能否自由反馈、老人的意见能不能得到及时回应、很多老人害怕受虐待等都是问题。反馈和监督是两个谈起来容易施行起来很难的问题。这两个问题的落脚点在于训练体系和管理体系。

记者：您能跟我们具体介绍一下训练体系吗？

陈宏图：建国以来我们国家培养了大量护士，因此在护理技师的基本生活护理培养方面我们拥有大量培训资源，比如如何照顾老人吃饭、起床等，这些都很容易普及。与之相比，能够教授对特殊病人如痴呆病人和艾滋病人的专门护理技术的人就少多了。这是将来需要发展的一个缺口。

记者：您谈到护理技师需要同时考虑老人的生理和心理问题，生理是说像癌症这样的病症，心理是指老年人的尊严吗？

陈宏图：不仅仅是尊严，刚才香港学者也提到了老年人的无聊问题，有些老年人在屋子里生活平淡得像坐监狱。其他问题还包括忧郁症和孤独等等。老年人有社会性需要，如果在一个陌生的老人院里没有朋友，简单按照作息时刻表生活，对于他们来说是很没有意思的。尽管养老院里有其他老年人，不过人们还是喜欢跟熟悉的、知道自己历史的人交流。有的人年纪越大越内向，只有跟家人朋友在一块才会觉得自在。

记者：您提到了为老人进行个性化护理管理，具体指什么？

陈宏图：受过训练的技师到各个家庭工作是统一的，不是个性化的。事实上现在有很多护理单位，但需要帮助的家庭可能并不清楚自身的需求，即便清楚也不知道去哪里去找相关的服务，哪个技师最合适，他们甚至会逐个给护理单位打电话，因此就需要一个管理者，一个护理经理。

由于每个地区的资源不同，管理者需要清楚掌握当地资源的情况。比如谁需要什么样的照顾等等，以便能够用所学知识进行测量匹配，满足各个家庭的需求。日本和美国要求这些管理者拥有硕士以上学位和在当地工作三到五年以上的经验。

具体来说，现在很多老年人刚刚退休，身体很好，但是不知道如何发展自己的兴趣。这往往是心理医生所不能解决的问题，需要和社区资源相联系，比如上老年大学交朋友，或者重回故乡、外出旅游等等。再比如，有的老人被诊断出可能患有老年痴呆症，家庭成员可能会翻书寻找解决途径。但管理者可以为他们介绍两个前年就收到过同样诊断的家庭，这些家庭拥有相关经验可供借鉴。此外，管理者还能够为他们介绍专门的护理人员。总的来说，这些管理者所知道的资源比一般家庭多得多，他们能够起到资源介绍的作用。

记者：这些管理者需要的社区工作经验如果放在中国，是指在居委会工作吗？

陈宏图：居委会中随便一个人不会知道当地谁拥有医学知识或对口的老年护理经验。在美国，这类资源的介绍越来越重要。在社区之外，有些州在医院里也会设有这类管理者。如果你在一家医院诊治后，并没有完全康复，管理者会帮助你与医院联系进行衔接，确定是否转院。

记者：这些管理者属于私人公司还是政府部门？

陈宏图：都有。一般而言，这类服务是以一个适中的区域为单位，如果地区过大，一个机构不可能知道当地所有的服务。如果引进到中国来，这些管理者可能在居委会或者民政部，也可以在医院，取决于率先发展哪一部分的服务。

记者：您提到了护理技师推广的难点包括职业满意度低的问题，可以具体介绍一下吗？

陈宏图：职业满意度低有很多原因。有的老人脾气不好，会骂人，把护工当做下人看待。此外，老人的家人可能也会剥削护工，比如护工来照顾老人洗衣做饭，他们会说你把我的衣服也洗了吧。这对于很多护工来说是无法接受的。护工抱怨跟老人的家人无法交往，这是最主要的问题之一。

建立自平衡交互盯住的国际汇率体系

记者：车锐



陈学彬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研究院教授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只履行救济职责，而我们实际上需要一个新的体系，制定规则约束货币发行和汇率波动。」

记者：请问您认为全球目前的货币体系存在怎样的问题？

陈学彬：目前大家比较关注储备货币的问题，究竟应该盯住黄金、美元、人民币还是非主权货币？但是我们必须要注意，在目前这样一个多元化时代，这更是一个汇率安排的问题。

蒙代尔在今天上午发言中提到了汇率安排的历史，从金本位发展到布雷顿森林体系，再到自由浮动的汇率体系。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期间，国际货币汇率与物价是稳定的，但是也暴露了世界货币汇率对单一币种过于依赖的缺点。而自由浮动的好处在于可以利用汇率调节各个国家的经济失衡，缺点是造成了大量的汇率波动，导致危机的诞生，有些国家把这种汇率浮动当作了解决国内问题的工具，形成了汇率战、货币战争。

过去国家对于汇率的干预都是直接的，例如在外汇市场上买卖外汇，但这样的干预会遭受指责。近年来欧美和日本连续推出量化宽松政策，通过大量发行货币引导公众预期，导致资金从国内流出，让自己的货币大幅度贬值，比如日元兑美元的汇率从 70 多贬到了 103。这种大幅度的贬值会给其他国家带来了很大的冲击，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 G20 会议都不对他们进行批评谴责。

记者：这样的货币战应该如何约束？您有怎样的建议？

陈学彬：要靠本国的政府自己约束货币发行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总是为了自身利益。所以我们要探讨利用外在约束去阻止超发货币带来的溢出效应。蒙代尔上午也提到了，世界贸易组织履行了约束贸易壁垒、贸易战的职务，那么货币上也要有这样的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只履行救济职责，而我们实际上需要一个新的体系，制定规则约束货币汇率。

我给的政策意见是建立交互盯住的国际汇率体系。各国应该相互盯住一揽子货币，对这些国家的主要贸易伙伴国的货币采取浮动汇率政策，以一揽子货币取代单一货币作为名义锚，以减轻对单一国家的依赖。当汇率在一定范围内浮动，那就不实行干预政策，但是超过这个范围，就必须实行一定的干预，这样就可以稳定贸易伙伴之间的汇率关系。以日本为例，超发货币的行为就要被约束。任何国家想通过多发货币导致大幅贬值，都是不行的。另外如果一个国家货币要求贬值，那么相应的国家也要货币贬值，保持汇率的稳定。

这样的政策有两大优点，第一是盯住一揽子货币以后，就不会让升值贬值发生得过于频繁。第二点是它约束了部分国家超发货币，摆脱对单一货币的依赖，汇率的浮动就很小了。这样的政策还引进了汇率的趋势性调整。如中国这样贸易顺差过多的失衡现象，在顺差或逆差超过 GDP 的 3% 时，这样的货币体系应该调整汇率，将失衡程度控制回 3% 以内，这样经济体就有自动平衡机制，体系就可以持续。所以必须吸取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教训：美国盯着黄金，其他所有国家都盯住美元，关系固定了，经济失衡后无法调整。因此交互盯住体系的优点在于：它既吸取了金本位、固定汇率、稳定汇率、稳定物价的优点，同时又避免了固定汇率不能调节失衡的缺点，可以自动实行平衡，是可以持续的。

记者：我想问一下这样建议的可操作性如何？

陈学彬：暂时可操作性还不具备，因为当前世界还是比较认同汇率的市场化，他们还没有认识到大家应该合作协调。当前我们也能看到，量化宽松的结果是输出通货膨胀，导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受到影响。因此我们必须提高重视，因为这个问题是世界性的，不仅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这是对世界各个国家的共同约束。这个问题就像大气环保问题一样，我们要创造良好的金融秩序。

记者：中国银行行长周小川建议取消贷款利率浮动下限。您怎么看？

陈学彬：利率的市场化是一个大趋势，推行都是时间上的问题。

记者：请问您如何看待中国目前高货币化的情况？它可以被中国独立解决吗？

陈学彬：我认为任何国家独立解决都是比较困难的。当一个国家把刺激经济放在首位的时候，它就会不受限制的发钞票。但是如果有相应的汇率制度安排的话，其他国家就可以对其造成制裁。

我国在城镇化问题上需要补课

记者：程向心



段成荣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院长

「城镇化，其本身就是目的，就是为了人过得更好、更有尊严、更体面，那么就按照更体面的方式来实现城镇化。」

记者：日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测算》课题报告出炉。报告指出，推动城镇化，一个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为 8 万元。4 月 10 日，知名财经评论家叶檀博士在其文《农民工市民化不应画饼充饥》中此作出回应，她说：“农民工市民化并不困难，之所以迟迟无法推动，是地方政府在莫名的害怕中不愿承担责任的结果。”对此，您怎么看？

段成荣：城镇化是我们的方向。在过去几十年里，农民工已经做出很多贡献。正如在上午论坛中所谈的，基于很多专家的研究测算，农民工对于国家 GDP 增长的贡献是很大的，保守估计也在 20% 左右。所以说，就算这 8 万元是成本，其实也是他们在早先劳动中交出来的。即便是从功利目的讲，利用政府财政实现农民工城镇化，也是无可厚非的。何况看待这个事情其实并不应该如此功利，城镇化本应是我们发展的方向，应该让我们的公民有尊严地活着。

落在政府身上，需要改变的可能是其发展的眼光。过去几十年，在我们很穷很落后的情况下，我们以快速发展作为目标，追求 GDP 的发展。这在一定的阶段上有其合理性。但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应该说我们存在两个关系的协调。一个是社会发展明显滞后于经济发展，还有一个是人口的城镇化明显地滞后于工业化。这些是需要补课的。所以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拿出一定的资源，来补这个课，把我们这个社会发展补起来。这本身是为了追求我们科

学发展的必不可少的一个内容。

从地方政府角度来讲，这也涉及到传统观念的问题。对于一个地方政府，其可能会觉得做这个事情见效慢，甚至可能在短期内成为其包袱。但是如若从长期社会和谐等角度看，这方面的投入非但不是个包袱，反而在社会关系的平衡上是很有帮助的。我们要避免短视。

记者：在面对新生代民工流动中，不可避免地涉及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在上午的讲演中，您也提到，在异地高考政策的制定上，教育部所提出的大多是粗线条东西。为了相关政策可以保障落实，您认为在顶层设计方面可以有什么细化的举措么？

段成荣：这就涉及现在我们在讲的要加强社会改革。改革需要更多地加强顶层设计，不能让大家各自为政。各自为政有可能实现局部利益、地方利益或者是某个阶段利益的最大化，但是整体不一定会最大化。比如我们最典型的环境问题。历史上看，我们牺牲环境，取得地区阶段性的经济发展，但是最终对整个国家造成的污染几百年甚至上千年都治理不过来。这个代价是很沉重的。

就像环境问题一样，在社会发展领域遇到该解决的问题，如果我们放解决的步伐不去解决，今后我们付出的代价也会很大。

在顶层设计方面，我们的目标其实已经很明确了，比如十八大提出的市民化问题。所谓市民化，简单讲就是使外来人口变成当地人，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全覆盖，就是“公平对待，一视同仁”。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这些好的理念落实在就业、收入、住房、保障、教育等每个具体的层面、具体的领域，包括每个具体的地区和城市，在重要的领域要大家齐步走。

记者：对于民间想要解决异地高考的愿望越来越迫切的情况，您在前些年也回应过，表示异地高考是可以解决的。您说“可以把学生和家長联系起来，比如把学生的学习时间和父母的就业、社保年限联系起来，有三年或五年的要求。”对此，您认为，在中央统一政策框架下，地方政府部门需要做哪些功课呢？

段成荣：我们强调顶层设计要统一政策，和地方政府发展之间并不矛盾，在实施政策过程中，并不排斥，甚至应该鼓励一些有条件的有远见的地方政府，更大幅度地往前进展。

流动儿童到了城里面，应该怎样办教育。国务院提出了“两为主”的政策（以流入地管理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在很长时间内，大家也都按“两为主”在办，成效也不错。但是两年前，江苏省政府就积极起来，并不完全秉持“两为主”，而是明确规定为“流入地地方人民政府的责任”。江苏省政府此举是应该鼓励和推动的。

对于异地高考，大约每年有 30 万的孩子面临这个问题。他们是等不起的，政策上的任何一天拖延都是不负责任。现在有人担心，如果给了异地高考的政策，会不会有人钻空子。我想，任何一项社会政策下来，都是会有空子的。我们需要的是对绝大多数人有利公平。应该做的是想办法，尽量堵空子。比如说，将户籍学籍联系起来，限制家长在流入地的年限、参与社会保障的年限等。这就大大减小那些试图利用异地高考政策钻空子的人成功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讲，异地高考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段成荣：在美国，非法移民的孩子也是被要求必须进入小学、中学进行教育的。对此，您以为，在国内学校对待农民工子女问题上有什么参考价值吗？

如果十几年前，地方政府、教育机构还可以以财力不够来推诿问题，那么今天我们已经没有这个理由了。今天我们有这么大的财政盘子，可以把教育办好。3000 多万流动儿童能不能接受良好教育，对这些孩子和他们的家庭都有非同寻常的影响。

义务教育应该是由相应的政府机构将其完全贯彻。当然，因为流动人口分布不均匀，少部分省市压力可能会比较大，那么中央财政支付就要管起来。我们财政体系是分级负责，那么义务教育财政投入也应分级负责。我们的流动人口有跨省的，有省内跨地市的，有市内跨区县的，有县内跨乡镇的。中央政府可以负责跨省儿童的义务教育，省级政府负责本省范围内跨区市的，地市级政府负责跨县的，县政府负责县内跨乡镇的，这就都负责到了。其实这个问题在省内大部分地区都解决了，主要还是跨省的问题。

记者：2012 年全国城镇化率已达到 52.57%，但户籍城镇化率只有 35.29%。您认为近期可以将中国的城镇化改革推进到怎样一个程度上？

段成荣：本届政府将城镇化作为整个改革和发展的主要突破点，我预计其可能会在城镇化的方向和目标上比之前做得更好。对此我最大的想法就是避免把城镇化工具化。比如，现在发展经济遇到障碍，有人就有想法将城镇化变成经济发展的一个工具，这就违背了城镇化的初衷。

应该说，在整个人类的现代化进程中，城镇化是一个基本的组成部分。而且我们国家在这方面其实是落后的，需要补课。在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原原本本地，按照人们都要进城这个初衷来设计它，这是最重要的，不要把目的和手段工具混淆。城镇化，其本身就是目的，就是为了人过得更好、更有尊严、更体面，那么就按照更体面的方式来实现城镇化。

对于城镇化的问题，我可能回答得并不完全，但有一条，就是考核的指标体系——怎样根据科学发展观的原则考核官员——这个指挥棒去了，他们自然就跟去了。这就又回到顶层设计的问题了。

全球都面临着精神卫生挑战

记者：丘美芳



费立鹏

世界卫生组织中国精神卫生司顾问、国际预防自杀协会财务秘书兼中国总代表、美国中华医学会学术顾问，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危机干预研究室特聘主任。

「亚洲国家目前需要将更多的资源放在精神卫生领域，以缩小资源与疾病负担大小的差距，然而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心理卫生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也加大了资源配置的难度。」

记者：最初，您提交给上海论坛的演讲题目是“亚太地区的精神卫生挑战”，为何用“挑战”二字？是因为当前亚太地区的精神卫生状况不容乐观吗？

费立鹏：全球都面临着精神卫生挑战。世卫组织也刚刚出台全球精神卫生的计划，认为全球精神卫生面临严峻形势，而大部分国家都没有好好对待此问题。亚洲国家跟拉丁美洲、非洲等国家的情况不同。艾滋病等传染病仍然是非洲国家当前面临的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亚洲国家经过多年的发展，传染病状况已经得到控制，慢性病的疾病负担更大。而在慢性病的疾病负担中，精神卫生疾病占了较大构成比。亚洲国家目前需要将更多的资源放在精神卫生领域，以缩小资源与疾病负担大小的差距。然而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心理卫生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也加大了资源配置的难度。

记者：为何精神卫生问题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制约亚洲各国加大对精神卫生投入的因素是什么？

费立鹏 历史上,传染病占亚洲疾病负担的比重最大。最近三十年,传染病被控制得很好,疾病负担的60%至70%逐渐集中在慢性病。过去,对慢性病的关注主要针对癌症、心血管疾病,精神卫生疾病却极少受到重视。从原先关注传染病治疗,到关注慢性病、重视精神卫生问题,这个过渡需要一些时间。

近年来,精神卫生的重要性才逐步被卫生部门、公安部门认识到。但与此同时,临床医学部门却一直没有承认精神卫生的相对重要性,临床医务工作者对精神科的歧视依旧根深蒂固。这与医学院的学科分布以及课程设置很有关系。医学院建立之初,精神科只是神经科的一个小分支,课程占比很小。现在,中国五年的医学本科教育中,精神科培训也仅有四十个小时。医院医疗服务资源分配过程中,由于歧视,精神卫生领域所能获得的资源很有限。医院的其他科室也不愿意被削减资源投入的比例。这些都制约了亚洲各国加大对精神卫生的投入。

记者: 您对亚洲国家精神卫生状况有何展望?

费立鹏: 世卫组织新出台的全球卫生计划报告中提到,过去20年,亚洲国家中韩国自杀率提高了三倍,中国则下降了一半。同样是亚洲国家,自杀率却有差异。同一个20年,亚洲各国对精神卫生投入状况不同,提供精神卫生服务的方式不同,在如何提高群众对心理健康问题的认识方面,各国遇到的问题和要采取的措施也不同。亚洲不同国家的精神卫生状况有所不同,没有一个模式对所有国家都适用,要想有突破性的改善,需要针对不同国家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措施。

泰国很早就承认了世卫组织关于疾病负担的报告,资源也按照疾病负担比重来进行分配,精神卫生领域在泰国得到了足够的重视,所以其精神卫生状况得到较大改善。中国也逐步承认疾病负担结果,但并不是直接根据该结果配置资源。现在,亚洲各国对疾病负担的承认情况有所不同。如若各国愿意按照本国疾病负担数据分配资源,对精神卫生领域将有极大促进作用。

从研究角度来说,在精神卫生领域,亚洲各国需要更多跨学科跨专业的研究来帮助调整精神卫生服务系统、预防歧视等。这些研究也需要得到更多的资金和人才支持。

记者: 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正式实施。在您看来,该法出台的目的和意义在于什么地方?现行的这个法律还需要改进的地方在哪里?

费立鹏: 中国的精神卫生法历经27年修改,时至今日出台,无疑对精神卫生事业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也反映出近年来相关部门对精神卫生问题的关注增加了,对这个问题相对重要性的认可更多了。

但该法还有很多细节有待完善。如关于“非自愿住院”的相关法规，我们需要对“重症精神病”“对社会有严重危害”等概念做详细而明确的定义。该法提倡社区化服务，但却没有提具体的操作方式。为此，我很担心该法的落实情况。

中国还需要在对该法的效果评估上投入更多资源。我认为相关部门现在需要对国内的精神卫生状况进行一个非常细致的评估，5年后再次评估，然后将评估结果进行对比，从而切实地了解该法的实施效果，并根据效果对一些法律法规进行调整。评估必须细节化，如调查不同地区人们对精神卫生问题的态度、谁提供精神卫生服务、服务人员的培训、服务覆盖面、资金投入状况等等。而且，这个评估机制必须落实到位，拒绝官僚作风，不能一味宣传法律实施的好处。

记者：中国近年来对精神卫生问题的关注更多，是因为问题更严重了吗？

费立鹏：我不认为中国的精神卫生问题更严重了。尽管一些报告认为精神疾病患病率上升了，但这与实际并不相符。近年来，公众对抑郁症、焦虑等问题更敏感，更愿意说出自己的心理状况。以往患精神疾病的人大多选择隐瞒，所以当时的精神卫生报告显示中国民众的患病率极低。精神卫生问题之所以会被认为更严重，是调查研究数据不够准确或其它因素造成的。实际上，除了酒精滥用问题，其它精神疾病的患病率并没有明显的上升。

富士康员工跳楼自杀事件引发了更多对进城务工人员心理健康状况的关注。但是现在国内的研究质量仍不高，还无法准确描述现状。对精神卫生问题的关注增多是个好事，中国需要在精神卫生领域投入更多资源。

记者：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农村自杀死亡人数是城市的3倍。如今，这个状况有什么改变吗？

费立鹏：现状有所改变，一是中国自杀率下降了一半，二是农村自杀死亡人数降低为城市的2倍。但我们需要考虑流动人口在其中的影响。20年前，流动人口的比例远没有现在这么大，而现在大部分农民流动到城市居住。我们很难清晰界定自杀死亡是属于农村的范畴还是城市的范畴。

以往中国女性自杀死亡率比男性多25%，而现在接近1:1，跟大多数亚洲国家相似。女性自杀死亡人数中，农村女性占多数。以前，喝农药是中国最主要的自杀方式。现在这个比例估计有所下降，但依然占主要比重。一方面，相关部门对农药的使用加强了监管，另一方面大多数农民变流动人口之后，获取农药的途径没有之前方便。

记者：中国推行精神卫生社区服务的现状如何？上海建立健全社区化服务要解决哪些问题？

费立鹏：中国的精神科大夫不愿意到基层服务，尤其是到农村的卫生站。提供精神卫生服务的重担压在了基层综合科大夫身上。但他们本身就肩负着繁重的医疗任务，加之专科培训背景较差，很难胜任精神卫生服务工作。新出台的精神卫生法又缺乏对具体操作方式的规定。

上海有较多的资源，资金、人才方面问题不大。要建立健全社区化服务，必须解决以下两个问题。一是规范社区卫生站综合科大夫的精神卫生服务工作。上海为基层大夫提供精神卫生医疗服务的培训，但是却缺乏对服务落实情况的监督，很多受精神卫生问题困扰的人难以在社区得到早期治疗。第二个要解决的问题是要改变百姓对社区精神卫生服务的态度；让更多的普通百姓愿意到社区卫生站接受服务而不是一味到综合医院、三甲医院就诊，让更多的百姓在有心理问题时愿意选择就医而不是以之为耻。

同时，我也希望在社区建立一些组织，让精神病人的家属能够发出更多声音，帮助减少歧视、防治精神疾病。

人类仍然是生态圈的中心，但是我们要担负起责任

记者：耿璐



葛剑雄

复旦大学教授，历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曾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现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

「亚洲智慧给予我们的大启发就是如何在有限的条件下充分利用简单的办法控制复杂的局面。」

记者：近些年来，全球极端、反常天气现象愈来愈多，很多报纸报道时会把这归因为“全球变暖”，那么您认为这种说法是否准确？

葛剑雄：这种说法很笼统。实际上，我们对人类、气候变化的了解深度与广度都是有限的，尤其从时间序列上来讲，我们能用仪器观测气候的时间很短，例如上海，只有 140 多年，全球观测最长的点也不过一百七十年，那么用这样一个有限的知识去解释长时段的变化是很不够的。另一方面，一代人的感觉并不能代表气候变化的全部。比如上海的极端最高气温就并未被刷新，现代人从小生活在空调环境中，对冷热的感受会特别的强烈，同时，观测地点周围发生了巨大变化。140 年前的徐家汇都是农田，现在都是高楼，“热岛效应”也会影响观测数值。因此，一概地说是全球变暖导致的极端天气是过于轻率的。

记者：那么您对于反常天气的原因，倾向于自然变化还是人类活动的加速呢？

葛剑雄：现在讲这些判断，为时过早。目前很多人极端地认为全球变暖是人类活动和碳排放增加的结果，但是这样就很难解释工业化阶段前也同样出现的极端的天气。以我们的观测，以往几千年里面也有好几次以一千年左右为周期的冷暖变化。但是反过来，这些年的记录也的确证明碳排放的增加是起了作用。

实际上，最科学的讲法是人类活动与自然变化的合力。但是究竟哪一种为主，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因此，关注人类活动对自然的影响同时，我们还要更加深入的研究自然本身。因为自然本身产生的能量往往比人类大的多。例如，菲律宾皮那图博火山爆发，仅仅这一次爆发就使亚洲的随后几年北部冬天平均气温下降了。原因是火山的尘埃弥漫在空中，挡住了阳光。那么如果几座火山同时爆发呢？正如我发言中提到的，现在还有很多我们没法解释的不可预测的原因。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要保持谨慎。

记者：那么人类在生态圈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又应做出些什么呢？

葛剑雄：人类仍然是生态圈的中心，但是我们要担负起责任。人类更多的应该在追求物质的同时，追求精神的进步。很多反应是不可逆的，主要能源是一次性的，尽管理论上讲物质不灭，但是等到能源再一次形成，不是我们可以预测到或等得到的。

记者：不管是政府制定政策，还是企业在建立初期的规划，都会考虑到环境与经济之间的关系，那么两者之间是否永远是矛盾的，是否可以磨合以及寻找到平衡的状态？

葛剑雄：两者之间永远有矛盾的，而且不可能绝对平衡，仅仅是相对的。追求一劳永逸的、只有利没有弊的方案是天方夜谭。实际上，我们只能在利和弊之间，寻找利益的最大化，把弊端尽量减少。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总会产生矛盾。实际上，人类历史上每一个进步都是以破坏环境为代价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代替了自然环境；人类学会了用火，从生食到熟食，这中间也耗费了大量燃料；即使是目前很热衷的风能开发，在草原上建的风力发电机，也影响了风塔下的草的生长，并且在我国这样一个多风沙的国家，风沙对发电机的侵蚀是很严重的，那么这些机器会较早的报废，被替换下的废物也是浪费；而像太阳能用的防护材料生产过程中也会产生污染。我们无法找出完全的“利”而无“弊”。因此要尽可能控制在适度范围内，权衡利弊后找到比较合适的程度。

在环境问题上，我们更应该强调的是规则，不是感情。极端的环保主义我是反对的。它们认为，只要是环境就不能动。但环境的最后中心还是人类，但是我们所讲到的人类中心不是狭隘的个别的，而是广大的人类利益，包括我们的后代。这样的中心，在可以预见的未

来中，还会是主流的。人类需要更理智的、更具有智慧的担起这个责任。如果轻易的避而不谈人类中心，也是我们做不到的，也是没有必要的。

记者：您刚才提到的贫穷地区，由于经济发展程度低，资金不够，面临的环境问题与发达地区不同。那么这样的贫穷地区经济发展还是首要的么？

葛剑雄：首先，发展是硬道理。我很赞成一些学者提出的，我们发展需要改善环境，但更重要的是人民的生活。如果让贫穷的地区为了环境保护放弃工业化，是不顾伦理道德的。固然，我们希望欠发达地区一开始拥有更好的环保理念，但是不能指望欠发达地区做牺牲。现在碳的购买也面临这样的问题，金钱与环境价值不完全对等。

其次，他们的发展，除依靠自身的提高外，发达地区和国家也负有责任，要主动帮忙制定正确的政策，借鉴自己的教训，使他们有比较高的起点，一开始就拥有较好的环境理念，同时给予资金、技术的支持。因为今天的环境造成的不良后果不是这些未开发的地区造成的。地球是无边界的。

现在一些城市往往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把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转移到农村，这种饮鸩止渴、以邻为壑的行为我们必须制止。例如，水源地尽量不要发展污染的工业化，用水的地方给以一些补偿，上下游是一个共同的利益体。一个地区、一个省、一个国家、一个地球，都是一体的，这样看待环保，才能有效避免欠发达地区发生新的污染与破坏。

记者：您提到欠发达地区的环境问题，其实发达地区本身也存在很多问题，例如pm2.5等等，它又该走怎样的道路呢？

葛剑雄：我们一直倡导要走绿色的、可持续的、有节制的发展道路。如果人类一味的追求物质生活的话，最终导致的是物质消耗、提前枯竭。大家过于忙碌与紧张，是为了迅速的富裕，更加的富裕。但房子不是越大越好，追求小而精，更加关注休闲，使得生活质量更加提高，或许总体经济发展会稍微缓一些，但是个人的生活质量会得到更大的提高。

我们现在一看到其他国家经济增长只有一个百分点或者保持不变，甚至还有所下降，我们就觉得是坏事。其实，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是不需要过多增长的。现在，我们不能被物质生产度牵着鼻子走。日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日本的人口密度要大于我们，但是却可以保持着百分之六七十个森林覆盖率。如果每个人都要住别墅，那日本会变成什么样子呢？现在中国新农村的典型就是家家都是别墅，其实很多空间可能都被浪费了。因此，这就需要政府节制，主流文化和相关学者带头实践这一点，控制社会不必要的物质需求并追求更好的精神追求。

因此，关键还是要拥有更美好的精神文化追求，多着眼精神，而不要狭隘的只看得到物质生活。

记者：这就是自然资本承载门槛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吧？

葛剑雄：对的。幸福度是有主观参照系的。如果主观参照系不断被调高，客观物质就很难满足，永远追赶不上。主观调高背后是有着文化的驱使的，所以我们要提倡这样的一种哲学的思考，拥有这样的哲学智慧。

记者：环境问题最终还是要落实到人的身份上，不管是政策的制定，还是个人的行为，都需要环保意识的树立，但是这应该也会是一个比较漫长艰难的过程吧？

葛剑雄：这个牵涉到很多，比如人的信仰、社会的基本价值观念、社会的制度等等一系列，比如社会的政治动员能力、控制能力、约束能力等等，还有外部环境的影响。例如我们的决策是否科学民主，是考虑到人类的共同的利益，还是被某些利益集团所绑架，每个国家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比如电力集团就想促使大家多消耗电能，汽车集团就千方百计让汽车产业作为国家支柱等等，因此政府需要负起责任来，发言权、行动力比较大的人与集体要重视起来。

记者：您对于亚洲智慧怎么看？

葛剑雄：从科学的角度看，不存在单纯的亚洲智慧、中国智慧。但是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独特方法、民风民俗，那么我们，就要吸收采纳这些独特的智慧。

我注意到古老中国的农业发展，农民在没有天气预报、充分的知识掌握情况下也可以很好地进行农业生产。为什么呢？早期形成的二十四节气是根据太阳与地球的位置，并加以长期经验总结出来的，这反而比发布什么天气预报更有效果。这就是一种生成的智慧。亚洲其他国家也有这样很多类似的智慧。我并不是鼓励大家放弃现代科技，重新回到节气指导农作的时代，但是这种大智慧可以给予我们很好的启发：如何在有限的条件下充分利用简单的办法控制复杂的局面。

我认为，智慧一词是抽象的，不是具体的办法。人类在发展中已经拥有了很多具体的办法。所以，亚洲智慧更多是当地的特色智慧，抽象的、概括的、理念的，而非简单的、具体的操作。当然，我们在研讨亚洲智慧的同时，还要关注人类共同的科学方法与智慧。

记者：我们注意到，今年两会期间环保也是很热门的话题。根据您在两会期间的所观所感，在新一任国家领导人的领导下，未来的中国环境道路蓝图是什么，政府又该做到怎样可行性的措施？

葛剑雄：体制的改革可以进行到何种程度会影响到中国的环境进程？政府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地方政府往往短视，把环保项目或基础设施建设看做政绩工程，这就是短期效益了。最近也出现不少民意与决策的冲突，比如启东排污管道等，民众诉求是对的，但未必理性，这里存在着政府如何沟通的问题。一方面，对企业进行更具体的监管，另一方面，要与民众沟通，让民众了解真相。

但很多时候，政府已经说明项目是无害的，为什么民众仍然不相信呢？这就是体制问题。在决策过程中，民众是否得到了他们的角色地位？为什么发达国家的工厂可以建在居民区里，而我们的工厂造得很远了，大家仍不肯接受呢？这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政府的公信力不够，另一方面，政府有些决策未公开透明、民主科学。有些人提倡要小政府、弱政府，但我认为，强弱大小不是问题，关键是政府本身能找到自己的地位，能够做到民主科学，这样的话，强政府也是可以的，如果起不了积极作用还要干预集权，就会起到很大的负面效果。大家在两会期间环境有很大的关注，也暴露了环境问题的严重性。

必须让六个友好关系国家团结起来

记者：李钰恒



Kirill Barsky

俄罗斯联邦总统上海合作组织事务特别代表

「 对一个区域性组织来说，拥有强有力的公共支持、与非政府组织的长期关系以及与普通民众的广泛联系有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必须要让六个友好关系国家团结起来。」

记者：据最近一期《简氏防务周刊》报道，俄罗斯国防支出在未来三年内将增加40%。习近平主席对俄罗斯的访问增强了两国军事方面的合作关系。中俄是否会在防御研究方面进行合作？

Kirill Barsky：你的问题涉及到俄中双边关系，我在这方面没有立场做出详细的评论。我只能说，俄中关系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高水平的战略合作关系，习近平主席三月份对俄罗斯的成功访问对增进两国在各方面的合作，包括军事合作，都有显著的贡献。

上合组织成员国家国防部的合作是组织内部安全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合作包括每年的部长会议、与高级国防官员的定期磋商以及联合军事演习。在2013年6月26日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举行的国防部长会议上已经对未来的计划做出过讨论。六个国家的大头发表联合公报并签署了2014至2015年上合组织成员国家国防部的合作计划。同时，他们还达成共识，下一次上合组织联合军事演习“和平使命2014”将于2014年在中国举行。

说了这么多，我想强调的是，上合组织并不是一个防御联盟，在其架构内的军事合作是严格限制在反对恐怖主义的合作范围内的。

记者：2014年，俄罗斯将担任上海合作组织的轮值主席国。您曾提到上合组织所面临的严峻国际形势的特征包括恐怖主义、分裂主义、贩毒和其他形式的跨国犯罪。上合组织未来在安全性方面的重点将放在什么地区？

Kirill Barsky：作为上合组织2014-2015年的主席国，俄罗斯将会推动各方面事务的议程。毫无疑问，加强安全合作、在上合组织地区，尤其是中亚地区，维护稳定将是重中之重。

在初始阶段，上合组织将集中打击最严重的区域安全威胁——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2004年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成立了地区反恐组织，已签署了众多重大的政府间文件，为不同领域的安全合作提供了法律基础。每隔三年，都会开展一次反恐、反分裂和极端主义的项目。而最重要的是，所有这些协议都已成为六国执法机构的具体的、协调的行动，从而能够有助于防止数以百计的恐怖袭击，并逮捕数以千计的恐怖分子。

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的挑战 and 威胁出现在了上合组织安全议程的前列。它们包括毒品贩运、洗钱、有组织跨国犯罪、网络恐怖主义、网络犯罪等等。显而易见的是，在我们这些地区所有的安全威胁都是互相关联的。

这就是为什么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发起倡议，要将现在已被证明能够有效打击恐怖主义的上合组织地区反恐机构转型为上合组织成员国“反对安全威胁环球中心”。我们认为这个即将成立的中心会是一个充分成熟的安全合作机制，能够使成员国以更具系统性和协调性的方式来处理对安全和稳定的全面挑战。

另一个在世界各地兴起的严重问题是激进主义和仇外情绪，上海合作组织的成员国也不例外。我们几个国家要携手打击极端主义和防止恐怖主义，不仅要靠武力，也要使用“软实力”。除了相关的政府机构，这项工作还需要非政府组织、公共团体和我们社会各个层面的力量共同参与进来。教育机构、大众媒体、教会和教派社区、青年运动、企业界等都将在这里扮演特殊的角色。

记者：您强调了地区和国际信息安全面临着现实的威胁，您能具体解释一下吗？

Kirill Barsky：信息安全，或者说网络安全，是国际社会、各个国家和企业部门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上合组织成员国是最早密切关注这一问题的国家之一。

2006年，一个研究信息安全的上合组织特别专家小组成立了。专家组得出的结论是，全球和各国网络安全威胁是一个“三合一”的概念，不仅包括恐怖主义威胁、犯罪威胁，还包括信息通信技术应用于军事的威胁，基于这样的假设，世界需要一个针对该问题的综合性应对方法。

为此，专家组制定了上海合作组织关于国际信息安全领域的政府间合作协议。协议对

信息威胁做出了定义，并概述了合作的原则、领域、形式和机制，包括阐明了缔约国家应该如何协调和互相提供帮助以共同应对信息安全威胁的方式。另外，这一具有创新性的协议是开放给每个国家加入的，并不仅限于上合组织成员国的范畴。

现在上述协议已开始生效，上合组织国家的专家们开始了将其全面贯彻执行的具体工作。最近的一次专家小组会议去年五月在北京召开，取得了令人称道的成绩。然而，为保护上合组织成员国免于各种网络威胁，并推动全球网络安全合作的愿景，我们还有很多需要做的事情。

记者：金砖五国起草了关于“加强国际合作，打击网络犯罪”的决议，要求进一步研究网络犯罪。俄罗斯将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应对这一挑战，促进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关系？

Kirill Barsky：网络安全的问题引起了全世界的严重关切。许多不同的国际组织都在广泛讨论这一问题。金砖五国和上合组织都在做这方面的工作，而且两个组织的立场是一致的。但也有一些国家和组织和我们有不同的观点。

为了给这一复杂的问题制定出统一的应对方法，联合国大会决定设立一个政府级别的专家组。专家组第一次会议将于 8 月在纽约举行。

上合组织已经为即将举行的这次会议向其他联合国成员分享了我们的愿景。2011 年 4 月，六个上合组织成员国起草了一份“国际信息安全领域国家行为志愿守则”。守则的目的是确定国家在信息空间中的权利与义务，重申他们履行建设性和负责任行为的承诺，激发他们应对共同威胁和挑战的合作，同时再次确认他们坚持人权与基本自由。每个国家都受邀做出一份政治承诺：合作打击利用信息通信技术进行犯罪或恐怖活动；尊重公民在信息空间中的权利与自由；不会利用信息通信技术进行敌对活动或侵略行为；不会提升和扩散信息武器和相关技术；遏制煽动其他国家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或破坏社会稳定与文化价值的信息传播；重申所有国家拥有保护各自信息空间和关键的信息基础设施的权利与义务；促进多边、透明和民主的互联网国际管理；推动双边、区域和国际合作。

上合组织成员国赴联合国使节向联合国秘书长提出在第 66 届联合国大会上将该份“行为守则”作为正式文件散发。我们相信，守则在后一阶段可以升级为联大决议，甚至成为包括信息技术的军事应用、在信息领域打击恐怖主义和犯罪在内的“信息技术公约”的基础，具有法律约束力。在这个问题上，通过一份达成广泛认可的决议显然已经越来越紧迫。

记者：您提到上海合作组织的第二个支点是经济合作。俄罗斯的对外贸易收到当前全球经济放缓的影响。俄罗斯将如何与上合组织其他国家合作，应对亚洲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

Kirill Barsky: 上合组织一直以来、并将一如既往地共同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尤其是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作为工作重点。同时，经济合作也是我们的重要支柱之一。与文化与人道主义合作一起，经济合作是上合组织宪章中明确指出的重要合作领域。上合组织已成立并正在发展成为一个综合性的全方位的区域组织，因此这一点是非常自然的。

从经济角度来看，上合组织具有巨大的潜力。我们应当结合俄罗斯、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以及五个观察员国家和三个对话伙伴国的资源和优势，以利于更紧密的区域合作。最具有合作前景的领域包括交通、能源、基础设施、科技（尤其是信息和通信技术）以及农业等。

上合组织已经制定出了详细的经济合作计划，着重以利益相关国的模式来落实具体的多边项目。我们称此灵活原则为“2+x”模式。相关国家既可以通过“政府到政府”的渠道，也可以利用国企或民营企业来进行经济合作。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会、银行业协会、青年理事会正在启动越来越多的类似项目，其中有一些已经在筹备之中。

上合组织并不需要成为一个一体化的组织，因为欧亚地区一体化的进程已经以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关税同盟为核心在紧锣密鼓地展开了。但是，上合组织可以有效地与其他区域实体，包括海关联盟和欧亚经济委员会在经济领域开展合作，从而促进其成员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以及区域经济合作。

记者: 您曾说过，上合组织承担着三个主要责任：反恐、经济合作与人道主义合作，而最后一点的作用日益重要。上合组织成员国将在哪些文化领域促进合作？

Kirill Barsky: 在当代世界，社交与联结关系网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对一个区域性组织来说，拥有强有力的公共支持、与非政府组织的长期关系以及与普通民众的广泛联系有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们必须要让六个友好关系国家团结起来。

今天，上合组织成员国关注于促进文化、教育、医疗保健、应急响应与青年政策方面的合作。在有些领域，我们正在顺利实施优质的项目，例如包含了来自上合组织国家 69 所大学的“上合组织网络大学”项目。还有一些合作项目正在由成员国进行设计，但还尚未实施。

近来，我们还推出了一些新的具有前景的举措，其中之一就是启动上合组织“文明间对话”的想法。对话可以包含成员国国家和观察员国家的研究中心、宗教和文化组织以及大众传媒，这些国家代表了世界上的大多数文明。在旅游领域的多边合作是另一个合作领域，有关的旅游企业和协会可以一起加强各国和地区人民之间的接触。

作为我们的战略目标，我们必须努力建立上海合作组织的共同文化、教育、健康和智力空间。这将使我们在未来更接近“上海合作组织社区”概念的实现。

记者: 在 2009 年, 您发起了一个关于俄罗斯驻外部门历史的项目。中国有句古话, “以史为鉴”。这个项目是怎么一回事, 您会从中得到些什么? 从未来中俄关系的角度, 这项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Kirill Barsky: 2009 年我开始收集关于俄罗斯 / 苏联驻中国大使馆历史的资料, 这项工作现在还在进行之中。我认为任何国家的驻外部门都不能忘记他的前辈、他们的姓名、职业生涯和成就,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不仅能够纪念前几代外交官, 更能够教授年轻一代的外交官以正确的精神。为此, 我和我的同事们正在努力从外交部档案、我国著名中国专家写的关于俄中历史和苏中关系书籍和回忆录中梳理资料。

我们的目标是编译俄罗斯帝国自 1860 年在北京设立大使馆以来, 使馆及其工作人员的详细书面记录。为了获得第一手的资料, 包括使馆中有哪些人, 外交官如何工作和生活, 他们是怎样的人等等, 我们正在对在俄罗斯外交部门的工作过的退休人员进行访谈。这项工作已经得到了我国外交部高层的充分支持。

我们计划在未来几个月里发表的第一篇文章的内容将是关于 1924 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中华民国建立外交关系以及苏联驻华大使馆的日常工作。当时苏联在北京派遣了非常杰出的人物, 他们对推进两国友谊与合作做出了伟大的工作。我希望这会是一篇激动人心的读物。

近几年, 中国已经出版了许多关于外交史的书。不过我相信, 苏联和中国外交关系中的一些情节值得我们更进一步的研究和宣传。例如, 读者会有兴趣了解更多关于 1949 年建立在莫斯科的中国驻苏联大使馆是如何起步的。当时, 苏联政府为中国使馆提供了大量的援助。房产、汽车、家具和设备都是免费提供的。苏联外交部甚至为当时缺乏外交知识和实践经验的中国使馆工作人员特别组织了外交课程。我们国家的年轻人应该了解这些事实。

慢性病防治是全社会的责任

记者：韩沁珂



孔灵芝

现任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疾病预防控制局副局长，副研究员。长期从事营养与慢性病相关政策的研究及管理工作，组织领导多项国家级慢性病防治规划、规范和指南的制订工作以及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

「我们不能只把自己看成是需要西方支持发展中国家，中国现在的治疗技术和慢性病防治理念都不比发达国家差，我们可以在做好自己的情况下，帮助一些国家推进防治计划的进行和诊疗技术的优化」

记者：据 2002 年《中国居民营养和健康状况调查》已经过去将近十年了，近十年来中国人的营养状况和慢性病发病情况有哪些显著变化？

孔灵芝：中国正处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伴随工业化、城镇化、老龄化进程加快，慢性病发病人数快速上升。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和老年人数量的不断增加，使得中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慢性病持续增长是不可避免的趋势。我们现在能做的是通过防治政策的不断完善和执行力度的推进，促进人们健康生活方式的形成和服务能力的提升，以达到尽量减缓增长速率的效果。当前我们正在进行的新一轮的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城市和贫困农村地区调查已经结束，今年完成农村地区调查后会及时向社会公布。

记者：为在社会范围内提倡健康生活方式，卫生部针对不同群体倡导了很多活动，如：社会上的步行日、大学生群体的长跑运动，白领阶层的双鞋活动，那现在有没有一套可以衡量这些倡导性活动的实际效果的具体评价体系？

孔灵芝：应该说现在还没有一套比较成熟的评价体系。我们倡导的这些活动实施的时间还比较短，主要是从 2010 年开始，在疾病预防上的成效还是要过几年才能看到，不过这些活动推广后还是能够看到社会上一些观念的改变。提倡步行日的成效最大，现在很多民众都把步行当做是一种运动休闲方式，甚至是出行方式。2010 年作为卫生部“健康知识传播”活动形象大使的白岩松联合胡杨、姚明等 30 多位政协委员在今年的两会上提出正是设立 5 月 11 日为“步行日”的议案，号召民众“吃动平衡、走向健康”预防慢性病。从健康生活观念的改变和政策领域双管齐下，激励公众自主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

记者：十二五计划以来，“顶层设计”一词成为政治热词，您怎么看待慢性病防治中的“顶层设计”？

孔灵芝：我理解的“顶层设计”就是政府部门不仅要考虑到现实情况的应对措施，更要从整体和长远的角度，制定出一个基本框架来指导慢性病防治工作的进行。这个框架一方面是要想到未来慢性病继续快速上升，给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影响提前做好规划；另一方面是要从政府角度促进各部门之间的合作，毕竟慢性病防治不是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这一个部门或某几个部门的职责，而是整个政府机构甚至是全社会的工作。其现在慢性病防治领域最新的顶层设计就是 2012 年卫生部联合 15 个部门公布的《中国慢性病防治工作规划（2012-2015）》，里面提到的 21 个目标、三个原则、七种策略措施、五项保障就是未来几年慢性病防治工作的纲领。

记者：在《中国慢性病防治工作规划（2012-2015）》中有一部分具体介绍了不同部门在慢性病防治中的责任，但是怎样才能把多个部门有效的整合在一起，协调工作呢？

孔灵芝：这个问题也是我们一直在考虑的问题，现在已有的经验就是不要总是空讲道理，而要把事情做到实处。当卫生部把慢性病防治落到一个具体的切入点上并就此提出详细的方案时，其他部门就比较容易在这个具体方案中找到自己的职责所在。其实不只是慢性病防治，公众健康宣传也是这个道理。拿卫生部和山东省省部共建的减盐防控高血压项目来说，卫生部提出了比较全面的计划和要求后，山东省各部门都有相应的措施出台，省质监局制定了新的“鲁菜”标准，商务部引导商品销售企业设立低盐食品专柜，宣传部门配合进行主题宣传活动。教育部门则将低盐膳食和高血压防控知识纳入学生健康教育和家长健康知识培训中。还有部门的领导在闲聊中提起，在推进慢性病防治过程中，部门间的党群关系也变好了，每天一起做工间操锻炼，上下级间的沟通机会也多了很多。

记者：大部制改革后将计划生育委员会的职能并入卫生部，这对社会健康事业的发展有何影响？

孔灵芝：把计生委的服务职能并入卫生部，对公众的全生命过程进行呵护，更有利于促进公众健康。

记者：在慢性病防治过程中，媒体除了提供一个宣传平台还可以做些什么？

孔灵芝：慢性病预防主要是指针对群体，在这个过程中媒体的作用太重要了。一对一的精细化管理成本较高，重点是用在病人身上，而在对大众的健康知识宣传和解释，降低整个群体的风险的任务还是要通过媒体来进行。媒体在慢性病传播中主要应起到整合和解释的作用，将专家们不同专业领域的知识有效的整合在一起，用公众可以理解的表达方式传播。但是现在媒体自身的医学或专业素养还不足以完成这样的工作，所以卫生部还有一个健康知识传播激励计划，主要是派出专家有针对性的对参与健康知识传播的媒体人讲授专业知识，让他们参与到卫生部组织的一些深度调查中，并且由专家对他们进行考核，让他们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报道而不仅是拿着新闻通稿直接报道。我们也会对科普宣传中表现出色的媒体进行奖励。

记者：您在演讲中有提到希望得到更多的国际支持，那哪方面的支持是中国现在最需要的呢？

孔灵芝：中国在疾病治疗手段和慢性病防治的理念上不比发达国家差，所以我们期盼的国际支持是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一种重视慢性病的国际氛围，确切地说，我们希望通过国际组织或国家间交流合作，推动国际社会对慢性病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知。2011年联合国总部召开了关于慢性病防治的高级别会议，通过了政治宣言，要求在慢性病防治中各国政府要承担首要责任，把维护公众健康细化到各部门的职责中去，同时也要求社会承担起必要的责任。这是联合国从成立到现在，继AIDS之后第二次专门针对某一种疾病召开专门会议，这说明国际社会对慢性病的全球性防治的重视程度已经达到一定水平，这是好的趋势，我们希望国际社会能越来越重视慢性病防治的重要性，这样对我国的防治工作能起到一个极好的外部推动作用。

记者：对于整个亚洲的慢性病防治工作，中国能做出哪些贡献？

孔灵芝: 中国在亚洲慢性病防治中具有重要作用。首先中国是人口大国，人口数量大是机会也是负担，具体到慢性病防治上，可能负担的成分更大。我们要做更多的工作，投入更多的资源才能完成慢性病的预防、筛查和治疗。虽然我们做了很多，但目前效果还不明显，中国人口占亚洲人口三分之一，把自己的问题解决了就等于为亚洲慢性病防治工作作出了非常重要的贡献。不过，我们也会对需要帮助的国家提供一些技术和政策上的支持。说句实在话，中国的慢性病防治从技术还是指导理念上讲并不落后于发达国家，虽然我们和许多亚洲国家一样是发展中国家，但是我们还是有资格提供技术和观念上的输出的。

用新媒体平台来传达正能量

记者：徐盛洁



李泓冰

现任人民日报社上海分社副社长。198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1988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法学硕士。

「一方面，遍布质疑精神的确是一种正能量，但是另一方面亦要防止它演变成单一的破坏性思维不加思考永远说“不”」

记者：前不久雅安地震的时候依靠网络声音传达了很多正能量。在这类公共事件里面您怎么去评价主流媒体和依托网络的民间舆论场这两个舆论场分别的作用？

李泓冰：从汶川到雅安，五年的时间，两个突发的灾难性事件，我觉得不管是从官方舆论上还是从民间舆论上都有了很大的进步，都更加趋向理性了。

比较共同的一点就是两者都更具专业主义的角度和立场。官方层面，一些电视报道在当年汶川地震采访过程中有时候表现得过于煽情，大家在反思中开始批判这样的倾向，只不过在事件当时还没有特别意识到这一点。这些年痛定思痛以后，主流媒体在这方面不断改进，雅安地震的报道就尽量做到不打扰救援进程，体现出尊重、理性和专业精神，这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从民间的角度也一样，以前汶川地震时候大家都是凭着一腔热血冲过去做志愿者，现在地震消息一传来在微博等平台快速传递的建议就是不要盲目前往阻塞道路，一切都以救灾为第一要义，杜绝作秀和血气之勇。

另外一个特别重要的变化就是两个舆论场的质疑精神都增强了。以前公众很容易被煽情所轻易打动，而现在是习惯于怀疑，我认为这也是一种进步。比如红十字会的信誉，汶川地震时候红十字会一呼百应，但现在大家都在质疑它的公信力。当然这里面也要考虑是否有非理性层面的意味。那么，我们怎么去应对这样一个不断被质疑的局面？首先，要把质疑精

神看成是一种正能量，这是帮助我们进步的一个重要的动力、源泉。很多现实问题和突发事件的解决，都是在公众锲而不舍的质疑和追问下，朝积极和良性的方面转化，促成了社会一个一个局部的净化和进步。

记者：那有没有考虑过怎么去平衡过度质疑？

李泓冰：质疑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警觉“塔西佗陷阱”现象，就是不管政府和主流媒体说的是对是错，一概抱持我不相信，不加思考永远在说“不”的破坏性思维。这是政府公信力的下降造成的，想要挽回非朝夕之功。

去年尼尔森的调查表明，说中国人对于负面评论的爱好要大大高于亚洲平均水平，这是一种破坏性思维主导的表征。国人可能是因为觉得以前意识形态管控过于强烈，好不容易在新媒体这个领域可以畅所欲言，就演变成了一种强烈反弹。其实中国社会也缺乏民主协商、平等讨论的训练，一些网友们习惯于陷于他们也曾强烈不满的那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强势姿态，不能容忍异议，动辄漫骂嘲讽甚至人身攻击，且容易表现出戾气深重、苦大仇深的所谓屌丝心态，热衷传播坏消息，对一些失真的夸大的坏消息来不及甄别，在个别事件中还会走向非理性，伤及无辜，甚至成为暴民情绪的演泄和消费苦难的一种狂欢。这种在自媒体上出现的非理性倾向就带有破坏性。这实际上也暴露了我们从五四以来科学和民主的训练，到今天依然是远远不够，无论是在民间还是官方。

但必须看到的是，总体来说网络舆论场还是正能量更多，这是肯定的。

记者：您在上午的报告中提到了人民日报官方微博这样一些自媒体的新平台，您怎么理解主流媒体在新媒体平台上的推广？有没有考虑过让它转型得更平民化一点？

李泓冰：人民日报法人微博是在编委会领导下，秉承“传播力决定影响力”的理念，由一群年轻而有活力的编辑记者在操作的。人民日报在走近大众走近年轻读者方面一直做着多重努力，法人微博是其中一个方面，去年张研农社长还领衔了“人民日报进复旦”的活动，这是本报第七次走进大学校园。另外如今到处能看到的人民日报电子阅报栏也是一种搭建人民日报电子化传播平台的努力。

很多网友对于人民日报法人微博的一些声音经常会惊讶：“这是人民日报吗？居然会说这样的话”。实际上，人民日报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直是改革开放的主要吹鼓手，特别是在中国改革的关键节点，它一直都是助推的积极力量。

现在那么多媒体办微博，相对人民日报微博的涨粉速度最快，这和公众仍然关注人民日报的影响力有关。人民日报的记者有站在推进改革一面的传统。这也包括本报自身的改革，

互联网层面上，人民网是第一家主流媒体建起的门户网站，微博层面本报法人微博的出色表现也有目共睹，电子阅报栏在上海也推广顺利，另外还有“人民搜索”的探索，总体来说人民日报在新媒体时代一直在积极转型中。

当然，主流媒体也需要有现代营销意识，包括人民日报，当然目前来看，本报对自己的推广力度和效果依然不理想。大家一直以来对人民日报的观感都是保守、刻板等等，其实大家没有意识到的是，很多公众聚焦的议题设置就出自人民日报。比如大学毕业生北上广的生存困境，“逃离北上广”这个议题就是人民日报最先提出的；还有关于阶层固化、代际世袭等，也是人民日报最先提出的。人民日报其实有很多值得阅读的新闻与评论，只不过很多人不曾阅读就一味批判。当法人微博把本报报道或者评论当中的140字摘出来发表，不少网友都很惊讶地表示“这是人民日报吗？”还多虑地担心，“小编要下岗了吧”，其实这就是人民日报一直以来的声音。没有微博，大家都看不到，有一点习惯性的偏见，微博是一个很好的让公众了解并阅读人民日报的机会。但是只有一个微博还远不够，现在我们依然在学习中。

年轻人要了解中国政治也不能够离开人民日报，毕竟这是了解中国当代史最不容忽视的、也是和中国政治离得最近的一家媒体，学人文学科、学新闻的大学生，如果绕开人民日报，只是满足于轻飘而随意的批判指责，这也是一种怠惰和对自己专业的不负责任。

记者：再来谈谈纸质媒体的现状，很多人认为纸媒走不远了，即将走向消亡，您怎么看？

李泓冰：我也不太乐观。美国有学者预测，认为2044年传统纸质媒体将消亡，最后一位日报读者将结账走人。我不知道这个具体的日期是怎么推算出来的，但是纸媒的发展前景肯定是不乐观的。我们学新闻的时候都知道美国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是最老牌的报纸，但是现在它也已经停止出版纸质日报了，美国传统报业的今天或许就是我们的明天。我估计在中国这个消亡的过程可能会再往后推迟一段时间，但这一定是个趋势。

纸媒在和互联网的竞争中肯定是处于弱势地位，当然我们现在无法预测未来究竟会出现什么情况。一来是纸媒可能像邮票一样进入收藏领域，好比文物收藏，在日常生活里可能不太看到了但是收藏家那里还保存着；二来就是总有小部分的读者会偏爱看报纸胜过在网上看新闻，就像很多人就是偏爱纸质图书胜过电子书。另外还有一个不可预测性，举个例子，以前大家都觉得广播要消亡了，但是汽车时代挽救了广播的命运，即便现在互联网如此发达也不能取代广播的地位，因为开车不能上网但是耳朵可以随时听讯息。所以未来纸质媒体会不会也出现一个类似于汽车时代的情况来挽救，一切都还是未知。

总之纸媒作为处在弱势地位的传播方式正在走向消亡的过程，但这个过程究竟有多长或者说会不会有柳暗花明的契机现在没有办法预测。

好的城镇化要求公共服务提供到位

记者：陈剑



李善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研究员，北京大学数学系硕士研究生，曾参加多个研究项目，如“十一五时期及 2020 年发展战略与政策”，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项目、贸易自由化、增长、收入分配，福特基金会项目等，作为多个研究项目的负责人，她还参与研究关于经济以及税务方面的政策。

「城镇化很明显地带来了资源的大量消耗和环境的破坏，这也是需要提高质量的一个方面，所以我认为其实城镇化质量是个很综合方面，很多地方都需要提高」

记者：从十八大以来“城镇化”这个词被提出的频率很高，呼吁中国不光需要有“量”的城镇化，更需要有“质”的城镇化，你认为什么才是有“质”的城镇化？其中要解决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李善同：现在城镇化讲得比较多，跟李克强总理的讲话和文章是有关系的，今年新华文摘第一期就有李克强总理的一篇文章，从那后大家都对城镇化比较关心，热度就起来了。其实这些年城镇化提高的速度是比较快的，最近十年差不多每年以 1 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数量确实增长很快，达到 52.5%，关于质量方面有好几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认为大概百分之十几的人口被定义为城市人口，但实际上没有城市户口，没有充分享受城市提供的公共服务，所以提高城镇化质量首先要让这些能跟其他城市人口一样享受到政府、社会提供的公共服务；还有一种说法我认为可能就是资源问题、环境问题，因为城镇化很明显带来了资源的大量消耗和环境的破坏，这也是需要提高质量的一个方面，所以我认为其实城镇化质量是个很综合方面，很多地方都需要提高，包括土地集约的利用，碳排放的控制等，还有就是比如水资源的利用，因为城市比农村就生活水用量来说是更大的。

记者：有个引起很多讨论的问题就是如果农民都涌向城市，那么他们在农村的土地该怎么处理呢？

李善同：现在城镇化中的土地问题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现在很多把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城乡统筹放在一起讲，其实我是认为城镇化本身是一个社会在不断地进步，也就是是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结果，而不是促进什么发展的动因，如果没有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不会有剩余劳动力，没有剩余劳动力就不会有农业的转移问题，所以城镇化率的提高是与这些年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是有关系的，如果农村比城市更富有，那么农村人口也不会往城市转移，所以一个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得农民有条件转入城市，另一个是城乡社会公共服务的差别使得农民有动力进入城市。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只有户籍人口才能算入城镇化率的范畴，其实我觉得这种说法不是特别的妥当，比如深圳的户籍人口只有一百多万，但居住在深圳的人口远远超过这个数，这个就会涉及到很多问题，比如水、粮食、上学、工作、医疗保障问题等等，所以仅仅依据户籍并不能很好地对城市化率做出一个判断。城镇化主要是看你提供的公共服务能不能到位，那么这就不只是数量问题了，会涉及到方方面面。

记者：您的意思是在中国城镇化与户籍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很大重叠的问题？

李善同：什么叫户口，英文中叫“registration”，就是一个登记问题，就是一种人口管理的信息手段，其实各个国家都有登记制度，主要是我们给户口附加了太多东西，比如以前就会涉及到粮票啊之类的，现在要点是我们公共服务差异太大了，就是同一个城市不同区域也有一些差别。所以我认为什么叫户籍改革，就是要把户口与公共服务的提供脱钩，与各种社会福利的提供脱钩，所以并不是简单的对户籍本身进行改革。如果简单的放开户籍，所有人都涌入城市，城市又没有那么多的资源来提供，最后还是会根据各种方法划分公共服务，户籍改革就变成了空谈。。所以户籍改革不在于户籍本身，户籍政策作为国家对人口进行登记管理的手段而言是很必要的，它能比较精确的反应中国人口现状的一种资料。

记者：您提到户籍问题根本其实在于资源的稀缺，但中国这么多年都在快速发展，各方面的资源都在不断增加，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会出现户籍背后资源分配会越来越失衡？

李善同：我觉得一个是总量问题，另一个就是资源的结构问题，当然我们资源的总量是在增加，但分配时质量就有很大的差别了，城市会在多种方面占优势。这其实在发展中国家很容易很普遍遇到的问题，一时半会很难有效的解决。要随着政府财政实力的增强不断的进行改善。

记者：刚刚有提到中国政府其实负债已经不少，而在未来的城镇化中政府又将大幅增加投资来推进这一过程，那么将来会不会存在债务风险？

李善同：如果中国未来经济仍保持较快的发展速度，政府收入仍有较大的增速，那么就可以将这部分债务风险降到最低，所以主要还是看未来的一个经济增速，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轨迹来看，一国的发展如果到了一个阶段它的速度必然会慢下来，当人均 GDP 达到一定数量以后，经济发展比较成熟，这时它的增长速度一般不会超过 5%-6%，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注意风险的防范。

记者：地方债务堆积会不会影响之后这十年城镇化的深入？

李善同：这有个时空的问题，地方政府领导在其任内不一定有太大的还债压力，其可以将债务后推，类似于击鼓传花，每个传的人都认为在他这里不会出问题的

中国本土种子企业必须依靠自主研发 获得核心技术

记者：须蕴烨



马述忠

浙江省国际经济贸易学会副秘书长，浙江省首批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区域经济开放与发展研究中心秘书长，浙江大学国际商务研究所执行所长，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学系副主任。

「中国本土种子企业获得核心技术，必须依靠自主研发与政府对研发的高额投入，从而培养自己的核心竞争力。简单来说，突破口就是：一定要培养自己的企业，以及要有自己的研究基地。」

记者：您在“农业 FDI 对中国粮食安全的动态影响研究——基于种业研发能力视角”中给出的结论是，外商直接投资 (FDI) 对中国本土种子企业的研发能力具有负面溢出效应。请问当下有什么具体的措施可以降低这种负面溢出效应？

马述忠：这个问题已经存在很长一段时间了，但是我们最近才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比如，直到前年，农业部才成立了一个种子管理局。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的确已经被提到议程上了，被大家意识到了，但目前很难出台非常有效的政策与措施来应对这个问题，因为外资已经形成了相当的垄断性局面。外资最初进入的时候，是解决这个问题最有效的时点。但我们在最正确的时点、在应该采取措施的时候，却没有采取正确的措施，导致今天的局面有点失控。

记者：您在解释这种负面溢出效应时，提到当外资撤出中国后，本土种子企业的研发

能力、技术水平比外商投资尚未进入中国本土前的封闭状态下更低。这是一个相当具有冲击力的结论，您能否说明一下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

马述忠： 外资进入中国市场之后，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垄断。几乎所有中国本土的研发机构都“配合”外资企业做种子研发，这种“配合”是处于价值链中比较低端的环节；相反，外资的核心技术研发是不让我们参与的。所以本土企业的真正的研发能力、管理能力并没有得到加强，反而对外资产生严重的依赖。这就像当年苏联专家对我们进行援助，我们对其产生严重的依赖，却没有学习到他们的核心技术，当援助撤走之后，我们自身的能力依然很弱。

记者：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即使本土企业接触不到国外的核心技术，但或多或少总能借鉴到一些经验，或者说吸收到一些先进的资源，为什么自身的研发能力反而是降低了呢？

马述忠： 这涉及到价值链的问题。外资企业在价值链的每一个环节都有一定的市场势力。他们几乎打通了价值链、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对每一个环节进行耦合，形成耦合的产业实力，这种实力是很强的。而我们只是零星地分布在全球的种子产业链、价值链上，只是为外资企业提供一些低端服务，所以我们的能力依然是比较弱的。外资进入中国通常采用两种形式：并购、合资。如果采用并购形式，外资持股最多，是最大的股东，拥有最多的话语权。即使外资通过合资方式进入中国市场，中国本土种子企业也无法掌控研发环节、战略性环节的核心技术。因为外资会通过与中国签订各式各样的文本、开出各式各样的条件来约束、限制中国对相应的合资机构研究得出的成果的使用权限与使用程度。打个比方，某家外资企业，比如先锋公司，在中国设立了一个研究项目和研究基金，我们学校里的学者或者研究机构里的研究人员们听到这个消息，会不会积极踊跃地去参与？答案是肯定的。外资通过注入项目和资金进入中国市场，同时与中国签订协议对中国进行约束与限制，导致的结果就是，即使本土的研究人员研究出了某种技术，中国对此也没有使用的权利，这个权利属于项目发起人与注资者：外商。

记者： 我们能否认为，中国本土的种子企业总体上处于价值链的低端环节？

马述忠： 低端环节包括种子的栽培、培育、试验、加工，这些环节都是中国企业在做。至于核心环节，虽然跨国公司的很多岗位上都是华人，能够接触到核心环节，但跨国公司不是中国企业，他们有知识产权保护。很多中国的研究机构的研究人员都到外资企业去工作，为外资服务，而不是为中国控股的公司服务，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外资企业在高校设立各式

各样的奖学金，就是为了培养和吸引人才去外资企业工作。而外资企业的员工，不管是不是华人，都绝对不可以将企业研发环节的技术泄露出去，这是违法的、不道德的。整个知识产权归属于企业，个人无权对其进行输出。

记者：那么中国本土种子企业只有依靠自主研发才能获得核心技术？

马述忠：对，依靠我们企业的自主研发，也依靠政府对研发的高额投入，这是关键。为什么国内研究机构的很多研究人员都对外资青睐有加，看到外资设立项目，就会很高兴、很积极地去参与？因为我们的研究机构缺少研究资金。如果我们的政府能够向战略性产业和战略性环节注入大量的资金，我想，我们的老师和研究机构就能够在比较好的条件下进行研究，进而培养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这是达到目的一种方式。简单来说，突破口就是：一定要培养自己的企业，以及要有自己的研究基地。

记者：除了政府投资之外，还有什么地方值得我们注意？

马述忠：我们要关注的不仅仅是研发环节。的确，如果政府大量投资于研发，总有一天我们的自主研发能力将大大提高。但研发只是价值链、产业链中的一个环节；除此之外，下游环节比如营销和品牌环节，也十分重要。若无强硬的品牌支撑与良好的市场渠道，本土企业不能进入市场，不能跟农民实现对接，也不能在国际上进行有效竞争。中国本土的种子企业相对于外资跨国公司来说，规模比较小，成立时间也比较短。虽然外商对其进行并购或者合资，但这些外资企业输入的只是项目，而核心竞争力，包括研发环节的核心能力、以及管理技巧（管理技巧是知识，是重要的战略环节）等，都没有输入。所以中国本土的种子企业，除了关注自主研发之外，还要打通整个价值链，同时要注意整个价值链环节的耦合问题。

全球化中亚洲人口红利的衰竭

记者：陈怡璇



盛斌

南开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中国 APEC 研究院院长、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常务理事、全国高校国际贸易学科协作组副秘书长、全国美国经济学会副秘书长、美国富布莱特高级访问学者。

「中国劳动力人口绝对数量第一次出现下降，印证了人口红利衰竭的基本趋势。东南亚国家并不一定比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资源具有更大优势。劳动力成本可否无限压到极低水平值得商榷，劳动力最低工资的限定也是有害的。」

记者：您在分论坛中提出的“亚洲面碗”效应（Asian Noodle），能否具体解释一下？

盛斌：这一概念最初是从“意大利面条碗”引申而来的。亚洲国家之间相互签订双边区域贸易，就如同碗中的面条交织在一起，形成错综复杂的 FTA 网络。解决亚洲一体化中面碗效应带来的混乱局面，一种选择是以美国为主导的 TPP，另一种选择是建立以亚洲国家为主导的 10+3 或 10+6 FTA。

记者：十年前克鲁格曼曾质疑亚洲奇迹，人口红利对亚洲奇迹是否仍有作用，您有何见解？

盛斌：十年前克鲁格曼质疑亚洲奇迹，认为东亚国家经济的增长主要源于生产要素的投入，而非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当时世界银行研究亚洲奇迹的报告中，从综合因素角度总结了亚洲高增长的来源要素，包括高储蓄率、高投资率、教育水平提高、人力资本提高、

国际贸易、引进外资、产业升级等因素。对政府的产业政策是否能系统性地提高一个国家的生产力水平，报告持谨慎态度，即只有当满足一系列苛刻的条件时，产业政策才能发挥作用。亚洲奇迹的启示在于发展中经济体可以依据自身的特点制定适宜的经济政策，并获得成功。而世界主流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欧美国家的，倡导市场导向，通过明细产权、供求关系和价格信号实现资源配置市场化、自由化、民营化是欧美国家为发展中国家开出的药方，也是“华盛顿共识”的主要内容。

人口红利在东亚经济增长中曾到了认可。人口红利可以从两个方面考虑。第一是从劳动力数量上。东亚国家，包括中国，都经历了迅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剩余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市，从农业流向工业，有利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制造与出口。同时伴随着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跨国公司把高劳动力成本、高污染的产业梯度性地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将自己的标准技术与这些廉价而熟练的工人的劳动能力相结合，形成出口加工平台。第二是在劳动力的质量上，随着教育水平的逐渐提高，人力资本不断获得积累与提升。

中国的人口红利在数量和质量上对创造东亚奇迹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毫无疑问，目前人口红利在趋向耗散。东南沿海地区的企业用工成本已明显提高，压缩了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及小微企业的利润。2012年国家统计局公布，中国劳动力人口绝对数量第一次出现下降，这印证了人口红利衰竭的基本趋势。加之中国人口结构老龄化、出生率下降、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速度放缓、逐年升高的城市生活费用使得返乡劳动力增加等因素，都在耗散着中国的人口红利。

面对上述挑战，一种解决方法是将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转移到中国中西部地区，但它们同样会经历与中国东南沿海一样的过程。第二种方向是转移到比中国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中去，例如越南、柬埔寨、老挝、缅甸等东南亚国家。

记者：如何与劳动力资源优势逐渐上升的国家实现生产集聚上的合作，包括越南、柬埔寨、老挝、缅甸等东南亚国家？

盛斌：东南亚国家具有劳动力资源优势，但这些国家与中国中西部地区的劳动力资源的差距有多大，需要数据支持。但相比之下，中部地区在基础设施如水电、通讯、交通等方面都有更大的保障。同时，还需考虑到国外投资可能面临的有的政治风险、文化差异、贸易保护主义等风险贴水。

中国需要与东南亚国家在合作中寻求共赢。在亚洲自由贸易区的合作中，特别需要注意加强经济一体化的产业整合与互联互通。在由市场驱动的自由贸易区中，各国在产品价值链或供应链上的分工与贸易，如果对中间产品贸易施加壁垒，将大大提高交易成本。因此，加强贸易便利化（包括港口效率、海关通关快捷程度、标准一致化、物流服务等）和基础设施

施建设，提高亚洲整个区域生产体系的效率，将使得每个国家都成为获利者。

记者： 在今天的博鳌论坛“人口结构、政策与经济”分论坛上，印度提出 2025 年将为世界提供 1.3 亿劳动力。学者认为中国失去“世界工厂”的优势，您如何看待这个现象？

盛斌： 中印贸易存在互补性还是替代性，是学界一直持续进行的讨论。作为劳动力密集型生产与服务大国，印度的高端服务业以及高等教育对中国构成挑战，例如“印度的硅谷”——班加罗尔的软件制造业，以及印度呼叫中心的客户终端服务。印度高质量劳动力所具备的语言（英语）优势也为承接国际业务创造了条件，与中国相比有较大优势。

另一方面，虽然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有一定上升的趋势，但从商业投资环境、基础设施、供应链体系等综合因素考虑，中国与发展水平相当的其他国家相比较仍具竞争力。即使挪走了这些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也不是可怕的事情，这是产业升级的必然过程，它反而会倒逼中国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与自主创新的步伐，包括服务业的发展，因为它可以吸收大量劳动力就业。

记者： 亚洲劳动力需求还面临着另外一种转移趋势，是发达国家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回本国国内，例如奥巴马开始致力于美国的基础行业建设，苹果公司也逐渐将生产厂商移植国内。其原因和发展趋势将如何？

盛斌： 根据比较优势与要素禀赋原理，这些变化似乎与此相悖。美国的这种调整源自其再工业化战略，是为了振兴美国的实体经济，减少贸易逆差，实现经济的再平衡。

但这种调整是否能达到美国预期的效果还需观察。如果再工业化仅是通过一些激励措施（如税收与贸易保护）扭转现有格局的话，美国的财政负担将很沉重，经济发展也将蒙受扭曲。相反，如果以市场化的方式进行，就会比较顺利。对于已进入后工业化时期的美国来说，劳动密集型产业能否逆势回升的这一趋势有待观察。

记者： 劳动力价格上升有的学者认为是合理的。企业以劳动力成本上升威胁自身经营利润压低成本，用裁员或加班的方式弥补，普通劳工成为“沉默的大多数”，您有何见解？

盛斌： 劳动力成本是对厂商来讲，而劳动力报酬是对劳动力供给者来说的，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首先，劳动力价格主要是由市场决定的。只有当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不断转移到工业与城市时，工资水平才会被压得很低，这是劳动力市场供求作用的结果。随着经济发展，劳动力供给出现拐点，其绝对数量下降，这也是劳动力市场作用的结果。如果这种

关系发生，就应当尊重市场规律而非压制劳动力价格，否则会造成扭曲。其次，从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刺激内需的角度看，工资水平上升对提高国内消费水平和促进消费升级有利。再次，工资水平的变化反映了劳动力市场的错配现象，即岗位空缺与失业现象同时并存。最后，克服劳动力价格上升而带来的利润萎缩从根本上说需要继续提高生产率，特别是通过技术进步提升产品的附加值水平。

记者：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并非完全由市场供求决定价格，也并非由国际贸易结构决定，还涉及到社会稳定、消费等诸多因素。如何解决劳动力供求制度存在的问题？

盛斌：目前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水平、聘用制度、劳动合同执行程度、劳动福利等都已实现一定程度的市场化。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改革方向也是明确的，即在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的前提下增加劳动用工的灵活性与市场的竞争性。但中国目前尚未建立以工会为核心的劳资谈判议价制度。从国际经验上看，美国的劳动力市场相对灵活，欧洲国家的体制与政策较为僵化，这也是导致后者经济复苏缓慢以及部分国家高失业率的重要原因，多与其劳动力市场缺乏弹性和高福利制度有关。因此，中国需要在劳动激励与劳动福利保障之间做出适宜的平衡。

金融市场不开放意味着更大的风险

记者：梁妍洁



孙可娜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经管学院院长。知名著作包括《中国经济周期波动问题研究》、《中国金融风险的内生因素与制度创新》、《货币金融学》、《证券投资理论与实务》等。

「改革开放初期放开金融市场必然会存在风险，但是现在我们的市场化体系已维持运转了三十年，特别是经历了最近十几年的市场化改革和金融体系改革，如果金融市场仍旧不够开放就会遏制民营经济的发展。」

记者：您在本次会议中提到一个非常新颖的观点，“金融民主”，这是以往学者鲜有提及甚至无人提及的。您可以先进一步阐明一下金融民主的内涵么？

孙可娜：这还要从本次论坛的主题说起。本次论坛主题是“亚洲智慧”，我提交大会的论文题目是“中国的金融智慧与政策思辨”。我觉得，金融不是教科书式的循规蹈矩和照搬照抄，中国应该拥有自己的金融智慧。在这点上我们应借鉴美国经验，美国一次次成功地摆脱危机的困扰，无不得助于它转危为安的金融智慧。金融市场机制作用的有效发挥有赖于金融民主，对内民主，对外开放，应该是金融市场活的灵魂。

民主还是集中？是中国金融改革的核心问题。市场体制的重要特征应该是自由、民主、开放，金融民主是金融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前提，一个缺乏民主的金融市场必然是一个畸形的市场。中国金融改革旷日持久，但迄今为止，市场并没有真正开放，金融并没有走向民主。金融权力，还高高地集中在政府手里，对于民众，自主地介入金融行业还是一种遥不可及的奢求。这不能不是中国金融的悲哀。

记者：那我们应该如何具体将美国经验借鉴到中国金融市场中呢？

孙可娜：美元现在仍是世界货币体系主导，如果我国仍旧追随世界主流，那就永远无法超越它，因此为何不另辟蹊径。如果我们想要在其他方面占据一定份额，就一定需要美国切割自己的份额分摊一部分给我们，因为整个世界分工就是如此。因此在国际上如果跟着别人跑是跑不过去的。我们需要拥有自己的智慧，即不一味在别人身后追赶，而是充分认知和放大自己的优势，不失时机地调整一下方向，机智地从排尾变为排头。我们国内市场很大，但是经济发展不平衡，区域差别大，因此作为权宜之计，可以眼睛向内，巧妙动用货币手段，通过让利于民来调整经济不平衡现状。虽然复旦副校长在论坛总结发言时提到，一体化是上海论坛的共识，因此亚洲应该加大外贸出口，这个趋势不可逆的。但作为一种策略，我们未必像以往一样地表现出向大国出口的强烈愿望。之前的中国政策稍微欠缺灵活的智慧和策略，基本上是模仿性与滞后性的，对问题的解决基本上维持在应对现状、照方吃药、恨病加量。但是找不到根本病因，盲目加量，这样做的最终后果是正效应并不显著，负效应日益积蓄。

记者：中国培育这种金融智慧对于整个亚洲的发展可以起到怎样的推动作用呢？

孙可娜：我国常出现这种状况，即制定第一个政策产生副作用，后面不得不跟进补救政策，产生这种状况根本上由于我们自身缺乏谋略与智慧。美国就很善于变被动为主动，现在美国欠了很大一笔外债，但在各个方面仍旧得风得雨。这给我们的反思就是应该有自己的智慧。我认为大会主题选的特别好，因为欧美发达国家飞速发展，但不可能一直像少年成长到青年般保持快速发展。而亚洲是新的增长点，国际资源开发积极程度和国际热点不断东移，同时国际之间的交往活跃起来后已经把亚洲整体带动起来了。

美国现在把目光放在亚洲，可是中国作为亚洲一个大的成员国，更应该在亚洲形成它的影响力，比如推动建立五国集团、兴办银行或者区域类共同体。虽然做起来比较麻烦，但是我国应具备这样的责任感与使命感。美国之所以能够插手亚洲、日本与我国周边的一些事端，一方面是为了在亚洲站住脚，影响亚洲发展；另一方面亚洲是巨大经济增长点，资源丰富，一定要把握住这样的市场。如果与周边国家关系都不和谐，那就更难走向世界舞台。服务亚洲，不仅是中国应有的金融使命，而且也是中国金融智慧的重要体现。

记者：之前提到了我们应该树立亚洲金融战略计划，那将视角收回至国内，我们如何具体践行我们的金融智慧呢？

孙可娜：中国现在很多招法都是凯恩斯时代的一些简单做法，棋动一招满盘皆活的金

融谋略。比如我们维持经济高速增长主要靠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消费是很重要的一环，消费包含对内和对外消费，这两者形成经济循环，控制供求平衡。但是我们现在却愈加表现出对出口依赖的趋势，对外贸依赖程度越来越高，这看上去是好事，实际成为我们的软肋，更容易受制于他国。所以这个问题不容小觑，特别是我们加入世贸组织之后，经过 5 年过渡期，已经逐步把金融牌出让给海外了，然而我们金融行业对内的开放和民主却没有很大的起色，由此产生很多问题。比如中国提出金融体制改革，在温州对中小企业搞试点，但是就全国而言，整体资金运行和经济发展结构是不匹配的；比如金融业内中小企业贷款难、融资难已经成了困扰已久、久治不愈的老生常谈；第二，随着民间资本的大量积累，由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转移是一个规律，这也是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前提。在我国，大量的产业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想转入金融领域的愿望迫切，但经过三十多年始终不能合法进入金融领域，只得被迫走向地下。这一问题的实质在于金融资源分配不公平，金融权力不均等，金融市场并未真正对内开放。市场有效运行的前提是自由竞争，政府的责任是建立必要的法规，按照法规对金融市场进行约束，实行有效监管和调控。现在的大银行也存在着风险，与境外同等类型的银行作比较的话，我们银行的不良资产的比例更高，而效益则要低，所以不放开金融不等于就锁住了风险。防范风险的有效手段不是金融垄断而是市场竞争。

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为了防范金融风险必须谨慎地放开金融市场，那么，在我们的市场化体系已维持运转了三十多年，特别是经历了最近十几年的市场化改革和金融体系改革之后，如果金融市场仍旧不够开放就会与整体经济结构发生严重的错位，最终遏制民营经济的发展。而目前金融市场不民主集中表现在一般资金进不去，小企业资金需求求门无路，大资金服务大企业已成定势，所以我国大量存在的非公经济贷款难问题的根本解决有赖于金融民主的推进。

另外，金融民主还体现在这次两会中提到的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上。现在资本市场只有股票、债券和基金，但是中国的股票一旦上市就不能退市，上市成为一种套现和长期融资的手段。企业若达不到上市标准本应该退出，但实际下市非常困难，没有任何市场的对接。因此，在我国上市就相当于一步登天，好不容易迈到这里就无回头路，于是造成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的现象。所以资本市场供求的结构也十分单一化，这也是金融市场不民主的一个表现。单从国家大方面来说，一个民主的金融市场蕴含着广阔的发展空间，特别是目前我们的市场体制在不断完善，市场需求也在不断分层，市场比过去开放得多，应该可以把金融市场口子放开，让公众在这里获得多样化的身份，更广泛的空间，迸发出更多的创新动力，开发形式多样的金融工具，形成更加活跃的市场行为。

记者：除了开放股票、证券、基金之外，您觉得还有什么方式和途径可以让中小企业真正走进金融市场，活跃起来？

孙可娜：除了上述这些改变之外，我们还可以把柜台市场打开，并不一定只通过上交所，深交所才可进行交易。第二，产权市场应该打开。经营一段基金，投资一个产业，只有进入的时候就能看到明确的退路，投资人才敢进入。如果市场没有给予退路，投资人就会变得谨小慎微步步惊心。股票市场之所以受欢迎，就是因为股东可以随时进出，别的市场就不然。如果我们把所有企业的资产缩成一个定数的话，最终能上市的只占很小比例。但如果能开放产权市场，在上海和天津，南北方各建立一个产权交易市场，将会成为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文化产业也可以开放。现在第三产业占比很低的一个原因是我们的产业结构和理念是固化的。如果知识产权可以上市交易的话，知识产品的重要性将大大凸显。第四，2008年以来美国受制于金融衍生工具过度运用。实际上，金融衍生工具作为金融创新是一种不可逆的发展潮流，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用好这把双刃剑而不是因噎废食。中国如今所缺的不是金融衍生品大行其道而是太过不足。如果中国想和美国在国际金融领域同台竞技，就必须深入对金融衍生品的了解和运用。现在我国的金融行为基本上是单向的，不是引入国外资金，就是把本土资金用于海外投资。而更为聪明的行为是像华尔街一样成为世界资金的集散地，不是为自己使用，而是为了世界资金进行周转。我们若想像华尔街一样把世界的资金吸进来，就必须发展金融衍生品市场。为此，金融机构一定要多样化。机构之间的联合也很重要，这是一种变“加法”为“乘法”的效应。如果我们能在上述四点进行开放与创新的话，我们市场的层次就多了，选择的余地也多了。

记者：这次论坛的主题是用亚洲智慧解决全球治理问题。结合金融智慧来讲，您认为什么是亚洲智慧？

孙可娜：我觉得亚洲面临的环境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谈亚洲智慧其实可以类比70多年前，尤其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期间的欧美智慧。面对一种越来越不利的国际环境如何以全新的理念进行治理，以及在近乎崩溃的金本位体系下建立一个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无不体现了当时的大国智慧。后来欧洲联盟以及欧元的出现，其实也体现了一种区域智慧的理念。反观亚洲，亚洲各国不能各自为政，而应该借鉴欧洲的经验，求同存异，更多地寻求合作，以期实现双赢和多赢。而作为大国的中国，多做一些贡献也是值得的。我们应该在周边的区域内形成自己的辐射范围和影响力，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我们要把握好这样一个契机，让整个亚洲变得更为团结和谐。

创新的深层次问题是制度创新

记者：王震宇



沈坤荣

经济学博士，中国社科院经济学博士后，南京大学商学院副院长，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兼职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这种新的创新驱动的增长模式，应该是以政府为主导，同时强化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功能，以企业为创新的真正主体的增长模式」

记者：目前经济的主要宏观调控政策是扩大内需，您认为采取这项政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它实施的重点又在哪里？

沈坤荣：从过去三十年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第一个是投资，第二个是外贸出口，第三个就是消费。消费本来就应该成为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动力，但这几年随着投资、出口的不断扩大，消费的相对比例有所下降，使得国民经济主要依赖外需。在经济下行的背景下，国际市场的竞争日益激烈，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难度也将不断加大。内需结构方面，现有经济增长主要依赖投资，从来源上看，又主要依赖政府而非民间投资。资本积累过度不仅会带来经济的动态无效率，从长期看也是难以为继的。

改革开放以来，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持续下降，且主要表现为居民消费率下降。从这种意义上来说，需求结构出现了不利的因素和变化。要在全世界经济再平衡中推进中国经济的需求结构调整。所以，现有政策最核心的是要扩大国内需求，国内需求里最重要的是扩大消费需求，尤其是扩大居民消费需求，这将是国家未来经济发展的重点。

记者：中国现在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474，而收入差异悬殊是影响消费需求的重要原因，您认为该如何解决收入分配的不平衡？

沈坤荣：第一是要改革个人所得税政策，以切实实现其对收入差距调节的功能。目前中国个人所得税对于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并不明显，表现在高收入者的边际税率较低，低收入者的边际税率却非常高。而且目前个人所得税属于单项税，是对每一项收入都征税，未来税改的重点应是根据一个家庭综合收入状况征税综合税。第二是要切实贯彻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这既是政府的收入转移政策，又是一种再分配政策，它对于缓解贫困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第三是要切实推进农村改革，执行中央惠农政策，以应对长期出现的“剪刀差”现象而造成的城乡收入差距悬殊的问题。

记者：您认为在扩大消费、振兴内需方面还应注重哪些问题？

沈坤荣：还应注重降低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和改善消费环境。如切实解决居民所关心的就业、住房、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方面的问题，真正实现“幼有所养，老有所保”。同时，政府在确保公共支出总量增长的基础上应进一步优化公共支出结构和调整支出方向，通过社会公共服务体系的不断完善消除居民“有钱不敢花”的后顾之忧。持续扩大消费和拉动内需除了应从宏观上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外，更应从微观上构建产业基础，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因为产业结构的优化不仅能促进就业增长，从而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扩大消费支出。更可以改变现有经济增长模式，从而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和实现可持续发展。

记者：加快城市化进程是中国扩大内需的重要手段，您认为在加快城市化进程中应注意哪些问题？

沈坤荣：新一轮的城镇化的核心问题是“人”的城镇化，而非简单的土地城镇化。例如现在的农民工进城务工，但最终还要返回农村，这是“半城镇化”，是不彻底的城镇化，后患无穷。所以要通过户籍制度的改革和土地产权的确认来保护农民在城镇化中的利益，同时释放农村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的增长潜力，为未来的现代化提供要素有序地、自由地流动，这是一场革命，也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所在。

记者：也有学者指出，扩大内需政策会导致比较优势和学习效应的丧失，我国在高科技领域很大程度上仍十分依赖引进和学习外国先进技术，针对这一矛盾您认为该如何协调？

沈坤荣：中国是后发国家，采取的是赶超战略。我们从未到有引进外资，也是引进先进的管理和技术，在这个过程中的模仿和学习极大提高了我们的生产率。但到了一定阶段，由于中国的经济总量增加很快，和领跑者差距越来越小，并且由于金融危机，领跑者的速度下降了，这时候如果还要跟着他跑，自身经济增长就要降速，要想超越发达国家，就需要重构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以美国为例，发达国家最大的优势是科技研发优势和人力资本优势。在这点上超越极难，但幸好我们意识到了这样的问题，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就提出要以创新驱动。而创新驱动的核心问题就是要加大研发的投入，通过品牌设计等提升产品的附加值。要使研发投入有好的效果，还需要人力资本的提升，它的基础是公共教育水平的提高，这要求我们提高对教育的投入。第三还要有法律法规保护研发地正常进行，通过完善立法体系，保护知识产权，使研发获得制度保护。第四还要有全社会共同努力，形成创新的文化。

记者：李克强总理表示，更多发挥市场作用是改革方向，那么在这一过程中，您认为政府应该着重在哪些方面发挥作用？

沈坤荣：营造创新氛围的深层次问题是制度创新。当前的产业结构不合理的一个重要体制根源就是政府仍然过多干预经济导致资源配置不合理。比如在发展战略新兴产业中，由于政府全面介入，施行不恰当的产业政策，使得光伏产业等出现了产能过剩的问题。在经济转型期，当政府拥有过多的资源配置权力时，为追求政治收益的最大化，资源将更多流向重型产业，导致要素不能在基于比较优势的基础上予以合理配置，知识产业结构失衡的矛盾难以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而得到根本改观，也使得中国宏观经济的所表现的“高投入，低消费”特质难以实现“内生”优化。所以下一步改革的关键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一是积极推进要素市场化，构建有限政府。政府应减少市场干预，让要素基于比较优势的基础上进行自发合理的配置，以形成有效的市场配置机制。二是改善政府服务质量，构建有效政府，为市场机制的完善提供公正的约束机制和有效的服务质量，使市场健康高效的运转。

除了构建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以外，更应提升市场化水平和完善市场化结构。首先，加快包括人才、技术、金融、教育和文化等领域在内的中高级生产要素的市场化。其次，加快金融改革与创新，为创新型企业，尤其是其中的中小型企业提供有效的资金支持。再次，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应在形成“安全网”的同时，重视保障性资金的可转移性和可持续性。最后，应以市场竞争为导向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提升产业结构水平。这种新的创新驱动的增长模式，应该是以政府为主导，同时强化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功能，以企业为创新的真正主体的增长模式。

记者：您提到了在创新驱动中应以企业为主体，那么亚洲别的新兴经济体中有中国企业可以借鉴的例子吗？

沈坤荣：以韩国为例，他们拥有很多大企业，而研发团队大部分都在企业中，研发投入也多来源于企业。而中国正处在转型期中，科研机构多处在大学和政府之中，这里的技术创新和基础性人才培养固然重要，但是更多的应该由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根据市场的需求主动研发。

中国需要加入像 TPP 那样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协议

记者：丘美芳



宋恩荣

1979 年取得明尼苏达州立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现任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并任由复旦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合作成立的沪港发展联合研究所联席所长。

「长远看来，中国需要加入像 TPP 那样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协议。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应该更接近世界标准」

记者： 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成为今年“新形势下的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分论坛的关键词，TPP 会成为亚太经济合作的唯一模式吗？

宋恩荣： TPP 不会成为亚太经济合作的唯一模式，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将来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当前，亚洲除了有 TPP，还有拥有 16 个成员国的 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这两大区域性经贸组织很有可能改变未来世界经贸格局，他们在亚太的竞争之势已经形成。虽然目前 TPP 占世界总产值的比例要高于 RCEP。但是因为 RCEP 成员国中国的经济发展较快，RCEP 的影响力并不会低于 TPP。

TPP 的战略合作内容涵盖了知识产权保护、劳工标准、环境标准、政府采购等等，其范围要大于 RCEP，将突破传统的自由贸易协定（FTA），达成无例外的综合性自由贸易协议，将对亚太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产生重要影响。TPP 作为一个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协议，可能会成为一个典范。

记者： 6 月，习近平即将访美，有猜测认为美国可能邀请中国加入 TPP。现在的中国适不适合申请加入 TPP？

宋恩荣: 即使美国邀请中国加入 TPP, 中国目前离 TPP 设定的标准还较远, 还达不到相关要求, 想要现在就加入 TPP, 成为 TPP 的创始国是不可能的。但不能否认未来中国加入 TPP 的可能性。

贸易协议的谈判需要有个过程, 越多国家参与谈判, 就越难达成协议。TPP 的谈判过程已经进展了一段时间, 预计 2013 年完成谈判的, 但是目前看来无法完成该目标。各国都不希望一再推迟达成协议的日期, 所以现在可能参加的都是能够在短期内加入的国家, 日本提出申请已经算是较迟的。之后一段时期内, 12 国将集中精力完成谈判, 成为创始国。中国难以在短期内加入。

记者: 没能成为创始国, 中国是否会因此面临“被围堵”的困境? 未来中国有没有可能加入 TPP?

宋恩荣: 国内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崛起是不可避免的趋势, 美国想要借助 TPP 来围堵中国。不排除美国会有这样的意图, 但是长远来讲, 围堵是不可能做到的。虽然中国无法成为 TPP 的创始国, 但是 12 个 TPP 国家中有 7 个也是 RCEP 的成员国, 跟中国也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韩国、日本也在跟中国谈自由贸易协定, 虽然现在中日、日韩政府都没有强烈的意愿要立刻谈成, 只能等待声势和时机的出现。美国是个很大的市场, 中国的产品在美国也没有受到很大的限制。所以, 没能成为创始国, 短期对中国的影响不大。

长远看来, 中国需要加入像 TPP 那样的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协议。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应该更接近世界标准。今后的十年、二十年, 随着全球贸易的发展, 无论是 WTO 还是 TPP, 都需要扩大涵盖的范围, 覆盖商品贸易、服务贸易、高端科技等等。中国加入像 TPP 这样的按世界先进标准建立的贸易协议, 是应该发生的事情, 也是一个趋势, 更可争取制订国际游戏规则的话语权。但到那时是加入 TPP 呢, 还是加入一个叫另一个名称的贸易协议, 这就很难讲了。

记者: 台湾将 FTA 作为扩大国际生存空间的重要途径, 特别积极主动地要求参与 TPP 的谈判。该如何应对台湾可能加入 TPP 的问题?

宋恩荣: 马英九提出台湾加入 TPP, 但这个目标并不是要马上实现的, 起码需要十年。而在这十年里, 不确定因素很多。当前台湾离 TPP 标准仍很远。台湾要加入 TPP, 其内部的反对声音也会很多, 尤其是来自农民的。国际上的很多自由贸易区都对农业有排除条款, 但 TPP 不是, 成员国农业受自由贸易竞争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日本这么晚才提出加入 TPP 的重要原因。台湾如若要加入 TPP, 必须先协调好农民利益。条件成熟后, 台湾要加入 TPP 的话, 大陆方面如何应对还需看当时的两岸关系。如果两岸关系融洽, 那么即使台湾加入 TPP, 问题也不大。

海峡两岸当前签署了 ECFA（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涵盖两岸 15% 的贸易。随着 ECFA 的进一步实施和范围的扩大，台湾会逐步降低保护，这对台湾将来达到加入 TPP 的标准是有帮助的。

记者：2009 年国务院提出上海要建设国际金融中心，将之作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重要举措，至今已经四年多，您如何评价上海这四年多的发展？

宋恩荣：上海现在的股票市场交易量很大，超过香港。不同于香港相对独立的情况，上海的发展离不开整个中国的发展。

但是，上海的银行基本都受到中国人民银行的监管，贷款的松紧都受到影响。人民币自由兑换之前，上海的外汇交易量很难跟香港进行比较，上海预计在 2015 年建成人民币产品中心的目标也几乎不可能实现。中国政府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对一些风险较高的金融产品限制较多，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金融市场的发展。上海金融中心的建设，还面临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金融法律不够健全，产权得不到较好的保障。

这些客观限制都不是在短期内就能解决的，也不是上海市政府本身努力不够的结果。人民币的国际化需要过程。监管金融产品的难度也远远大于监管一般产品。美国金融市场如此成熟却也无法避免金融危机的产生，中国政府加强监管不是没有道理。法律的完善也是一步步发展的过程。投资者的成熟也需要时间。

记者：在“十二五”规划中，现代服务业是国家转型发展的重头戏。但从服务业市场看，上海落后于国际水平，无论是在总值还是比重上都不如北京。您认为制约上海服务业发展的因素是什么？

宋恩荣：上海现在面临痛苦的第三产业转型，这个过程需要面对经济增长放缓的问题，但是我们并不需要担心。经济发展有一定规律，越成熟的经济，一般来讲，其增长率会比较低。上海的经济发展需要创新才能有所增长，但创新难，也有客观的速度限制。

当前上海服务业发展的障碍就在于，其大部分高档服务业都是国有的，如电信、银行、机场建设等。服务业的发展，一定离不开改革，国有企业势力强大，固有利益群体很难松动。而且这些高档服务业还可能涉及到一些较为敏感的问题，如国家安全等。另外，上海要发展服务业，人才和信息都极为重要，但在税收制度、信息透明度等方面仍然有较多客观的限制，并且不容易得到解决。这些都制约了上海服务业的发展。

要改变这种现状，一方面需要合理引进竞争，解决垄断的问题。另一方面需要放松监管，细化监督管理办法，具体到每个行业需要如何监管等。

仅仅依靠政府政策刺激经济并不可取

记者：蔡至欣



王健

美国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高级经济学家，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国际金融和货币银行学。研究成果发表于多个国际著名经济学刊物，并被华尔街时报，道琼斯，VoxEU 等世界著名媒体引用。

「美国的经济复苏是通过私营市场自发形成的，并不是通过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这种自下而上的调整是更加健康、更有活力的。这是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需要借鉴的一点。仅仅依赖政府的政策刺激经济并不是一件可取的事情。」

记者：2008年金融危机对亚洲的影响是持续而深远的，亚洲各国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恢复经济。您能评价一下目前亚洲的经济状况吗？

王健：亚洲新兴国家在危机后经济复苏的强度要比欧美国家高很多，尤其高于目前仍受欧债危机影响的欧洲。相对来说，亚洲的增长率一直都是比较高的。但是，现在也面临一些挑战。首先，危机之后亚洲国家普遍都采取了比较激进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政策的负效用已经慢慢出现，可能会对今后几年经济增长的速度有一定的制约。其次，很多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面临着较大的经济减速风险。当然，这种减速风险并不完全是由金融危机带来的，主要是这些国家自身的结构型调整引起的。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不可能一直维持较高的增长率。离最大化经济增长的边界越近，增长速度就会越慢，香港、台湾地区，还有日本、韩国，都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中国和这些国家相比主要有两个负面因素，一是人口问题，人口老龄化比较严重，这是计划生育的一个负面作用；二是环境污染问题。香港的经济减速发生八十年代，那时出

现了比较大的金融危机，韩国的减速发生在 1997 年，也出现了金融危机，墨西哥的经济危机发生在 1994 年。每当经济减速时都伴随着经济危机发生。中国如果发生经济危机，肯定会波及到亚洲其余国家。因此，如何防止减速过程中发生经济危机，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记者：后危机时代中，亚洲各国纷纷采取各种措施恢复并发展金融市场。目前，中国金融市场的焦点包括人民币国际化和利率市场化问题，您对此怎么看呢？

王健：长期来讲人民币国际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可预见的未来会超越美国成为第一经济体，这是必然的结果。然而，一种货币成为国际货币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尤其在中国仍然实行固定汇率制的情况下，从封闭的金融体系变成开放的金融体系，在这个过程中也会伴随着一定的风险。因此，人民币国际化必须谨慎，不能操之过急，有几个关键步骤要慢慢地走。第一步是要理顺国内金融市场。根据以往的经验和研究，一个国家开放资本账户和开放经常账户是不一样的。经常账户开放后对国家的经济增长是有帮助的，但是资本账户开放的结果取决于国内金融市场的效率如何。如果资金利用效率高，能把进来的资金运用到生产效率最高的地方，就可以促进经济发展，但是如果国内金融市场效率低下，可能一时消化不了资金造成的资产泡沫，甚至会引发金融危机，反而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有负面作用。评价一个国家金融系统的效率，利率是最基本的标准，当利率还不是完全由市场决定时，很难想象人民币能走向国际化，因此利率市场化是提高中国金融市场效率的核心。

第二步是放开汇率，不能继续采取固定汇率制。在国际金融中有一个很著名的理论叫“三元悖论”，即一个国家不能同时具备固定汇率、自由的货币政策和开放的资本账户。中国想要开放资本账户，又有自己决定货币政策的权力，必然要放弃固定汇率制。在放弃固定汇率制的过程中可能对进出口部门有短期的冲击，但长期来看作为经济大国，中国放弃固定汇率制不仅对自己有利，对世界也有利。当利率市场化和汇率浮动这两步完成时，就可以考虑开放资本账户。

记者：您觉得完成这两步需要多长的时间呢？

王健：利率市场化问题不仅是金融问题，还涉及经济的方方面面。国有经济在整个经济中占的比重较大，国有银行向国有企业变相地提供补助，通过压低利率贷款给国有企业，降低了国有企业的运营成本。利率市场化之后势必会对这些国有企业产生冲击。因此，这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很大程度上还是政治问题，要看中国领导人克服这些阻力的决心了。这个过程不会太短，不是两三年就能完全实现的。

相比之下，汇率浮动比较容易。尽管我们一直说汇率对贸易的影响非常大，但是这种影响是多面的。对于本来利润就比较低，失去竞争优势的企业影响比较大，但是对新兴的中国企业有促进的作用。因此，可以先实行浮动汇率，允许国内银行自由地报价决定汇率，然后再进行利率市场化。

值得注意的是，金融市场的改革并不仅仅是利率市场化。我们要发展多层次的金融市场。例如企业既可以从银行得到贷款，又能从商业票据市场、股票市场或债券市场融资，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把资金最有效地分配下去。这个过程也需要至少三到五年时间。即使全都做到了，人民币已经成为国际化货币之后，还需要一个过程，让国际投资者以及使用人民币的人逐渐认可，这种信心的培养也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美国的经济总量超越英国三十年左右之后，美元才最终取代英镑成为全球最主要的流通货币。人民币要成为全球主要流通货币之一，至少需要十到二十年时间。

记者：谈完中国之后，我们再把目光移向日本。日本最近推出了量化宽松政策，您对此有何看法？

王健：我认为这是件好事。量化宽松是对正常的货币政策的一种补充。正常的货币政策通过调节短期利率对经济进行调整，但日本的短期利率已经为零，无法再通过这个渠道刺激经济。正常的货币政策调节短期利率的目的是影响长期利率，进而推动生产和消费，而量化宽松可以直接影响长期利率，因此这对日本来说是正确的货币政策。当然，这个政策对日本以及周边国家有一定的负作用。比如，量化宽松可能引起日本市场上的资产泡沫，日本股市近期大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风险。人们认为日本过去十几年的经济低迷是错误的货币政策导致的，新的货币政策出来后对经济有良好的预期，但是如果后来发现经济低迷是由于某些结构性因素而不是货币政策导致的，市场发现泡沫后股市会回调，带来股市下跌的风险。

此外，有一个误区是大家认为近期日元贬值是由于量化宽松引起的，但其实不一定，汇率受很多因素影响。美联储实行量化宽松后美元非但没有贬值，对于主要货币反而升值。日元之所以贬值是因为08年金融危机后日元作为主要的避险货币升值太快，升值了30%-40%。现在经济复苏后日元贬值是对之前升值的一种纠正。更需要注意的是来自金融市场的风险，尤其对于中国。日本量化宽松后利率很低，市场上资金很充足，而中国利率比较高，而且中国正在逐步开放资本账户，这就给套利机构提供了可操作空间，这也是我为什么不支持人民币国际化脚步过快的原因之一。

记者：您刚才提到了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有人称此政策会引起中国乃至亚洲的通货膨胀，您同意这个观点吗？

王健: 我认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大家普遍认为有两种渠道会造成通货膨胀。一是美元印多了之后流入中国,中国要用人民币购买美元,所以中国被动地量化宽松。但是从数据上看并不是这么回事。美元进入中国之后会成为中国的外汇储备,如果中国被动地量化宽松,外汇储备和人民币供应量都会增加得很快,但数据显示只有人民币供应量增加很快,而外汇储备并没有增加很快。所以中国的通货膨胀更多的是 2009 年中国过于担心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而进行的 4 万亿投资造成的自身货币政策过度宽松引起的。二是有人认为美国的量化宽松推高了大宗产品的价格,比如石油,由于这些大宗产品的价格在发展中国家的 CPI 中占比更大,可以把这些国家的通货膨胀推高。但数据并不支持这一观点。和汇率一样,大宗产品价格受很多其他因素的影响,美国一直在推行量化宽松政策,但最近的石油价格一直在下降。而且货币政策的最终控制权还是在本国政府,如果石油价格上涨,也只是相对价格的上涨,而不是绝对价格的上涨。真正的通货膨胀是指绝对价格的上涨。比如整个经济中有十种产品,如果这十种产品的价格都在同时迅速地上涨,这是通货膨胀,但是如果只有两三种产品价格上涨,其他产品价格不变或下跌的话,这只是相对价格上涨。货币政策可以控制住绝对价格的变化,但是控制不住相对价格的变化。如果中国不滥发货币的话,当石油价格上涨,其他产品会比正常情况下上涨更慢,平均一下通货膨胀率和原来差不多。所以并不是说某种产品价格上涨就会引起 CPI 价格的上涨,这是一种错误的逻辑。

记者: 您觉得在危机后经济复苏的过程中,美国有什么值得亚洲国家借鉴的地方?

王健: 一是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危机发生后美国允许房地产市场价格比较快地下降,所以价格调整得很充分,现在房地产价格又重新回到了上升的轨道。二是劳动力市场的改善,降低了工会等机构的议价能力,劳动力市场更加灵活。三是能源革命的进展,页岩气发展得很快,能源价格下降非常大,劳动力成本和生产力成本都得到了比较有效的调整,产品更加有竞争力。四是政府财政的改善。目前联邦财政还需要进一步改进,但每一个州的财政进步非常大,通过裁员、降低雇员工资福利来减轻政府对经济的压力。归纳起来,美国关注的是如何增加效率。美国的经济复苏是通过私营市场自发形成的,并不是通过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经济危机刚发生时刺激力度不大会很惨,但只要时间足够长,这种自下而上的调整是更加健康、更有活力的。这是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需要借鉴的一点。当然,在经济危机中还是需要一些政府扶持,但是手段不一样,比如可以推行失业保险、对家庭直接补偿,降低家庭在经济危机中的痛苦来稳定经济。通过政府直接投资的财政政策刺激并不是一件可取的事情。

记者: 您觉得中国在亚洲经济发展中的定位是怎么样的?

王健：只能说以前的定位不是很高，现在在逐渐升级。服务业和金融业自不必说，就算从制造业来讲，我们很自豪很多产品都是“made in China”，实际上很多只是中间产品的加工或者产品的组装。比如一个产品 80 块是在其他国家生产的，只有 20 块在中国生产的，但最后 100 块都算成中国的出口额，看起来中国制造业很厉害，但真正增加的只有 20 块钱。在美国店里有很多中国制造的产品，但是如果你让店员举三到五个中国的牌子，没人能举得出来。所以中国在制造业产业中处于一个比较低端的状态。今后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竞争优势在什么地方。目前我们处于香港 70 年代的水平，中国有很多经验可以从香港、韩国借鉴。香港一直强调自由的经济，而中国国有经济比重还是比较大，很多行业不允许竞争。中国必须激发市场的活力，放开行业竞争。

记者：您认为亚洲金融今后的发展过程中会遇到哪些机遇和挑战？

王健：香港、新加坡等地的金融市场已经相当成熟，无论是从法律完善程度、从业人员的专业化程度和市场的透明程度来讲，都可以从欧美的金融市场相媲美。上海还需要多加努力，这和中国的大环境也密切相关。中国的金融市场还非常不完善，虽然中国一直强调要成为世界金融中心，就目前状态而言这只能说是一个发展方向。就中国的经济水平和制度水平来看，金融并不是中国的比较优势，和香港、新加坡比的话优势都不是太明显，还有很多功课要做。

记者：亚洲经济一体化的格局越发突显，金融合作不断深化。您认为中国在亚洲金融市场的发展中应该扮演一个怎样的角色？

王健：中国在亚洲金融市场中扮演的角色是相当重要的。比如中国现在和新加坡、韩国在做货币互换，能起到稳定亚洲货币系统的作用。但是由于目前有资本账户的管制，中国起到的作用还是有一定局限性。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完善，中国在亚洲金融市场当中将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政府在城市区域创新体系中并非主导作用

记者：徐黎彤



吴缚龙

现任英国伦敦大学巴特雷特城市规划学院规划讲座教授。2001 年获得 Habitat International 颁发的 Otto Koenigsberger 奖。专著于研究中国城市化、城市与区域管理、城市贫困问题、社会空间差异、城市振兴以及动态城市模型调整。

「政府虽然在创新体制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但它并不居于主导地位。在中国的创新体制中，企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政府则主要扮演着服务于战略规划与城市布局、提供社会服务的角色而并非领导」

记者：在城市创新体系中政府、企业、高校、科研机构等不同主体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同时它们在利益价值追求上也具有很大差异。有人认为这就是我国未能真正构建起良好的城市创新体系的原因，您是否赞同该观点？政府该如何协调这种差异性，使得这个体系更好地运作？

吴缚龙：不完全是这样，中国城市创新体系现在也面临着很多其它问题。以中国的生物科技产业为例，缺少持续性的资金支持、风险投资不成熟、产业与研究之间联系不紧密、知识产权缺乏保障等都是制约其发展的因素。

至于政府面对这些问题该如何应对，我想政府虽然在创新体制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但它并不居于主导地位。在中国的创新体制中，企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政府则主要扮演着服务于战略规划与城市布局、提供社会服务的角色而并非领导。相反，其实在前面提到的中国生物科技产业面临的问题中，有很多和政府的政策以及国家赞助的发展模式密切相关。例如，公司、科研机构、学校之间联系不紧密的问题。从根本上说，这个问题应归结于生

物技术集群的真正驱动者是政府，而不是私人风险投资或者是制药公司。只有当公司成为了科研项目的资金注入者时，科研成果才能更好地实现产品化。如果以政府财政充当资金来源，科研机构很难与公司取得联系，进而堵塞了研究成果市场化、产品化的道路。

在以后的发展中，我认为政府应该更加鼓励高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增强研究、工业以及市场三者的联系。除此之外，政府还应该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提高专利的利用率。在人才战略方面，我认为政府应该意识到单纯引进科学人才是不够的，中国目前的发展更需要富有冒险精神的、懂的科学知识的企业家。

记者：您的一篇论文中提到了“中国范式”的城市转型模式，中国城市区域创新体系的构建是否是这种范式的一种体现或者是完善？

吴缚龙：“中国范式”的城市转型模式并不是一种赞扬，它也不是一种范例。这种模式是政府利用土地来吸引投资发展制造业，在经济飞速发展后，再通过回收把土地重新用于居住和商业。期间，通过土地出让得到的收益成为地方财政的主要收入。然而我们已经很清楚这种土地划去产值的方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大家已经认识到需要实现产业的更新。故而在新的体系下更加强创新，强调发展高科技产业。

记者：您能否总结一下中国城市区域创新体系的特点？

吴缚龙：中国城市的区域创新体系是一种混合型的模式，虽然国家也出台一些自主创新政策，然而实际上很多创新机制是地方政府推动的。除却政府外，这个体系中的主导因素有很多，例如城市、企业、市场等。企业之间的网络联系、地理上的邻近导致知识的溢出、企业的创新。但地理上的邻近是不够的，科技园区的建立还同城市核心功能有密切关系，只有完善城市配套设施，改善城市的居住环境、提高城市生活质量才能够吸引人才、促进创新。另外，通过的张江生物科技园例子可以看出，它还是一种市场导向的开发。

记者：新一届领导班子将进一步推进中国的改革，面对新的情况，您对中国城市未来的发展有何展望？

吴缚龙：李克强总理提出了新型城市化的概念。这意味着城市化将从以土地为中心的模式转变为以人为本的模式。前者是一种由资本驱动的城市化，是一种不完全的城市化。它将大量农业用地转化为城市用地，在此过程中，伴随着大量的旧屋拆迁。这种模式往往拒绝把拆迁移民看作是城市居民，然而把他们安置到城市中又是不可避免的，故而，大量拆迁农

民被排斥于城市公共服务范围之外。这种现象与城市化提供城市公共服务的本质相背离。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必须要改革它的户籍制度，因为它不仅区分了城市地区和农村地区，更意味着把农村居民拒于城市社会之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户籍制度是与国家粮食供应挂钩的。把农民隔绝于城市之外有利于实现国家主导的资本密集型工业化。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以及成功加入世贸组织，我国世界工厂的地位已被奠定，户籍制度已然不能阻挡和限制劳动力的在市场中的流动。但却限制了进城务工人员的地位，削弱了他们的消费积极性，这不利于中国把出口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更加强调国内消费的经济增长方式。另一方面，在城市住房问题上，农民工也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他们既没有资格获得政府提供的廉租房也没有能力购买商品房的。户口状况限制了他们卖房的能力，成为了他们在城市安家的障碍。于是他们只能栖于廉价而破旧的出租屋，这些出租屋聚集起来形成了城中村。并且，这种临时居所还长期收到拆迁的威胁。因此，渐进的户籍制度改革是很有必要的，也是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

除却户籍制度改革，以人为本的城市化还需要地方政府转变他们在城市发展中扮演的角色，要从土地交易中的企业家转变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一些官员把城市化看作大兴土木和进行城市扩张的契机，这有可能导致房地产泡沫的产生。为避免这种情况，新型城市化强调人的特性多于发展的特性。为的就是要让移民者享受更高的工资，并使现有的城市居民获得更好的生活环境。除此之外，新型城市化还意味着更加包容不同的建筑环境，更加注重居民的实际需要以及更加便利人民的生活。故而，在规划城市时，中国应注意避免大规模的拆迁和建设规划的单一性，也有必要放弃资本密集城市化下的巨型城市建设。生活质量应该成为衡量城市化的重要指标。它意味着提高人们的发展资料消费和享受资料消费。最后，政府应该大力关注环境，解决城市卫生问题、城市绿色发展问题等。这不同于以往片面强调恢弘大气的城市美化工程，以人为本的城市化旨在发展可持续型的和生态友好型的社会。

养老机构更应重视精神关怀

记者：徐盛洁



肖顺贞

北京大学医学部护理学院教授

刘宇

北京大学医学部护理学院副教授

「 无论是对失独老人、空巢老人，抑或是对尚有子女照顾的老人来说，目前我们对他们的精神健康关注得都不够。」

记者：有一个现象很值得琢磨，现在中国有很多老人都不太乐意去养老院，认为这是子女不孝的表现。你们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刘宇：以往很多老年人觉得被送去养老机构是子女不孝顺的表现，在家里养老最幸福最好。但现在很多老年人其实已经转变了观念，如果能找到一个理想的地方，不是很贵又很整洁，就不会排斥。很多老人在选择养老机构的时候考虑的第一点是养老机构提供的服务是不是能满足老年人的要求，这是最主要的；第二点是他们要考虑到一旦当他们身体功能出现缺陷的时候这个养老机构会否继续收纳他们，是否能有下一步的照顾计划，甚至说能够提供连续性的服务直到他们去世，如果有这样的机构的话他们还是会选择的。

记者：您觉得我们目前的养老机构对比西方尤其是福利非常好的国家来说还有哪些主要的差距？

肖顺贞：我参观过一些西方的养老机构。当然有比较便宜的、普通的机构，但是也有非常高级的养老院，加入这个养老机构事先要给很大一笔支持机构的建设费用，算是投资的一部分，这样入住以后能享受非常好的服务。

总的来说国外的机构服务水平与国内相比还是比较高的，目前国内从事这方面服务的人员大部分从理念到操作技术等等都是不够的，所以我们现在致力于去培训这些服务的人才，想在软件这块赶上西方。

就我参观过的一些机构而言，比如美国，服务比较周到，而且思想理念上非常到位，会根据对老人的了解给出符合老年人需求的服务；香港地区我看到过的托老所服务同样非常到位，比如他们用的椅子会保护行动不便老人坐在上面不掉落，吃饭的时候也有专门的桌椅设备，各方面的都比较细心贴心。我通过资料了解到日本很多机构也是这样，工作人员甚至连喂饭都有相应的培训和技巧。这方面我们就比较欠缺，目前中国养老院里的服务人员有很多是来自农村的护工，没有受过很多相关方面的专业培训。

刘宇： 其实在我们国内养老机构的硬件条件已经达到了一些西方国家的同等水平，有的甚至胜过美国等国家。但关键是软件不足。这个软件一方面是理念问题，也就是养老机构应该给老人提供怎样的服务；另一方面是养老机构里服务人员的构成问题。这和养老机构的定位有关系，如果一家机构要接收半自理或者不能自理的老人，就一定要相应配备医生和护士等相关的健康管理方面的专业人员，没有的话肯定是不合格的。

记者： 您在刚刚的报告中谈到空巢老人，另外还有一个群体是失独老人。那针对这些老年人精神上、心理上的服务有没有什么针对性的规划？

刘宇： 我觉得无论是对失独老人、空巢老人，抑或是对尚有子女照顾的老人来说，目前我们对他们的精神健康关注得都不够。以我们课题组研究的那个社区为例，我们发现目前这些机构大部分提供的就是纯粹的实体服务，但是不太懂得如何去关注老年人的精神健康。第一他们不知道怎么去识别老年人有没有一些精神健康方面的问题，第二是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法能比较有效地帮助到这些老人。好的一方面是，中国的社区跟西方不一样，社区居民彼此间关系还比较密切，一旦这个社区里有失独老人等这样的老人存在，他们会更容易被一些社区里的相关服务工作人员关注到，只不过这些工作人员的相关知识和技能都是不够的，所以他们的关注和照料也只局限于陪陪老人或者是尽可能帮他们解决生活上的困难比如买菜、送饭等等。但是如果要考虑从真切的情感方面、精神方面的照顾或者是比较专业的、进一步的治疗方案还是很欠缺。

记者： 现在我们国内有一些机构正在起步做这方面的培训吗？

肖顺贞： 现在空巢老人已经受到了不少的关注，相应的机构也都在逐渐起步。而失独

老人的问题现在关注度相对还没那么多，这是另一个急需关注的领域。

记者：有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现在不是所有的老人都有钱去得到这样优质的养老机构的服务，而且我们国家的福利尚且没有那么完善，有没有想过在经济条件限制的情况之下要做什么？

肖顺贞：所以我们在培训的时候非常欢迎志愿者群体。希望找到更多热情的、懂得老人的心理、懂得怎么去关心老人给他们带去帮助的志愿者。我觉得经过培训的志愿者队伍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

现在我们强调的软件方面对老人的照顾也分两个方面。一方面还是之前反复提到的要有精神、心理方面的关照，另外一方面是动态的照顾，这不是指天天问老人“吃了药吗”，而是关心记录一段时间内身体、情绪等各方面有什么变化，一旦发现问题能及时陪同前往治疗。我们现在非常重视动态的这种照顾，这些方面如果志愿者能做好的话就能解除当前经济、人力等方面的不少问题，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非常热心去做这个课题和实践，毕竟最终老人能切实从中受益。

记者：在这方面的研究你们已经做了多久？有没有一些成果已经开始体现并进入了为政策服务的实践阶段？

肖顺贞：这个周期还是比较长的。我们现在还在努力一步一步地做，毕竟培训这方面的人才是需要长期观察，不是一教就会的。参与培训的人员也需要一个反馈的过程，如果在为老人服务的过程中遇到困难，比如去了以后老人不理他们，这种时候我们就需要反复去教他们怎么与老人相处和沟通。

我强调我们所做的不是普通的培训而是一个科研项目，这是需要有反馈的，反馈和学习都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我们现在很努力地用我们的知识、理念、热情和科学的态度在促进它。

刘宇：至于进入政策服务实践的话，由于国家要施行推广一项政策必须要拿出数据和研究成果来，而我们现在还处在数据收集阶段。

肖顺贞：但现在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期，政府很重视老年人利益保护，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时候投入更多精力去做这件事就赶上了一个好机会，有政策支持就会减轻很多阻力。

当然我们的培训是兼顾以此为职业的人员和志愿者两方面的。当政府投入更多资金去雇佣这样一群人来从事养老服务事业之后随着人数的增加相应的教育和培训也会更普及。

中国治理模式的反思与改革议程

记者：刘璐茜



杨雪冬

中央编译局全球治理与发展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执行主任。
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全球化、中国地方政治、政治学理论。

「怎么能够在社会越来越多元化、社会要求越来越丰富的环境下一方面保持优势，另一方面进行升级，这是比承认制度优势更重要的问题。」

记者：您曾经提到过，我国重大政策决策的制定过程应当注重学习借鉴那些国家规模较大、发展水平与我国更为接近的国家，这有利于提高针对性。事实上很多这类国家都处在我国周边，您认为我国在全球化背景下应当如何处理全球视野和地区主义的关系？

杨雪冬：之所以要学习发展水平比较相近的国家，主要是因为彼此间面临的问题有更多的相似性，也更容易就问题的解决进行深入的讨论和交流。现在国内一些人主张学香港或者韩国，可能有些东西可以学，但实际上中国从规模或是面临的问题的复杂性和影响力来说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力，所以很难真正学到什么。

从全球视野和地区主义的角度来说，中国过去 30 多年来再对外关系上除了和美国保持良好关系外，更多地是在处理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比如与俄罗斯领土争议方面的谈判，比如支持中亚国家发展，成立“上合组织”，比如积极参与东盟的谈判，甚至与韩国、日本等东北亚国家有很多新的合作机制上的尝试。应当说中国正在努力创造一个比较好的周边环境。但中国在整个东亚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周边除了俄罗斯这样的大国外，更多的是一些小国，更重要的是这些国家与中国在历史上存在各种复杂关系，甚至是痛苦的

记忆，比如对日关系，所以对中国来说在整个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要推动区域合作面临着很多障碍。

东亚近年来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最快速的地区，但在政治方面存在严重的猜疑和互不信任。整个地区的发展在政治层面的合作始终还面临很大障碍。未来想要更好地处理好全球视野和地区主义的关系，可能更重要的还是在政治层面建立互信机制，更好地处理历史问题，使中国对本地区的发展起到推动和带动作用，特别是妥善处理领土争端问题，减少与东盟不必要的经济摩擦。

记者：近期由于领土主权等问题，我国与周边一些国家的关系并不那么缓和。您认为我国应当如何改善目前这种局面，更好地实现国际合作？

杨雪冬：我想最重要的是对历史问题的处理。我们可以看到近年来各国都在为此努力，但实际上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和突破，中国、韩国等在二战中受伤害最大的国家的合理要求没有办法得到满足。相关国家应当坐下来认认真真谈这个问题，充分阐发各自的立场。但从某种意义上说，短期内有很大难度。相关国家如日本在价值观和文化上对一些历史问题的认识存在很大障碍。我想还是要靠日本这个民族自身去解决问题，简单靠外部的抗议压力很难有突破。

中国长期在很多有争议的问题上都采取了搁置的做法。但现在越来越多以前被搁置的问题又被提了出来，这其中有很多因素，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是中国的快速发展造成了周边国家的不适应，利益和发展的触角延伸到更远的地方，所以引发了冲突。从政治角度来说，还是要进一步推进双边或多边对话机制的建设，而不是简单地相互攻击使问题升级。当然对话本身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当前没有哪个国家能离开对方发展，尤其是在亚洲地区。应该让更多国家认识到共同利益所在，而不是把矛盾无限放大。

记者：我国是金砖国家的一员。您怎么看待“金砖合作”对于打破西方的主导性、建立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新秩序的作用？

杨雪冬：金砖国家发展水平和规模相似，在国际事务上的态度上能够站在一起。它最重要的意义在于能够通过相互合作在发展上相互支撑，有利于形成一种新的经济合作组织，比如现在正在讨论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建立，这是一个很好的尝试。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以二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为基础的，由西方国家主导，但对新问题的回应和应对能力存在明显缺陷。如果金砖国家能够探索出新的体制，对于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的稳定有很大好处。当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不可能去替代现有规定和秩序的，更多地是作为支撑和补充。

记者：亚洲国家与传统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政治方面的治理模式是否存在一些独特的优势？中国又应当如何利用这些优势走出中国特色的政治治理模式？

杨雪冬：这个问题现在讨论也很多。金融危机之后，很多西方国家本身也在反思这个问题。当然他们在说自己问题的同时，也是以中国为参照系，说出了中国独特的优势，比如长期的战略规划（如五年规划），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视，决策效率更高能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某种意义上说明了西方社会现在能够用一种更正常的心态来看待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的治理模式。客观来讲，如果承认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巨大成就，就应该意识到在成就背后有独特的体制在支撑着它。这种体制有很强的功能和合理性，当然它也面临许多问题。怎么能够在社会越来越多元化、社会要求越来越丰富的环境下一方面保持优势，另一方面进行升级，这是比承认制度优势更重要的问题。

记者：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一方面要把权力还给社会，使国家的职能向提供公共品和公共服务转移，以缓和全球化带来的社会冲击力；另一方面国家间竞争进一步加剧，对包括经济社会方面的国家职能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两方面的要求在中国国情下应当如何协调？

杨雪冬：上世纪九十年代大家在全球化背景下认为国家职能会越来越弱，但后来发现它并没有越来越弱，某种意义上反而增强了，国家职能的规模在调整，政府支出在扩大。对中国来说面临着很多和西方相似的问题，也有很多特有的问题。一方面还是必须要把提高国家能力作为非常重要的任务，另一方面国家也要重新认识国家与社会、个人的关系。过去国家可能可以代表社会，掌控经济，约束个人。但经过这些年的发展，社会越来越强大，市场功能越来越完善，个人素质和要求越来越高，就需要更清晰地划分三者的界限。国家既要让社会、市场和个人充分发挥作用，又要提供其需要的支撑。政府从管理向服务转变，国家要增强协调性，保持自主性，既是社会的一种要求，也是改革的方向。这些年我国改革最快的是经济领域，特别是在行政审批方面，这就是市场化的需求。现在大家最不满意的其实是个人生活领域。下一步改革需要在社会和个人生活领域慢慢深入。

记者：如今中国网民数量已达总人口的近一半，互联网在带来许多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挑战。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在治理过程中该如何更好地利用网络？

杨雪冬：网络是一个新生事物，发展速度超过了很多人的想象，尤其是政府。政府一直在努力适应网络时代的发展，比如在网络上发布信息，提高决策透明度，与公众进行一些

交流对话。但我觉得是远远不够的，网络带来的不仅仅是一种技术上的革命，更重要的是带来社会组织形态和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这对政府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现在大家对政府管理网络最不满的是管太多太严，其实正说明政府没有很好地把网络利用起来。政府一是要更好地认识网络，把网络的变革和政府的改革创新结合起来；二是摆好自己的心态，在网络时代不存在信息的核心，大家都是水平存在的，政府只是一个周转信息的节点，更好地把信息传播出去。政府发布信息通常比社交网络要迟缓，一个信息要发布政府要先接受，内部还要审核，特别是地方政府更为滞后，从而陷入被动。所以政府要发挥信息全面性、准确性的优势，这样才不至于处于劣势。

记者：您认为上海作为一座国际化、开放化的都市，在中国的整个改革进程中是否起到什么特殊的作用？您能为我们展望一下不远的将来它的发展轨迹吗？

杨雪冬：上海在改革开放中当然处于前沿，最典型的的就是浦东。上海具有的独特优势，一是国内一流的城市管理水平，从基础设施、人性化设计都可以看出，发挥着一种示范性的作用，现在中国发展迅速，可能会有越来越多大规模城市出现，这些城市应该能向上海学到很多东西；第二是中国的对外窗口作用，上海能够更好地把中国的发展用一种国际社会更熟悉的方式传达出去；第三是机制改革上的突破性发展，行政甚至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值得期待。未来上海还是应该发挥带头人的作用，不断提高国际化水平和政治管理水平。就像世博会的口号，“城市，让生活更美好”。我相信上海也会成为一个更加适宜居住的城市。

全球治理问题应借鉴中国儒家思想

记者：梁妍洁



叶江

现任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欧洲研究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为剑桥大学国际事务研究中心访问研究员。同时兼任中国世界民族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理事、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理事。

「中国要圆“中国梦”，根本在于实现人民幸福，实现人民幸福就需要参与全球治理。我们要对国内文化有信心，如果像过去一样关起门来是没有前途的，仅仅向西方学习抛掉儒家优秀传统文化也是不可以的。结合这两者才能真正推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促进国家富强，进而实现“中国梦”」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后阐释了“中国梦”主题，并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伟大梦想。请问您是如何看待中国梦的呢？

叶江：可以说我国已经实现国家强大，民族复兴，但人民幸福感却在不断降低。这种情况下，民族复兴只能成为一句空话。我认为这三者应该有机结合在一起，才能圆“中国梦”，因此国民幸福十分重要。在分论坛（“用亚洲智慧解决全球治理问题”）中，国家编译局的杨雪冬老师也谈及了国内治理重要性，即我们今天一定要追求国内人民幸福，这需要通过儒家文化中提倡的“善治”来实现，即在国内建立良好的治理机制，尤其是在高度发展的当今社会。

记者：提到国内治理，实际上国内治理和全球治理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您在会议发言中也提到将儒家思想核心与全球治理理念相结合。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寻找结合

点或问题切入点呢？

叶江：儒家思想核心是“仁者爱人”，即在治理中我们要以人为先，以人为本。因此治理主体不应仅仅是政府，还有社会、市场。国家、社会、市场间若要实现相互平衡，其中每个人都应扮演重要角色。人不仅应被管理，更要参与管理。但如今是全球化的世界，很多国内问题也是全球问题，反过来，一些全球问题也会对国内人民生活产生影响。比如气候变化、环境污染，这些问题无法由一个国家单独解决，某个地区大量释放二氧化碳，对整个世界都可能造成影响，这类国际问题把国际边界打碎了。因此，如果要真正实现国内复兴，我们需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因为任何大国不可能独善其身，不可能实现单独发展。

但我们在参与全球治理时，也需要具备有自身的文化底蕴、传统理念，有我们独特的亚洲智慧与中国智慧。我个人认为亚洲智慧与中国智慧根植于“诸子百家”。从目前来看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儒家一些核心思想，如“仁”“爱”。我认为儒家的一些重要思想对今天的全球问题治理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如“人性本善”，我们在参与全球治理中可以把善的一面发扬光大。同时儒家强调观念和谐，即我们可以持有不同的观念与文化，可以做到各种文化和谐相处，“和而不同”。这样一来我们可以超越西方一些诸如“性本恶”——人们需要被制约、平衡的思想，我们应坚信“人性本善”，发扬善的力量，推进善治。在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中进一步把儒家思想发扬光大，这对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会有很大帮助。我相信古老的思想在年轻的全球治理中总有发扬光大的余地。

因此，总结来讲，中国在今天要圆“中国梦”，根本在于人民幸福，人民幸福在于要参与全球治理。我们要对国内文化有信心，中国若像过去一样关起门来是没有前途的，仅仅向西方学习把老祖宗的优秀传统文化抛掉也是不可以的。这两者的结合才能真正促进中国参与，帮助国家富强，真正实现圆中国梦。

记者：本次会议是以亚洲为中心，我们知道中日韩均为亚洲重要经济体，其经济总量占亚洲约七成，三方为了扩大贸易合作成立了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但近期由于朝核、领土主权等问题导致三方关系并不和缓，在这种情况下您对三方的经济合作抱有怎样的预期呢？

叶江：我还是想从文化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这三国在文化根源上应该是相同的，三国在古代共处东亚文明圈，深受儒家文化影响。从这点上来说，今天产生的一系列矛盾，如果大家都能以善心相待的话，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然而这个区域实际上过多受到外来强权政治因素的影响。尤其是日本，日本之所以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发动侵华战争，实际是受到西方强权逻辑的影响，但其至今仍未对历史产生清醒认识。中日韩三方应将治理方式与传统儒教思想相结合，从寻找共同利益处罚，搁置敏感问题，搁置争议，然而现在中日双方缺少

搁置争议的共识。搁置争议可以算作儒家文明的传统，即不走偏激之道，通过走中庸之路，问题就可以很好解决。

反过来思考，全球化背景下，世界整体是和平的，为什么这个区域却处于整体潮流之外呢，关键在于这个区域并没有恢复到老祖宗强调的“和而不同”的和谐关系。中日韩在东亚应扮演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角色，在区域内尽可能推进“善治”与“人治”，在维护区域和平的同时尽可能地遵循儒家传统思想，这样三国不管是在经贸、文化还是政治领域都可以有很广阔的发展合作前景。这需要东亚各国共同努力，当然基础是日本对自己的侵略行径和一些历史问题产生清醒认知。

记者：那中国对此应做出怎样的努力，起到怎样的推动作用呢？

叶江：对国内来讲，我们可以从传统的儒家思想中吸收更多营养，更多用善治方式来解决。我们在研究国际政治的时候不要只简单学习处理国际关系的方式，而也应关注一下我们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传统文化，因为儒家文化在当今仍旧是很有生命力的。这样东亚乃至整个世界才能避免像米尔斯海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中提到的安全困境模式的形成。他认为这是客观规律，但我认为现阶段由于全球化发展与全球治理不断推进，完全可以避免这种大国关系模式与强权政治逻辑，走向和平之路。这个想法可能有些理想化，实际上我们有些方面的确在这样做，如果各国仍秉持强权逻辑，那战争便会不断，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各国仍在通过各种渠道进行谈判与沟通。这就表明和平之路是全球政治的一条新道路，因此现在的全球治理之路虽然艰难曲折，但我认为它确实预示着未来世界发展方向。

记者：您提到我们应吸取儒家文化精髓，实际上我们正是这样做的。但日本单方面不承认历史，在面对中日关系问题时总是搞“舆论战”，以虚假造谣方式蛊惑民众。因此在中日关系上中国实际处于被动地位。如今我们要推广儒家文化，日本心理上可能会接受儒家文化在东亚文化的地位，然而行为上是没有表现出来的。这应该怎样解决呢？

叶江：日本这样不负责任的行为，我们一定要坚决反对。日本现在的思维是中国不断强大，威胁着日本的发展，因此试图遏制中国发展。如果我们持有相同的思维方式，即在面对他们对历史不负责与对现实虚假造谣上，也采取强硬方式，这定会造成“安全困境”。因此我们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应持有“和平发展为主流”的观点，采取和缓的方式、不以激进的态度对对方或者自己的政府施加压力，那么解决问题的余地会更开阔。当然在领土、主权、历史问题上我们绝不能让步，对于不让步采取的方式，我们可以用之前邓小平时代曾主张过的搁置争议，在我们这一代并没有强大到可以解决该问题的时候，就想方法继续走和

平发展的道路，同时各国积极参与共同管理，使区域走向和平。这样整个国际舆论会自然地倒向中国。实际上现在的国际舆论并不利于中国，一个原因是外国人对中国存在偏见。如果我们寻求和平解决之路，我们的国家形象在世界眼中会有所提升。约瑟夫奈很重视软实力的地位，我想，在这样一个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世界之下国家形象的高低变得更为重要。

我的以上想法在当今并不占主流地位，但当今占主流地位的一些思想实际会对国际关系产生负面影响。中日矛盾中，主要责任在日本，这毋庸置疑，但是在应对他们掩盖事实的时候，我们的舆论是否在用完全正确的方式在处理，这些都需要我们思考。一方面我们强调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但另一方面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并未体现出这样的精神。很多人可能将全球治理作为权宜之计，认为它的本质是权力斗争，但我认为它恰恰是我们需要坚持的政策与目标，我们需要真心实意地认识到今天世界的改变，我们在接受传统的思想同时也要吸收新的观念，中国只有树立这样的目标才能使人民实现真正的幸福，才能走上民族复兴的道路。

规范二元论：关于中国解决秩序与纠纷问题的初步想法

记者：李霁萱



於兴中

美国康奈尔大学法学院 Anthony W. and Lulu C. Wang 讲席终身教授。兰州大学文学学士，哈佛大学法学硕士、博士；曾执教于哈佛大学、香港中文大学、西北政法大学。主要研究方向为法理学、法律与社会理论、法律文化、香港宪政、司法改革。

「摘要：中国文化传统中关于秩序与纠纷的态度通常运用“礼法结合”，即由两套规范系统来调整秩序与非秩序，但西方则用一套规范既解决纠纷，又惩罚犯罪。在将“礼法结合”的传统介绍给西方世界时，我将其称之为“规范二元论” (Normative Dualism)。」

记者：您在《强势文化、二元认识论与法治》一文中曾提出“二元文化认识论”，这与今天演讲中的“二元论”是否一致？有哪些异同？“二元论”是否也反映了亚洲其他国家面临的现状？

於兴中：并不一致。在那篇文章中我主要谈的是两种不同的治理方式，那段时间人们特别重视法治，将其和人治对立，在讨论是人治高于法治还是法治高于人治，即两种道路的选择。我在那篇文章里主要批评那种非此即彼的二元认识论。而现在的这篇文章主要是有关法学研究的。现在，国际上的法学研究进入了一个无主流的时代。这恰恰为中国法学的发展提供了契机。我们能为世界贡献什么，以及我们如何能让自己的法律传统被世界所了解。在这个大背景下，我就选择了中国法律制度传统里的“礼法结合”的特色，想把它

介绍给西方学者。但西方人并不懂何谓“礼法结合”。它实际上所指的是中国在治理、或者说在解决纠纷时，不像西方是使用一套系统规范来既解决纠纷，又惩罚犯罪。我们传统所说的“礼”是预防犯罪，由“法”来扮演惩罚者的角色。这样一种由两套规范系统来调整序与非秩序的做法，我就将其称之为“规范二元论”。

唐律对东南亚各国的法律制度影响很深，尤其像日本、韩国、越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这些国家没有发生变革之前，其文明秩序也是和中国相同的，以“德”作为正面形象，以刑罚作为负面形象。但在其社会制度发生变化之后，这一“规范二元论”并不能完全反映其现状。

记者：您认为这一“规范二元论”给中国当代的法治建设带来怎样的影响？

於兴中：有一定的制约。这里涉及一个较为宏观的问题，即法律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有种说法是，法律要为经济改革保驾护航，但事实恐怕并非如此。当今世界各国并没有实例直接说明法律和经济有必然联系。中国的情况是首先出台政策，政府观察到在人民的实践中其可行，将其局部推广，之后发现其行之有效再扩大推广的范围，再制定法律，其后随着社会关系的发展，法律被更改，抑或束之高阁。“规范二元论”起源于祭祀，逐渐发展为调整贵族行为规范的规则，即“礼”。“法”则是从“刑”开始，带有惩罚性，而非管理性、预防性。这样的规范方式现在是否应该继续存在，还是应该改革，使整个社会秩序的维护和纠纷的解决都依靠法律，现在仍不可盲目下结论，但是当提到“法治国家”的时候，很可能就是说我们应该抛弃这种“规范二元论”，以“法”为主。

记者：这可以呼应您在《作为法律文明秩序的“法治”》一文中的观点，即亚洲各国遵循的是道德文明秩序，中国是此类文明秩序中的典范。那么这种文明秩序是否会和遵循法律文明秩序的西方国家和按照宗教文明秩序治国的伊斯兰诸国在社会制度安排上产生矛盾？该如何避免这些矛盾，取其精华以运用到当下的社会治理上？

於兴中：事实上，在各个国家和地区这三种文明秩序都是存在的，但由于外界条件的不同，每个国家或地区都有一个统御性最强的文明秩序。当它们产生矛盾时，一定有一种占统御地位，如中国法律的儒家化，或曰中国法律的道德化。当一个社会中这三维的文明秩序都得到发展之后，这个社会安排就是相对来说最理想化的。一个理想的社会中应存在一些原则，我认为其中最主要是“权利原则”，它保障个人的权利得到充分维护。其次是存在于关系社会的“关系原则”。当权利与权利之间，权利与关系之间产生矛盾时，就出现“悲悯原则”，它被广泛运用于社会各个领域，在解释学中这样阐释：尽可能给最差的观点以最好的

展示，即从别人的角度考虑，不否定不同的观点，而是想办法理解它。在法治领域，要尽可能使发生纠纷的双方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除此之外，在政治安排上必须采取“分权原则”；而“辅助原则”是指当一件事由最小的单位能够解决，就不要搬动大的单位解决。如一个小县城可以解决的事，就不要要求中央也直接干预，在其解决不了的时候，高一级的政府再去协助他们，给予援助。

记者：那么您认为这些原则是如何体现在亚洲各国的治理中的？

於兴中：日本和韩国可以说在政治、经济制度及人的意识上比亚洲其他国家更为先进。这两个国家在政治制度上基本采取了“分权原则”，如韩国成立宪法法院，日本实行司法审查，这都是分权制衡的表现。但“辅助原则”则没有更广泛的体现，欧盟把它看做最重要的原则之一，所有实行联邦制的国家也都实行这一原则。

记者：孙笑侠教授在法律分论坛开幕式上曾提到，北欧各国的法律由票据法逐步统一，您认为亚洲各国能否借鉴这一模式？

於兴中：首先要在文化上达成一致，再谈法律的统一化。前一天论坛我在总结时，也提到亚洲合同法统一的前景。首先，有没有必要制定统一的法律？现在各国是由《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来管辖的，为什么要重新制定一个亚洲各国的法律，有什么必要？其次，如何统一？最后，统一什么？所以像这一运动，即便是不能被各国政府所接纳，它本身是一种学术研究。

记者：那么亚洲国家在哪些领域需要进行法律的统一化？

於兴中：很明显，解决纠纷的机制非常需要。另一个是对自然灾害的回应，我认为亚洲各国应该有共同的应急机制。还有就是论坛上所讨论的合同法，因其不因地域限制。

记者：所谓“亚洲智慧”，或将其缩小为“亚洲的法学智慧”，您认为有哪些或哪类理念及传统最值得传播？

於兴中：首先要明确，何谓“亚洲智慧”。而在谈论这一概念之前，你要问何谓亚洲，包括东亚，西藏，印度吗？从宗教的角度来说，亚洲囊括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这个概念内涵太广，外延太大，只能笼统地说，所有和东方有关的东西。而“亚洲智慧”到底指

的是什么？从与会者的文章及发言中你会发现，有“和谐”、“调解”、“解决纠纷的多元机制”这些关键词，但这些智慧严格意义上都是非法律领域的，所以谈“亚洲法律智慧”是一件比较“悬”的事情。当然，以建设性的角度来谈，我认为要把“法律”这个概念界定清楚，可能需要把它的内涵和外延进行扩充，即包涵对通常意义上不是法律的规范性手段，这样就可把“和谐”等概念包括进去。

记者：您觉得这些非法律的规范性手段，在全球各国治理上有哪些借鉴意义？

於兴中：介绍出去之后，也许有用，比如西方的 ADR（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主要包括仲裁和调解，调解在美国是用来弥补它正式的诉讼制度，但很难说这个调解就是从中国传过去的。我本人不主张“亚洲特色”或“亚洲价值”，而应将一些具有普适性的理念和传统进行推广，这样才更具价值。

中国需建立“国际能源安全观”

记者：关赫楠



张希良

清华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教授，博导，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所长。我国《可再生能源法》（草案）专家建议稿起草小组负责人之一。张希良教授是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气候变化评估报告》和我国《国家气候变化评估报告》中能源供应章节的主笔作者。

「我们该关注的不仅是国家能源安全体系的构建，更应该关注如何让国家有效地参与到全球能源安全体系的构建里，发挥更大的作用。」

记者：从1980年联合国召开“联合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会议”以来，新能源的开发就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热点，现在已经30多年过去了，您能总体性地介绍一下中国及世界新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情况究竟如何吗？

张希良：在过去的30年，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在全国乃至世界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就我国而言，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技术水平的进步，例如风机的效率从30年前的100瓦到300瓦变成现在的1.5兆瓦；第二是成本下降很快，风机成本由20年前的1万5下降到今天的4000元。总的来说，可再生能源在全球来看，前二十年发展缓慢，近十年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主要得益于世界各国不同的扶助政策：我国04年提出的《可再生能源法》、00年德国提出的购电法为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创造了有利于发展的环境，其长期可靠的收益，促使投资者为可再生能源的研究投资。

记者：您在会议中提到可再生能源近两年进入了一个短暂的平台期，那未来几年有突破平台期的趋势吗？

张希良：可再生能源前几年很火，而现在发展到一定阶段确实遇到了瓶颈。从国际视角来看，主要因为近年来德国、中国、西班牙、印度、巴西等国出台的促进可再生能源技术进步、成本下降、装备产业发展的政策是有期限性的，各国需要重新讨论第二期计划，要不要继续发展可再生能源；而中国的问题更突出：首先可再生能源事业原来很小，政府也有很多优惠政策来扶持，例如收取电力附加费来补贴风电，但是随着可再生能源事业做大进入平台期，再要继续发展面临的困难和 10 年前不可同日而语。举个例子，风机装电功率现在已经变成 6000 万千瓦，还要提高就要提高电力附加，这需要由社会范围的讨论决定。另外我国面临的更大的问题是资源和人口分布不均，拿电力问题来说，电力资源在西部，用电用户却集中在东部，如果要建新的输电电路则需要增加成本，提高附加费，这也是一个需要获得全国共识的问题。总之可再生能源发展现在面临的就是这些利益、政策、体制、技术问题的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现在必须解决，换句话说，可再生能源面对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

记者：现在各个国家都对新能源开发市场很感兴趣，也各自做了很多尝试，您认为国外的新能源政策以及新能源开发技术有哪些成功和不足，能不能帮助解决我们现在面对的平台期问题？

张希良：首先我国新能源发展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我国的新能源投资世界第一，装备制造产能也是世界第一，包括德美在内的很多国家发展势头并没有我们这样好，同时他们也正在面临我上面所说的第二期的问题。另外，可再生能源概念提出的这 30 年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面临的挑战像我们国家那么大。欧洲国家国土面积小，面临的挑战相应也小，同时欧洲统一电网供电，使欧洲国家电力调节能力也相应变强。我们国家面临的电力资源和人口分布不匹配的问题，跨省输配协调的问题都不是欧洲各国可以比拟的。现在国内遇到的问题是各种矛盾发展到临界点了，如果中国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顺利渡过平台期，也是给世界其他国家提供了一个案例。

记者：针对中国能源问题，中国能源的消费格局至今未有大的改变，中石油经济技术研究院预测，2013 年石油对外依存度可能突破 60%。您认为未来几年我国对能源结构将进行怎样的调整？

张希良：我国过去 20 年能源结构变化不大，煤炭占能源总量高达 70%，未来到 2020 年，非化石能源比例达到 25%，已经很不错了。如果天然气比例提高一些，煤炭降低一部分（降低可能比较有限），能从现在的 70% 降低 60% 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改变。而且我们要中国背景下谈结构问题，中国人口多、消费总量大，提高比例就很困难。这些年我国的可再生能源

和核能发展日新月异，对一个小国家来说相当于是一个国家的大事，在中国这只是改革的一方面，中国国家庞大，结构改变很艰难，要很大的作用才能改革改过来。另外依存度的问题，近期主要是交通方面引发的，机动车辆增加很快，同时，我国本身产油量很有限，每年 2 亿吨的水平，再产油就很贵了，无法在国际能源市场上形成竞争。但以我的观点，我们不能只强调国家石油进口依存度，更应该建立一种国际能源安全观，从全球石油市场视野来看问题。

记者：您刚才提到的国际能源安全观，能再详细介绍一下吗？

张希良：我认为我们该关注的不仅是国家能源安全体系的构建，更应该关注如何让国家有效地参加到全球能源安全体系的构建里，发挥更大的作用。石油对外依存度很高不一定是不好，60% 甚至 70% 的对外依存度也是我们可以接受的。另外，占我国总能耗 70% 的煤炭其实我们有相当一部分也是靠进口来满足需求的。我希望未来中国能够积极介入欧佩克等一些国际性石油组织，参与一些国际能源安全体系的建立。

记者：就您刚才提到的煤炭问题来说，实际上我国能源结构积重难返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费比例过重，您认为面对这样的困境，我们能达成十二五规划中要求的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例的 11.4% 吗？

张希良：首先我国能源结构积重难返的主要原因，一是我国每年新增能源消费量高达 7000 万吨，可再生能源等新能源在近期满足不了新增量，而化石能源煤炭能满足这一新增量，所以更有竞争力；二是经过多年的能源建设，煤炭冶炼等的基础设施已经完备，如果要全面更换成最新设备也是一笔非常庞大的费用。但是我认为，我国未来能源需求还要增长，在不造成环境破坏和重大事故的前提下，我国煤炭的可持续产能却有一个界限，大约在 30 到 40 亿吨，完全用煤满足不了发展需求。能不能达到十二五规划中的预期，则取决于未来的经济形势，如果未来一段时间经济不那么快增长，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 40 亿吨左右，我们很可能实现这一目标。

记者：几十年前就有人在说，石油资源只能用 50 年了，而我们现在还在使用石油，那您怎么看待化石能源储备量的问题？

张希良：这其实是一个动态的问题，我们应该从未来的角度来看这一问题，不能忽略技术进步这一重要影响因素。50 年前我们就说石油只能再用 50 年了，我们现在还是这么说。事实上，过去 20 年能源领域发生很大的变化，不可再生能源资源的耗竭量，按过去的用法、

技术水平是有耗尽的一天。但是在今天，随着效率的提高、新能源的出现、石油的勘探技术进步，开采水平的进步，过去开采成本太高，无法开采的能源现在也可以开采了。另一方面页岩气作为非常规天然气的突破，改变了世界能源结构和贸易格局。

记者：中国经济结构也面临改革，您认为这一契机能带动能源结构转变吗？

张希良：我认为随着经济发展，低碳城市化、工业化进行到一定程度，我们自然可以使用清洁能源，像在北京现在所有的供暖都在使用天然气，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自然会带动能源结构转变。

记者：能源的使用影响着我们的环境安全，比如PM2.5问题主要就是煤炭或汽油不完全燃烧造成的，您认为能源结构和环境气候两者之间又有怎样的相互作用？

张希良：煤炭是PM2.5的主要来源。解决PM2.5问题需要尽量把环境保护问题包括在国家能源战略里，不仅要继续发展天然气、核能、可再生能源等非煤炭能源，做到能源供给多样化，同时也要再发展洁净煤的利用技术。降低低效率污染的煤炭使用方式并不是说使用煤炭不好，而是要调整煤炭布局：利用我国煤炭多的优势，研究煤的汽化、分离煤炭中污染物等技术实现能源的清洁利用。

记者：福岛核泄漏事件对中国未来核电项目的发展有没有影响？您认为中国新能源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怎样的？

张希良：中国已经重新评估了所有在建核电项目，并且确定了继续重点发展核电。在中国新能源发展问题上，我是个乐观派，虽然现在能源供需有一定压力，但是站在全球的视角来看，有很多解决渠道。而且我国天然气管道建设、液化天然气的进口也有很大进展，有可能在2050年达到煤炭、天然气及石油、非化石能源三分天下的多元化体系。同时我们还有注意到我国能源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我国每年能源消耗总量太大，每年新建电厂规模相当于整个英国目前的能源消耗量，这么大的新增量要求我们必须做好节能。

党管新闻的方式亟需改进

记者：高天齐



周瑞金

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矿业大学淮海文化传媒研究院名誉院长。1993年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1991年以“皇甫平”的笔名，主持撰写《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等四篇评论文章，引起海内外广泛反响。

「要相信网络舆论具有某种对冲的功能，不一定是政府出面表态，不妨让左翼和右翼，精英和草根在网上形成相互制衡的机制，让不同的价值取向在网上对冲，偏激的声音在这种对冲中会趋于消亡，而理性中道的声音会占上风。」

记者：1991年出现了您的“皇甫平系列评论”，有效地促进了改革开放所需要的人们的思想解放，而今天的中国也处于政府管理、医疗体制等全方面改革的关键时期，您对中国新闻媒体目前在转型时期的表现如何评价？

周瑞金：今年一月，新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刘奇葆考察人民日报社和新华社的时候对新闻工作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就是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新闻理念，使报道贴近读者的需求，符合干部群众的口味，同时抢占舆论高地，掌握话语权。

但是当前新闻工作的现状是我们的新闻理念经常不是以人民为中心，脱离实际，不能切中实地。特别是面对互联网、微博等等自媒体和网络意见领袖的活跃，话语权也并不总是在党和政府以及官方的媒体手中。党的新闻工作如何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需要我们总结新中国成立64年来的经验教训。

这些经验教训集中归结起来，我认为有两点。第一点，党管新闻的底线必须坚持，这是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保障；第二条，党管新闻的方式要与时俱进、不断完善，针对

时代的新变化、传播技术的新发展、人民群众的新需求，不断地调整党管媒体的策略、途径和技巧，对其进行科学管理、民主管理和依法管理，始终注重新闻宣传的实效。

我是1962年秋天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到解放日报工作，31年以后调进了人民日报社工作，从我五十多年由地方党报到中央党报的工作经历，我认为这两条经验对我们都太重要了。

记者：最近的搬迁钉子户、上访被劳教等事件其实是转型时期社会矛盾的体现，这些事件在舆论上引起了很大的反映，但是对于这些负面的热点新闻，涉及到地方政府利益，媒体的报道有时稍显不足，您怎么看待这样的现象

周瑞金：党的十八大以来，一方面是新领导人的虚怀若谷，高调地宣示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不失时机地深化重要领域的改革。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广大人民群众对深化改革开放的强烈呼声和殷切的期待，但在新闻媒体和互联网上经常被遮蔽了。从周口强制平稳到山东地下水污染，从贪官的假释到清华大学朱令案、北京的京温女孩自主坠楼案，很多舆论的热点问题并没有解决但后续报道却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社会转型期也是矛盾的凸显期，出现了一些所谓的负面新闻是相当正常的情况，不正常的是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温水煮青蛙似的麻木不仁。在当前的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在激进、积累和叠加，需要及时来化解，要警惕和制止社会的动荡。但是思想宣传部门毕竟不同于政法部门，我们既要帮助地方政府灭火，更要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全国思想文化的生态治理上来。思想宣传部门要做国家意识形态浇灌的园丁，要做全民政治共识的强烈的黏合剂，要做知识界、文化界的优秀的统战工作者。

记者：人民日报在发表的5篇主旨为关注“社会心态”的系列评论中提出要允许“异质思维”，目前已经有一些这样的报道刊登，那么具体而言什么是“异质思维”呢？

周瑞金：异质思维客观的存在于相互的讨论中。正确的会被社会接受，不正确的会自己消亡，影响不同的人。所谓的异质思维实际上是不同于主流舆论的声音，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应该有不同声音，应该允许不同声音的存在，这样的社会才是多元的。

然后再在宣传中统一认识、形成共识。所以异质思维其实是平常的、正常的存在，是整个国家政治生活中常态的，不必要过分地看待，和党管新闻是不冲突的，要善于听取不同的意见才能更好地施政。

记者：2013年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引发了一些争议，对于党管媒体的现行方式的思

考，您怎么看这个事件？

周瑞金：今年年初发生的“南方周末新年致词事件”，虽然事发突然，有多种的因素，但是不能否认与一线的记者、编辑不满地方宣传管理的不当是有关系的。此事件后期得到了柔性处置，既坚守了党管媒体这条政治的底线，又注意掌握管理的力度和技巧，应该给予肯定。思想工作也应该要配合党的总任务、总方针。

记者：有的人认为现在党管新闻的理念限制了媒体的言论，在人人都有话语权的时代，应该给让媒体更自主地反映人民群众的呼声，您认为“党管新闻”的工作应该如何与时俱进？

周瑞金：党管新闻的政治底线不能够失手，但长期延续的新闻方式也亟待改进，我主要有四点意见：

一、做思想工作要服务于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绿叶配红花，加油不添乱。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央政治局制定了《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深得民心。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更大的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地深化重要领域的改革。应当说这就是党的总任务、国家的大方针、大政策。思想宣传管理部门的责任，就是对此认真配合，切实地贯彻落实。如果损害政治局八项规定所营造的氛围、损害攻坚困难，全面推荐改革的大好局面，影响到十八大党的中心工作这个大局，那就值得反思了。

二、党对新闻宣传的领导主要是对党和政府方针政策路线的把握，对一个时期思想动向的正确分析、应对计策，以及对新闻干部的管理，而不是直接代替总编辑办报。严格来说，当前国内不存在纯粹的体制外媒体，被舆论视为民间报刊的南方报系，其实也是中共广东省委机关报《南方日报》旗下的子报子刊，归广东省委管辖。因此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对报纸编辑部的方针政策的指导，思想动向的大局的研判，以及对干部的任用，体现党对媒体的权威性的管理。

坦率地说，党的思想宣传管理部门有一些领导同志像管理铁路列车运行表一样，把行政管理方式搬到新闻管理当中，直接地介入了新闻报道方式和流程，管得太细太具体，缺乏对媒体人应有的信任与尊重，这样做大大影响了主流媒体的宣传和实效。去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決定》，此前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进行了连篇累牍的宣传造势，据我从网络帖文来观察，效果适得其反。比较而言，我注意到由中国青年报发表的九篇评论，每一篇都是从网民的关切角度提出问题，旁敲侧击地支持了互联网的立法，效果要好得多。党领导媒体就包含有党的领导人应当尊重媒体工作者的自主性和创造性的应有之意，千万不能低估多数编辑记者的政治责任心、职业精神和坚持改革创新

意愿。

三、宣传管理部门不宜只做地方政府的灭火队，更应成为全党、全国意识形态的建设者。在这里我想强调下对互联网的切实有效管理。网络管理不应局限于消极的删帖和注销网友的账号，关键是推动和保障社会各群体都能够上网表达，促成信息的自由流动，要相信互联网有信息自净的机制，比如日本大地震引发的中国抢盐风波，在微博上就没有任何的市场。还要相信网络舆论具有某种对冲的功能，不一定是政府出面表态，不妨让左翼和右翼，精英和草根在网上形成相互制衡的机制，让不同的价值取向在网上对冲，偏激的声音在这种对冲中会趋于消亡，而理性中道的声音会占上风，当然领导部门需要以适当的方式放大理性的声音，缩小和忽略不理性的声音。

四、新闻宣传管理部门自身也必须接受监管，提高新闻宣传管理的科学化水平，避免公权私用和主观随意性。我们看到，一方面大众传媒监管部门十分辛苦、不舍昼夜、全神贯注，随时捕捉和制止负面新闻和议论的扩散，而网络运营商因为贴文管理任务重、所需人力多，硬是把高新技术产业做成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然而这样的灭掉的只是大众传播传媒中的明火，而不是基层、村头、街头的暗火和地火，社会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尚未得到真正的解决就被隐瞒下来，没有能够给基层官员以必要的警戒，却给老百姓留下了误会，等到下一个突发事件爆发的时候，可能需要全社会付出双倍的成本来化解。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同时对于偏左、偏右的观点倾向，要通过自由平等的讨论来求同存异，聚同化异。对于网友和知识分子的不同意见，哪怕是偏激的表达，在法律允许范围内，不如给予最大的宽容，不宜滥施公权、前置，用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手段来解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问题。

政府应对农村土地有效开发进行协调

记者：Kevin Tham



朱介鸣

1993年毕业于英国 Strathclyde 大学，获区域及城市规划博士，为新加坡规划师协会会员，现为新加坡国立大学城市规划与管理研究组主任、教授

「中国在过去的三十年经历了惊人的发展。但农村的土地开发过于分散导致土地利用效率降低和严重的环境问题。政府需要协调农村来解决这个问题。」

记者：在过去的三十年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快速城市化使中国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然而正如您所提到的，土地没有实现最大程度的利用，而这限制了现在的发展。您会建议政府介入并采取控制和开发土地的措施，而非允许土地的违规开发吗？

朱介鸣：出于历史原因，广东的农村建设已经做得很好了，因此对中国政府来说直接开发土地会很有难度。而在像加拿大和美国这样的国家里，由于农村的人口密度很低，政府直接开发土地通常不会有什么问题。然后，广东的问题在于农村的人口密度太高，从而导致人均土地面积非常低，这就意味着农村可开发的土地变得支离破碎，只能吸引到低质量的工厂。因此，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进行协调。

记者：为了更有效率地利用稀缺的土地，需要更好地组织土地开发，但是农民只对个人短期收益有兴趣，政府应该如何应对这一矛盾？

朱介鸣：农村可以通过集体行动、合并小村庄和集中运作来解决这个问题，更好地利用土地。然而目前农村似乎无法一起协作来实现这一目标，因此，最好的选择是由乡镇一级的政府来指导和计划如何实现更高的土地利用效率。这一方法也存在问题：它是自上而下

的推动的，有可能会存在强迫实施的情况，并不是村民的理想选择。

记者：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主要发生在沿海地区，工业化和城市化导致了大量务工者移民进入这一地区，从而进一步提升了对于土地的需求。这导致了一个不平衡的现象，即只有沿海地区经济实现了令人惊讶的增长，但其他地方则相对落后。您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如何更好地利用土地？

朱介鸣：东部沿海地区比西部内陆地区更为发达的原因之一是有利的地理位置对于企业来说更加方便。当然，东部地区发展过快而西部内陆地区发展低下是不可取的。最佳的可能解决方案是制定政策和激励机制来帮助西部内陆地区的发展，并减少农民工的流出。虽然有些人主张应当完全由市场来决定一切，但这会导致分配的不平衡，从而导致社会不平等。

记者：快速的城市化也导致了环境问题和健康问题。通过适当的废弃物管理设备来重新开发土地能否解决这些问题，还是只能任由大规模环境恶化发生？

朱介鸣：现在的情况是土地分散，工厂到处都是，这造成的结果是污染区域很大。如果土地能更好地被利用，就有助于将环境恶化和污染控制在一个固定区域内，这将有助于减少污染对环境和村民生活的影响。

记者：珠江三角洲是中国非常富饶的地区，由于受到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影响，珠江三角洲的可耕种土地正在减少，您认为这会影响到中国未来的稳定和发展吗？

朱介鸣：中国来说，肥沃的耕地是非常重要的。虽然土地开发市场并不关心土地肥沃与否，由于有着巨大的利益，农村对开发土地还是很热衷的。经济学家可能会认为是，保持肥沃的耕地不被开发使用并不重要，因为人们可以从别的地区购买粮食。然而，从社会学家或政治学家的观点来看，粮食安全对国家来说却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出于粮食安全考虑，中国政府目前的政策是不开发肥沃的耕地。

记者：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是中国非常重要的经济区。你是否认为中国政府将把中国其他地区转型为经济特区？如果这么做的话，那么这些地区是否也会面临工业化带来的问题？

朱介鸣：要成为新的经济区很难，因为这取决于市场和投资情况。长三角地区是特别的，因为它有着有利的地理位置和人力资源。上世纪80年代前，中国政府曾试图开发内陆地区，但那是场经济灾难。除非政府出台政策来推动平等的地区发展，否则新的经济区很难发展起来。最有发展可能的地区是四川和青海。然而，和长三角地区相比，这两个地区的生产成本会更高。



复旦大学上海论坛组织委员会

地址：中国上海市邯郸路 220 号 邮编：200433

电话：86-21-55664590 55664665 传真：86-21-55670203

电子邮箱：shanghaiforum@fudan.edu.cn 网址：www.shanghaiforum.org